

中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委员会 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34-0801/(G)
总第 613 期
2008 年 9 月 20 日



中国科大报

50 周年校庆纪念特刊



1958 2008



校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58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批准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一所大学的报告。6月8日，

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主持召开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与会专家提出，即将创办的这所大学，应实行理工结合，向科学与技术紧密结

合的方向发展。郭沫若当即拍板，将学校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上图系郭沫若校长题写的校名。

校歌

建校时，为了使学校继承和发扬抗大优良传统，郭沫若亲自起草了校歌《永恒的东风》歌词。郭老将写好的校歌送给周恩来总理审阅，周总理改了两个字，把“为共产主义建设作先锋”中的“建设”改为“事业”。

校歌经周总理审定后，郭老邀请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曲家、抗大校歌作曲者吕骥先生谱曲。郭老说：“我们的校歌得到他的作曲，这就使得我们的学校能够有声有色地继承着抗大的传统。”

开学前夕，郭老再次邀请吕骥先生在大礼堂为全校师生教唱校歌。

50年来，“迎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这雄壮激越的旋律，一直回荡在一代代科大人心中。

永恒的东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歌)

郭沫若 词
吕 骥 曲



校徽



中国科大校徽是在1980年代形成的“梅花型”校徽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而成，2007年9月20日正式启用。其基本元素主要寓意如下：

1、梅花 梅花是科大人勤奋刻苦、追求真知，百折不挠、永不言败和勇于创新、锐意改革精神品格的象征。

2、火箭 腾空飞跃的火箭，表达了科大人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勇于担当国家使命、攀登科学高峰的壮志豪情。托起火箭的四根线条，代表了中国科大的人才培养目标——“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科技英才。

3、打开的书 书本是知识的象征，知识就是力

量。一代代青年学子在这里勤奋学习，汲取丰富的知识素养，为攀登科学高峰打下坚实的基础。书本经过修饰之后，像破土的嫩芽，又似飞翔的海燕，象征着中国科大这所充满新鲜活力的年轻大学展翅翱翔。

4、正圆形外围轮廓 加工后的校徽增加了庄重典雅的外围轮廓和中英文校名全称，使校徽与国际接轨。圆形轮廓将传统的梅花校徽包蕴其中，使其成为一个整体元素，而显得更为突出。

5、深蓝色主色调 校徽以深蓝色为主色调，体现了科技、理性、厚重、深邃、宽容的文化品格，与中科院院徽的色调一致，表明中国科大作为中科院所属的大学和母体文化传统的一脉相承。

校训

1958年建校之际，郭沫若先生亲自起草校歌《永恒的东风》歌词，并请校歌谱曲者吕骥先生到校教唱。从此，校歌中“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的句子在全校师生中广为流传。

1959年开学典礼，郭老以《勤奋学习，红专并进》为题作长篇演说，将中国科大校风概括为“勤俭办学，艰苦朴素，红专并进，团结互助”，要求同学们坚决把抗大精神继承下来，“不仅要创建校园，而且要创建校风，将来还要创建学派”。

1988年9月20日，名誉校长严济慈在庆祝建校3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建校以来，老校长郭沫若倡导建立了‘勤奋学习，理实交融，红专并进’的优良校风”。这是对郭老在中国科大创办初期不同场合关于校风提法的进一步概括，同时也是根据学校建设和发展实际对校风、校训作的新的提炼。

2003年9月，校党委书记郭传杰在纪念校庆45周年《思贤哲，学校训，创一流》一文中指出：“我们科大的校训‘红专并进，理实交融’，认真品味起来，不仅语言简约，文辞对称，且内涵深邃广博，入时合理，既含价值观，又有方法论。”2004年9月，校长朱清时于《中国科大报》出刊500期题词“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继承前辈传统，重温科大校训”。

综上所述，“八字校训”的表述，源于首任校长郭沫若作词的科大校歌和1959年开学典礼致辞，后经不同时期的进一步提炼和概括而成。

“红专并进”强调品行操守与业务技能的相得益彰，“理实交融”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八个字将为人、为师之要，治学、治教之道，尽含其中，寓意深广。

理实交融 红专并进



目 录

文化符号	1
目 录	2
科大精神	3-6
京华创建	7
创新立校	8
南迁重建	9
开泰布新	10-11
精品办学	12
本科教育	13-14
研究生教育	15-16
少年班	17
学生工作	18
科技创新	19-20
学科建设	21
师资队伍	22
全院办校 所系结合	23-24
国际交流	25
名师至爱	26-29
杰出校友	30-34
校园风物	35-36
老照片	37-38
岁月如歌	39-41
科大格言	42
活力校园	43
七彩社团	44
五十校庆	45-48
书画作品	49-50

校魂 校格 校风

党委书记 郭传杰



前不久,《科学时报》刊出了网大 2008 年对中国大学的排行结果。中国科大总分排名第四,较上年又升两位。观其各类子指标,学生得分名列第一,学术成果得分第三,但物质资源得分居 31 位。

说实话,这些年来,对林林总总的大学排行榜,我从不以为然,尽管有家机构 2002 年排科大于 15,现在已升到第 7。但与许多同道一样,对我们科大以名近孙山的钱财投入,却获得名列前茅的办学成就,又有点兴趣。因为,就象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一样,投入、产出也是客观规律。这一看似不合常理的“怪”现象,其中必有某些奥秘。深究一下不难发现,科大其实也是符合这一规律的。因为,我们虽然硬投入不足,但未被计量的软资源却堪称一流!

这个软资源,就是科大的特色文化,就是科大的精、气、神!中国科大凭的就是这个,投入不多,产出不少;凭的就是这个,生生不息,永立潮头!

50 年前,中国科大初创京华,就被誉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借“全院办校”之光,一时大师云集,名家偶。建校不久,就跻身中国名校前列。上世纪 70 年代,南迁合肥,艰难困境之中,白手起家,不忘薪火相续;筚路蓝缕,更是励精图强。及至改革开放,春江春暖之初,即厉兵秣马,天下为先,被喻为“招风大树”,名声鹊起。90 年代以来,坚守精品理念,遵循两项方针,稳步健行,和谐发展。且看最近几年:院士、名师、大家向聚,“杰青”、“长江”、“百人”翻番;青少学子健康成长,重点学科连创新高;科研基地增多变强,“十大进展”5 年连贯;办学条件加速改善,社会排名止跌反弹。纵观一路行来的发展历程,可以说,中国科大的半个世纪,砥砺沧桑,艰苦卓绝;半个世纪的中国科大,岁月如歌,硕果辉煌!

2003 年 5 月的那个非常时刻,我由北京派来科大。受中国科学院文化熏陶 40 载的我,形成了个习惯,每到一地,总爱以理性的方式,从文化的视角,看看现象背后的东西。这几年中,无论我行走在绿树掩映、静谧雅淡的校园小路上,还是排队站在学生食堂的队列里;无论

我溜进教室坐在后座听听讲课,还是在实验台前跟老师聊聊科研,常常自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哪些东西贯穿着科大的 50 年历史,不断不止,绵长恒久?是什么力量把诸多才俊聚于一苑,不离不散,共济同舟?渐渐地,答案开始清晰了,特别是 3 年前,我们启动了“科大精神”讨论之后。这个世上,人有人格,国有国魂。每个知名大学,都是文化的长青之藤,应该都有自己的校魂、校格和校风。我想,使科大 50 年自强不息、凝科大人不离不弃的东西,就是科大的校魂、校格和校风!它们,饱蕴在博大而鲜活的科大精神文化之中。

校魂,就是学校的核心价值理念,它表明学校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为何而生,为何而存。科大的校魂,与生俱来,就是创新报国,卓越至上,我创新,故我在!这个魂,来自于当年创建科大的两批杰出人物: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和新中国的科学始祖。是他们强烈的爱国、强国情结和科学、创新精神,铸就了中国科大永久的校魂!几十年来,正是这一精魂,凝成了“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特色校训,确立了“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的宏远使命;正是这一精魂,化成不竭的财富和动力,独步学林,追求卓越,培育出大批英才校友,研究出无数创新成果。

校格,有如人格,代表基本秉性、品格,乃为人之道,行事之规。科大人特喜梅花,以至视其为图腾,坚持作为校徽而不改。这大概就是物我相通的缘故吧!梅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你看它:凌霜傲雪,骨硬节挺;疏枝飘香,气韵高洁;引来百花,俏不争春。回望科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危难压顶之时,坚韧自强,不输不败;时髦风头来了,不跟风随潮,只唯实求真。高格治学,低调为人;平和淡定,不扬不张。这不正是梅花品行的生动写照吗?!

校风,是学校的作派、风气,包括学风、教风和校园风物,有一定外在性,感得到,看得出。在科大东区不起眼的一角,有座孺子牛雕塑。两头初生牛犊,日夜俯首奋蹄,勤勉务实之风,让人肃生敬意。其实,这正是科大校风的镜像:教师以大爱之心,默默躬耕于学子的心田,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学生则以学习“不要命”闻名,常酣读于通宵教室。事业追求科学,管理崇尚民主。整个学校,从人到事,从景物到空气,都显得那么的纯朴、实在,理性、天然,少见心浮气躁,拒绝虚假奢华。

文化,亦即人化、化人。人是文化的主体,也是文化的载体。长期以来,几代科大人共同创造的校魂、校格和校风,酿出了“科大味儿”,浸润了一批批科大人。八、九十年前的欧洲,尼·玻尔等一批中青年科学家,在创立量子论的过程中,形成了风格独特、学术卓越的哥本哈根学派。在任何会议上,只要一讲话,人们就能认出:这老兄是哥本哈根来的!而今,无论东西南北,海内海外,带“科大味儿”的科大人也是不难辨识出来的。科大的校魂、校格和校风,正化成无形的科大名片,伴随科大人一生的事业、生活;已化成“永恒的东风”,为创建世界一流的科大而导航、助推!

我創新故我在
科教報國五十年
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校五十周年
陸永祥 二〇〇八年三月

按科学规律办事 是科大的优良校风

中国科学院院士 校长 朱清时



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启动 12 年科学发展规划,研制“两弹一星”。为了培养新型尖端科技人才,1958 年,党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型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年,中国科学界的大师云集中国科大,他们言传身教,一开始就为中国科大铸就了优良的校风。

据 58 级老校友回忆,1958 年开学时,正值国内大跃进和教学改革时期。几乎所有学校都停课,投入到大炼钢铁与教育改革运动中间去了。有些学校的学生甚至很长时间都不回去上课。而我们的老校长郭沫若对党委书记郁文同志说,学生还是要上课的。所以中国科大只停了 3 周课,是中国大跃进时代停课时间最短的学校之一。1959 年全国搞技术革新运动,又有不少学校停课,中国科大一天未停。“文革”中搞“上管改”,就是工农兵学员边“上学”,边“管教学”,边“改革教学”。当时有一些学员要罢课,要“管”、“改”。但是中国科大教师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宣布只要有一个同学到课堂上课,期末就照样考试。因此,我校即使在“文革”那种特殊气氛之下,也坚持了给学生上课。

1967 年底,中国科大南迁安徽。1971 年 9 月,学校改为由安徽省与三机部双重领导,以三机部领导为主。三机部只能留下我校约一半的对口专业,学校面临解体。学校教职员工齐心协力,坚持按照 58 年建校时理工结合的

方针办科大,并力争重回中科院的系统。持续努力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终于在 1973 年 3 月改为由安徽省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安徽省为主,至此中国科大重回了中科院的怀抱。历史上,大学被分分合合的例子很多,却少有像科大这样,在面临解体危机时,全校团结一致,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不仅没有解体,而且绚丽重生。

“文革”中大学招生采取 16 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查。使得学校招生质量面临了很大困难。1975 年中国科大在中科院领导的支持之下,为中科院代拟了《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明确提出高考招生应采取“自愿报名,群众评议,中学推荐,上级领导审核,经过文化考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全面考察复核,择优录取”,当时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实际上就是要恢复高考。中国科大在当时能够这样作,充分显示了按科学规律办事的校风和勇气。这件事虽然当时没有成功,但是为 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打下了基石。1977 年我国能够顺利地恢复高考,实际上与中国科大 1975 年的这场抗争是分不开的。

在我国拨乱反正以后,中国科大又连续做了一系列按科学规律办事、领全国风气之先的大事。一是首创少年班,二是创立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三是建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四是创办教改试点班。现在回顾起来这几项都是非常具有胆识的,而且完全是按照科学规律办的大事。这些创新举措使得我校在安徽重生以后,迅速成为在国内领风气之先的大学。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国教育开始大跨步发展。既要办精品教育,又要办大众教育,此外还要办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和终身教育等。在这个时候,我们认识到,这些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应该由不同类型的高校去办。中国科大选择了专心致志,集中精力走提高内涵和质量之路。1998 年学校确定了 16 字办学方针:“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使学校坚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今天学校在教学和科研上人才辈出、成果不断的大好局面。

中国科大办学 50 年凝聚的优良校风,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不跟风,不盲从,一切按科学规律办事。



“所系结合”：传承中科院母体的优秀文化

党委常务副书记 副校长 许武



优秀的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是大学引领社会精神、形成独特魅力的源泉，也是创建一流、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科大诞生于中科院母体，先天性地带来了研究所的优秀文化基因。中科院“科学、民主、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和“唯实、求真、协力、创新”的院风与科大艰难曲折的办学历程结合在一起，在科大的土壤孕育出独特的“科大精神”。

强国情结：
“科教报国 乐于奉献”

中科院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和尖端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科教报国”的精神首先发端于中科院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例如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钱学森、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郭永怀，等等。郭沫若老校长所题写的校训“红专并进，理实交融”，亦源于“科教报国”的精神。

科大创办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两弹一星”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在 60 年代，一大批科大毕业生直接被选派到西部，从事核

武器和导弹的研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默默无闻地为国家、民族奉献了一辈子，至今仍然留在西部偏远的基地工作。尽管我们不是军校，毕业生的总量也比较小，但是，我们有 20 位校友在国防科技领域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或相当职务。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向国防科技战线继续输送优秀人才。我们的毕业生也在各个领域实践“科教报国”的理想。例如：“龙芯之父”胡伟武、“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邓中翰、“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光学成像探测系统指挥相里斌，等等。科大毕业生之所以能够扎根边疆，不计个人得失，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奉献，甚至“献了青春献子孙”，都源于他们在学校受到老一辈科学家强国情结的感染和激励，源于“科教报国”精神理念在学校的传承。因此，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奋斗，创造一流业绩，达到一流水准，从来就是科大人的历史使命。由这样一种强国信念所激发出的责任感与创造力，是持久的、强大的，更是科大人拼搏奋进、永不言败的动力之源。

科学精神：
“民主 宽容 平等”

来自不同研究所的专家同时在科大授课，为科大带来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授课风格，使得科大逐渐形成了兼容各种学派和观点，倡导学术自由的良好风气和氛围。在科大，较少有论资排辈，较少有学术门户之见，较少有学术压制，院士、专家的权威与青年才俊的闯劲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科大的年轻学术骨干不受压抑，成长很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创新思维，促进了创新实践，催生了创新成果。这也是科大搬迁到合肥之后，在地理位置、收入水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仍然能够吸引一批优秀中青年骨干的重要原因。因

为在科大，很多老教授非常乐于帮助年轻人，指点年轻人的成长，甚至甘愿为他们铺路。在这样的环境里，科大的年轻人才能够得到很多发展机遇，迅速成长起来。

创业精神：
“勤奋踏实 追求卓越”

科大数学系首任主任、原副校长华罗庚先生有句名言，至今还刻在他的铜像下，那就是“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教诲和感染下，科大师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比较踏实地做学问。科大学生的刻苦用功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异常出名，一直流传有“不要命的上科大”的说法。现在，很多到过科大校园的专家和领导都被科大这种宁静、勤奋的校园氛围所感染，由衷地称赞科大学风之浓厚，认为科大是真正读书、求学的地方。

正是由于“勤奋踏实、追求卓越”的优良校风，科大能够不受浮躁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唯上，不跟风，坚持精品大学的办学理念，始终按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办学。

“爱校荣校”
的情怀代代相传

无论是在科大创办初期，还是南迁合肥二次创业的艰难岁月，严济慈、钱临照、杨承宗等老科学家和一大批优秀教师与科大同舟共济、荣辱与共，与科大这片土地结成了独特的感情。许多老科学家将在科大办学作为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将科大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他们这种情怀也传递给了自己的弟子，传递给了一代代科大人。“爱校荣校”成为科大校友最显著的特征，也成为科大创建一流大学最坚强的后盾。

校庆感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 常务副校长 侯建国

金秋 9 月，成熟与收获的季节，全球科大人即将迎来母校的 50 岁生日。随着 9 月 20 日的逐步临近，当我行走于熟悉的校园，看到身边匆匆而过、朝气蓬勃的年轻同学，感激与自豪交织。作为一名曾经的学生，一种对母校和恩师教育与培养的感激油然而生。作为一名现在的教师，更为学校 50 年的成就和光荣感到自豪与骄傲。

50 年前科大从北京玉泉路起步，虽几经坎坷，但几代科大人坚持理想，迈向建设一流大学目标的步伐总是坚定而有力。对一所大学而言，50 年的时间并不算长，和许多百年老校相比，科大还显年轻。但科大人始终坚守的办学传统与理念，形成的学校文化和精神气质，使学校在中国众多大学组成的光谱中独具特色，成为一所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府，不断为社会贡献各领域的精英人才和重大科技成果。

育人为大学之本，不论是学校初创的高速发展时期，还是南迁后濒于解体的艰难岁月，或是新时期受到经商、扩招之风对学校冲击之时，科大始终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名师上讲堂，是科大的一道风景线，科大的院士、教授始终站在教书育人第一线，更有 50 年坚守本科生基础课堂教学的感人事迹。校友们常说，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科大的校友最团结，对母校的感情最深。我想，这种情感很大程度

上源于校友心中珍藏的美好回忆。每个时期的科大学生，都深切感受过母校和老师的关爱。创建时期，郭沫若校长用稿费给学生发压岁钱；1980 年代，学校为学生宿舍供应暖气；近年来，学校启动“爱心工程”和“隐形资助系统”等等。50 年来，科大坚持“教学优先、学生为本”，人才培养成果丰硕，毕业生中涌现出院士群体、将军方阵、杰出青年团队、优秀企业家队伍，群星璀璨。科大 50 年最大的成功是人才培养的成功。

每一所名校，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追求卓越是科大文化中最重要特质。因为追求卓越，科大的创办者和学生一起以抗大精神办学，仅以一年有余时间，使学校进入全国重点大学行列；因为追求卓越，科大人在南迁的艰难时期，不放弃，不低头，在合肥师范学院简陋校园中二次创业，恢复了学校的活力与生机，并乘改革开放之东风，锐意进取，成为中国高等学校中一棵“招风的大树”；因为追求卓越，科大人的眼光和目标总是紧盯最前沿、最关键的科学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两个国家实验室，连续 5 年有成果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高水平论文引用率最高等等都是科大人拒绝平庸、永争第一精神的体现；因为追求卓越，“学术优先”成为科大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一切以学术为出发点，学术在科大受到最高的尊重；



因为追求卓越，科大人总是满怀强烈的危机意识、使命感和主人翁意识，关心学校，热爱学校，形成了民主办学的优良传统。

50 周年校庆是科大人的盛大节日，也是科大迈向未来的新起点。光荣 50，梦想百年。“千生一院士”是科大办学 50 年向国家和人民交出的一份最杰出的答卷，待到科大百年华诞之时，期望我们的母校能成为培养中国本土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最多的高校。也许我看不到这一天，但我相信今天活跃在校园中的年轻同学，他们将传承和发扬科大人的优秀传统与品质，不断追求卓越，让这一梦想成真。

施蕴渝 责任心 事业心 使命感

1970 年科大迁到安徽时,我 28 岁,科大大多数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有科研经验的年纪大的老师不很多。我觉得,科大后来能够发展,首先要归功于“文革”结束,国家改革开放,中国科学院把一批年轻教员送到国外进修。1979 年我出国时,对国外的情况完全不了解,那时的情况与现在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国外两年,最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知道了中国跟世界上有多么大的差距,知道了为什么需要改革开放,也知道了应该如何搞科研。

这批留学生绝大部分都回来了,带回了新的东西,使科大 80 年代在国内的地位很快确立起来。科大那时的条件仍然非常非常差。我在国外主要是做计算生物学和结构生物学研究,回国后发现没有任何研究条件。那时科大只有一台公共的大计算机,但是计算速度太慢,程序放进去算一年也算不出结果来。我 1981 年回国,一直到 1985 年才申请到 5 万元的第一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从 1987 年到 1997 年,10 年的时间里,我做科研的经验和体会是:第一要选准方向,我们认定计算生物学是一个新的交叉学科方向,尽管国内做得应该不多,但是在国际上是一个新的重要的学科方向;第二是团结合作。我回国后,钱临照先生对我说,你这个方向是物理和生物结合的方向,应找两位学物理的学生跟你一起做。后来他就找了两位 64、65 级的年轻物理老师跟我一起工作。再后来,又有 1 位学化学的老师和我们一起工作。他们对我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贡献;第三是要努力,专心。我们没有好的条件,但是大家非常专心,这是做科研必需的。今天,科大经过了“985 工程”和“211 工程”建设,我们实验室的条件,仪器设备、人员应该说比过去要好得多。

所以,科大精神要我说,就是科大人的责任心、事业心、使命感,以及对科大的热爱。科大人奋力拼搏,自强不息,努力攀登,追求卓越,不断创新。我认为这就是科大精神。如果科大人没有这种精神,那么在科大下迁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变成第二流、第三流的大学了。

(作者 1965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生物物理系,现为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

舒其望 在勤奋的基础上建立自信心

我理解的科大精神,首先是科大人对于困难的态度。碰到困难怎么办?我感觉科大的学生有足够的自信心去克服这些困难。这个自信心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勤奋的基础上,碰到困难你就加倍努力,然后你有很大的自信心能够去克服它。

1977 年的高考是每个省独立命题的,每个省的考卷是不一样的,进校以后系里组织了一次摸底测验,考高中的数学。当然这和任何一次考试都一样,有的同学考得好,有的同学考得不好,也有不及格的。但是我感觉到这并没有影响到同学们的自信心。考得不好,就更加努力地去学习。事实上当时很多考得不好的甚至不及格的同学,后来都做得非常优秀。徐森林老师开始教我们微积分的时候,曾做了一个调研,因为不少同学在进校之前就自学了大学的微积分,是不是还需要学?他让自学过微积分的同学参加测验,结果没有一个及格。于是大家都理解到,自学的内容并不是什么数

学分析,那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微积分演算而已。后来,一个学期的微积分上下来,很多同学在这个相当有难度的学习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771 的学习非常非常地刻苦。大家都在认真真地复习课堂上的功课,认真真地演算习题。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辅导员没有督促大家去学习——因为这是完全不需要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督促同学要注意休息,睡眠不要太少,不要把身体搞坏了。像不交作业、抄作业或者是考试作弊,基本上是没有的。同学们学的好也罢,暂时有些困难的也罢,总之都是非常非常地努力,都有很强的自信心,都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现在暂时碰到困难,我努力了,我一定能够赶上去的。

(作者 1982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数学系,现任美国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教授,中国科大“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曾任美国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主任,是改革开放以后担任美国名校数学系主任的第一位大陆留学生。)

蒋华 科大同学的眼神就是一种希望

记得科大 40 周年校庆时,科大校友在哈佛大学的燕京礼堂组织了一个庆祝活动,邀请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教授做嘉宾,我在主持的时候问他对科大的定位和看法。他说:“严格讲啊,在中国只有一所学校和 MIT 是等同的,那就是中国科大。”他对科大的评价不是随口说的,他有好几位科大的学生,他说科大的学生和别的学生不一样,一个共同点就是勤奋。我想,中国最杰出的几所大学的学生,聪明程度都差不多,但在勤奋这一点上,科大学生更为突出。

我看了一些统计,科大的毕业生中平均一千人出一名院士。院士里面学物理的比例更高一些。今天听报告的有 300 多学生,所以,你们当中应该会诞生一名院士。在别的学校没人敢说这话,“千生一院士”是科大最好的名片。

前年我和几位老校友张树新、周全等,在北京准备搞一个基金帮助科大,改变科大的目前状况。周全说他曾经对科大失去信心了,但是回了一趟科大,感觉就完全改变了。周全是我们国家风

险投资第一人,据说最近出来的全国风险投资排名前 50 位里,他是排在第一的,他最早在中国做风险投资并做得最大。他说他回安徽考察一个企业,顺便回了趟科大,觉得有些震撼。他说在北京呆了这么些年,清华北大的学生接触很多,一到科大,感觉完全不一样,找到了几十年前的那种感觉。他说从那些学生的眼睛中能够看出一种很淳朴的光亮——这就是中国的希望,然后就觉得要为科大做点事。这些措辞可能有些夸张,但是我觉得他非常地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说,不到头破血流,不要放弃!在座的每个同学以后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人生,我相信你们都能够成功,你们不会为上科大感到任何的后悔!

(作者 1982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物理系,现任波士顿应用科技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三联集团执行总裁及三联科技集团总裁,留美华人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大理学院客座教授。)

三言两语

辛厚文(理学院教授 原副校长)

科大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创新。“我创新,故我在”。没有创新,就没有科大的存在。科大 50 年的历史,就是不断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历史。科大所提出来的新的办学思想,符合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大的办学模式,现在已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种模式,很多工科大学都已经发展为理工科大学。在这种新的办学思想指导下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确实非常优秀,思想活跃,有后劲,适应发展新兴交叉学科领域对人才的需要。

为什么科大会有如此强的创新精神呢?科大的创新精神首先来源于对国家、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其次来之于抓住机遇、勇于实践的能力,同时也来源于科学的态度,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认真做好每件事情,才使得我们的一些改革设想得以实现。

韩荣典(理学院教授 原副校长):

中国科大超常规发展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科大领导、老师、学生、职工在办学和学习过程中坚持“遵循科学规律,不断拼搏进取”。科大自成立之时起,无论是教学理念、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育教学制度和措施,无不是符合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使命,符合教育规律,使科大得以超常发展,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成绩卓著的人才,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彭子成(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我们这一代人对科大精神的理解,可以归纳为勤奋、创新、诚信,这三者应该是科大精神的支柱,包含着我们科大人的那种坚韧不拔,永不言败,不知疲倦,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精神。勤奋是科大精神的本质,创新是科大精神的动力,诚信是科大精神不可或缺的灵魂。

吴奇 没有一个同学敢一个星期不看书

当年在科大念书的时候,大家都很刻苦,所以我跟现在的同学们,包括香港的同学们讲,他们都很不理解。他们问我:Do you have any fun?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乐趣?回想一下,大学时好像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去食堂,吃完饭马上就上教室,还要占位置,要提前半小时才能坐第一排,都争着去坐第一排。现在我教书,发现学生都喜欢去最后一排。我们当时喜欢坐第一排,因为坐第一排不容易受到其他同学的干扰。当时,大家去得都很早,甚至有先把书包放在教室,再去食堂吃饭的。中午吃饭后就做实验,当时化学物理和生物物理专业是整个科大实验最重的两个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跟化学系一起上课做实验,还要跟物理系一起上课做实验,所以我们要上两个系的课,做两个系的实验。到了晚上,基本上就是做作业,所以我到了科大,才真正体会到中国的一句成语,就是“逆水行舟”。我可以讲,没有哪一个同学敢一个星期不看书。

科大的氛围是比较宽松的。当时马老师教我们激光化学,他告诉我,你可以不学这门课,如果你以后做激光化学的话,以后再学这门课也不迟;如果你不做这个,那你学这门课一点用都没有。当时我对电动力学这门课感兴趣,但是这门课,我们化物理是没有的,是在近代物理系。我非常想学这门课,就和给我们上物化的老师商量,说我可不可以不来听课。老师说没问题,你就不用上课了。我说我保证做作业,因为我是课代表,我保证把作业收完交给你。但是我不来上课,我只交作业参加期中期末考试,老师就同意了。我想这在很多学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所以我现在当老师,你不来上课,你能通过,你是最好的学生。我现在都给学生两个选择,一个是作业 40 分,期中 20 分,期末 40 分,还有一个选择是你不交作业,只参加期中期末考试,这样就是 30 分和 70 分,因为有些学生他能学好,也不需要来交作业。

(作者 1982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现为美国物理学会 Fellow,中科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科大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朱近康 位卑未敢忘忧国

科大 1970 年前到安徽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我们无线电系的大多数教员被安排到淮南煤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当时矿井的最里面，特别缺氧，要体质比较好才能进，出汗很多。就是在那个环境下，下矿井的时候，大家还不太愿意忘记我们是老师，可能以后还要教学生。有老师开玩笑说，不知道以后有个大学生在后面叫我们一声老师呢。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夏天，天比较热，常常跑到外面的煤堆上面打着赤膊聊天。在办公室要说到专业就有人管，所以干脆到外面煤矿堆上聊天。常常说到学生怎么办？我们老师怎么办？还有老三届的学生，还没有毕业，没学到东西，他们怎么办？可见科大老师并没有完全忘记自己的责任。后来学校提出把老三届招回来，接受再教育。我觉得跟那段时间科大老师的共同担忧是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科大东区有相当一批楼是我们从北京迁来以后盖的，最早的办公楼是现在大操场旁边、化学楼南边的那幢。那个楼是教员自己盖的，我也参加了。当时党委书记刘达也参加了搬砖。大家在搬砖的时候就跟刘达讨论，说这样干下去，三年、五年过后，我们怎么教学生？我们好多新的东西都不懂。他说，这是个问题。我想，这和以后学校派出老师、学生出国进修、深造，从国外聘请教授到科大来讲学，是有关联的。

校训里有句话叫“红专并进”，我想，所谓的“红”，不仅仅是讲政治，还有一个素养——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以及一个人的公共道德和个人素养。国家在困难时期大家要为国家挺身而出，国家在发展时期大家能给国家出力、出汗，这才是我们的希望，是一个科学技术人才应该做的，或者说应该具有的。

（作者 1966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系，现为中国科大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教授，中国科大个人通信与扩频实验室主任。）

李定 官本位是没有市场的

科大每年要开一次教代会，每次教代会都有一个内容，叫大会质询，也就是教职工问学校领导问题，提出一个问题，学校领导必须很认真地进行回答，就像答记者问一样。在科大，官本位是没有市场的。因为科大的传统就是强调教学科研，强调学术的东西，所以你要从事管理，你就是奉献，因为它会影响你的生活，会影响你的收入，甚至会影响你的声誉。我当年做系主任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就问，你为什么要去当官呢？

另外，做管理也意味着会从批评者变成被批评者。1997 年我回到科大，第一年我是一个普通的教授，你想批评谁就批评谁，没人阻拦你。作为普通的老师，你可以提意见，你可以批评校领导，你可以当面批评，没事的。我 1998 年做了系主任以后，情况就变了，我还可以批评领导，还可以给校领导提意见，但对系里面的老师我就要很小

心，做什么事情就得说，某某你能不能帮帮忙，我就得去求他了，所以关系就不一样了。到后来当校长助理、当副校长的时候，谁也不敢批评了。有一次，我搭一位学院院长的车到市里去。我们刚在一起开完一个会，要分流一些人员到相关专业的学院去。一上车他就开始跟我发牢骚，开始批评我，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他批评我，我只能跟他解释，我不能跟他对着干。因为从管理上来说，我是他的头，我必须听他报怨。报怨完了以后，在我下车之前，他说对不起，我刚才说了你那么一通，这个事情既然学校已经决定了，我还是会服从的，只是觉得这样做不合理，你下车吧。

就这么简单，在科大就是这种文化，我不会有生气，也不会抱怨。这就是科大的文化。

（作者 1983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现任中科院基础局局长、中国科大教授。）

张树新 理性思维的训练至关重要

我离开科大的时候，是不太喜欢科大的，我当时痛恨没有坚决地去北大。因为我是想去北大的，我高中的学校不让我去，我父亲也不让我去，所以我只好来科大。我觉得我念了几十年科学，还是不喜欢科学。我要是去了北大就很容易转系，在科大没的转，当时只有 9 个学科，现在还有什么人文学科，那时根本没有。另外呢，我觉得所有的学校都念四年，为什么我们要念五年？要不就早一点嫁人了哈。

过了十年以后，虽然我可能已经把化学元素周期表还给老师了，都记不全，那些知识我可能都不知道放到哪去了，但当你面对一个事情，你会发现你会有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判断。我们公司的很多人都跟我辩逻辑，后来发现这原来都是数理基础练出来的，像做一个证明题，因为所以，ABCD，完全是一个思维方式。有的孩子考大学，问该学什么？或许有人说，学金融。本科学金融，他会懂吗？还有人说学经济管理，真是蛮奇怪的。我觉得现在大学的学科设置有点问题，你如果想学金融，本科的时候建议你学数学；如果你真的想去学管理，那你还不如本科学物理、化学、计算机，信息都可以。其实你要真做管理，你做技术的要做 TEAM LEADER 这时候再去学管理什么都来

三言两语

蔡有智（原副校长）：

科大精神概括起来有四方面内涵：立新、远志、笃学、故我。

“立新”，是科大最根本的特征。科大的“新”，“新”在打破理工分家的教育模式，走出一条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路子；“新”在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新”在学科专业设置都是全新的、与众不同的，面向科学技术前沿、填补国内空白的交叉学科。

“远志”，就是树立远大志向。我们立的是国家的大志，科学的大志。在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们要奋起直追，就必须要有远大的志向。我们培养的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尖端人才”、“高水平的人才”。

“笃学”，就是勤奋学习。我校有很好的学风，很强的进取心，非常勤奋刻苦。“不要命的上科大”，体现的是一种学习精神和学习热情。

“故我”，即依然故我，有独创性。认准了目标我就坚持，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得及。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个成长过程中，理性思维的训练是非常关键的。

科大精神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我个人来讲，非常高级的理性思维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有一个人特别较劲，一直在那讲逻辑，我后来问他，哪毕业的？他说他毕业于科大，其实那完全就是思维方式，跟数学没有关系。我们每天面对太多的事情，商业也好，人生也好，我当时做一个公司的时候，我其实不懂技术，我们那个技术部门每天打架，他说用 UNIX，他说用 NT，还有人说用这个那个，我可以那听，听完之后发表评价。为什么呢？你有一个方法，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曾经有一个笨的办法，每天早上把所有问题列在上面，到晚上打钩。每个问题都排序，听起来很像一段程序。我想，如果要是把思维方式调整成这样，你会让你的工作效率提高许多，做事的方法非常直接。所以我要感谢学校，在我的五年里，在这个很关键的时期，培养并形成了我的思维方式。

（作者 1986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应用化学系，现任联和运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主席，兼任互联互通网络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孙立广（地空学院教授）：

“红专并进，理实交融”是科大根本的精神，与时俱进地理解这八个大字，“红”就是爱国，就是清白做人；“专”就是认真做事；“理实交融”就是为了创新。科大坚守了这个基本精神，自由是创新的空气和土壤。值得庆幸的是，科大没有老少学阀的存在空间，因为科大人珍惜学术自由和教学民主的校风。浮躁的时代，科大依然是做学问的热土，依然保持了优良的学风，这是凡了解科大的学术界所公认的。我所理解的科大精神就是八个字：挑战、创新、唯实、宽容。

刁亚崑（理学院党委书记）：

“不要命的上科大”这句话在科大学子中一届届流传，五、六十年代的学子以这句话感到自豪和骄傲，无论“穷”、“富”，大家一样“不要命”。进入 21 世纪，“不要命的上科大”是否还能流传呢？字面意思看似不适合时代的表征，但其中蕴涵的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自信、无所畏惧的创新勇气，以及对科大的热爱自豪的情感，万万不可丢失。创一流大学，没有踏实的奋斗，不付出艰苦的努力，空喊口号，“一流大学”只能是空中明月。

我是 1961 年考入中国科大的，按照黄埔军校的说法，我算“科大 4 期”。到校的那天，下车时已是晚上 9 点多，校车来接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教我们唱校歌——《永恒的东风》，“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从此成为我终身的座右铭。

我从四川来，不知道北方的气候是什么样，床上就铺一个床单。过了几天，看到床上多了一床被子，感到很奇怪，就问班主任陈老师：是谁把被子给弄错了，弄到我的床上来了。陈老师说不是错了，你们这几天上课，我到各个宿舍去看了看，发现你们南方的很多同学，不知道北方的天气，这样会冻坏的，这个褥子是组织上补助给你们的，你就好好学习吧。当场我感动得一句话说不出来。

有一句口号是“生我是党，养我是党”，现在听起来大家可能觉得是在喊口号，但在我们那一代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所以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志愿都是“服从祖国分配”。我们觉得，党和国家培养了我们，报效祖国是我们的义务和职责。我们应该感恩。

今天的同学们，哪怕你现在是自费在上学，不像当年国家养我们，但还是要利用国家提供的教育资源，所以不但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也要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还要感谢国家和人民培育之恩。中国一直有这个传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懂得感恩，才能让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和继续发扬。

（作者 1966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空气动力学专业，现为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与发展中心研究员。）

胡成行 母校教会我感恩

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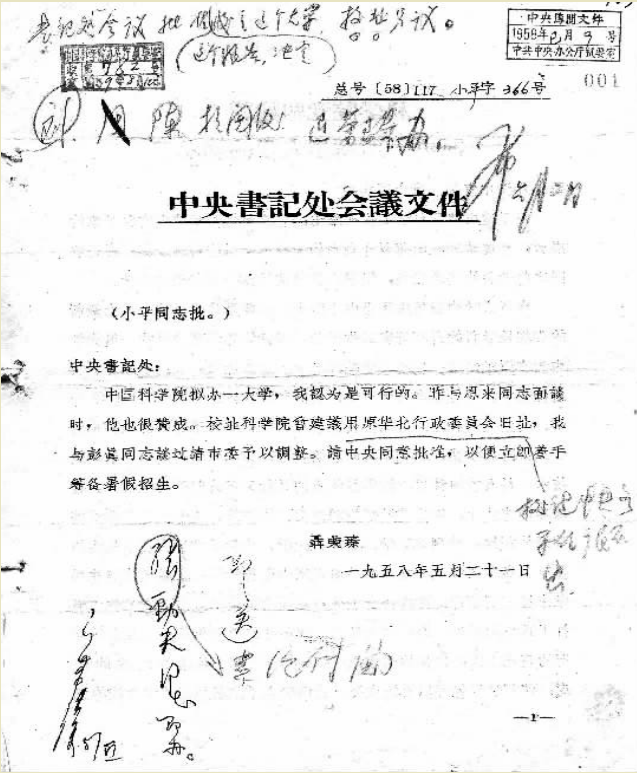
1956 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出《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当时在中国，最新技术的应用还处在萌芽阶段，和这些新技术有直接联系的某些重要科学部门，如原子核物理、空气动力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等几乎还是空白，或十分薄弱，科技战线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而当时中国的高校普遍存在理工分家、教学与科研脱节的弊病，所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满足国家需要。于是，利用中国科学院自身优势创办一所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成为老一辈科学家的共同构想。



《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21 日报道称：中国科大的成立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酝酿与审批

1957 年 10 月至 1958 年 1 月，中科院主要领导参加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访苏归来，中科院领导和部分科学家正式倡议，按照教育和科研紧密结合的方式，由中科院创办一所新型的理工科大学。1958 年 5 月 9 日，中科院党组向聂荣臻副总理呈递办学报告。聂荣臻随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获得总理首肯。5 月 21 日，聂荣臻副总理写报告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国科学院拟办一大学，我认为是可行的。昨与恩来同志面谈时，他也很赞成。……请中央同意批准，以便立即着手筹备暑假招生。”1958 年 6 月 2 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亲笔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审核同意了书记处的决定。



筹建

1958 年 6 月 8 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主持召开学校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学校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 月 18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登载中国科大 1958 年招生简章。7 月 28 日，中科院副秘书长杜润生、郁文主持会议，决定任命 13 个系的主任。9 月初，北京地区 150 名新生提前报到，参加整理校园和修建操场等义务劳动；9 月 15 日，京外新生办理报到注册手续，全校共录取 1634 名学生。学校正式开学前，聂荣臻副总理在郭沫若等陪同下到校视察，与同学们亲切交谈。当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个个精神饱满，许多同学穿着补丁衣服，不少人还光着脚板，有些同学甚至从北京站挑着行李走到玉泉路校园时，聂荣臻非常感动，连连称许，勉励同学们继承抗大优良传统，创立艰苦朴素的良好学风。9 月 17 日，郭沫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他亲笔起草的“开学典礼致辞”内容，周总理说“可以，是施政方针了”。

成立暨开学典礼

1958 年 9 月 20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大礼堂隆重举行。郭沫若作题为《继承抗大的优良传统前进》的致辞，聂荣臻副总理作题为《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的重要讲话。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为题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科大的诞生。开学典礼后，郭沫若等和同学们一起到学生食堂一起用餐。晚上，学校举办文娱晚会，郭沫若兴致勃勃走上舞台，即席朗诵了他的诗词。1958 年 10 月 22 日，中宣部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任命郁文同志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 语录 ●

聂荣臻副总理：

在科学技术方面，必须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选拔优秀高中毕业生，给以比较严格的科学基本知识和技术操作训练，在三四年级时，让学生到相关研究机构中参加实际工作，迅速掌握业务知识，加快培养进度，以便在一段时期内使祖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兴的科学部分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筹办的。经过很短的时间，在郭沫若院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筹备工作，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了。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

郭沫若校长：

我们的学校是新建立起来的，前无所承，缺乏经验，这是我们的缺点，但也正是我们的优点。毛主席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我们的学校如果说可以说像一张白纸，就请把她办成为最新最美的学校吧！我们不仅要掌握尖端，还要创造尖端。我们不仅要攀登科学的高峰，还要不断创造科学的高峰，使高峰高到没有止境。我们的大学是尖端科学加共产主义的大学，也就是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大学。毛主席说过：“搞科学的人应该懂点文学，搞文学的人应该懂点科学。”我们搞尖端科学技术的人尤其应该懂些文学艺术和各种体育活动。在红透专深的保障之下，同学们不妨同时成为诗人、画家、音乐家、戏剧演员、运动员或者其他。

（均摘自在中国科大成立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 记忆 ●

玉泉路校址

中国科大从 1958 年 6 月开始筹办、登报招生到 9 月 20 日开学，只有不到 4 个月的时间，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校址问题。1981 年 3 月 12 日，张劲夫谈及此事时说：那时胆子大，我们就在报上登了广告，什么时候招生，招多少人。可是，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办？广告上登的校址是北京西苑。这一宣布，中调部的负责同志着了慌，因为西苑的房子是他们单位的。他们找到杨尚昆同志说，郭老办科技大学要占我们房子，怎么办？于是尚昆同志就找我，说：“劲夫啊，你们怎么搞的，也没同我商量商量。”我说：“广告已经登出去了，不好改了。”尚昆同志感到难办，说：“我给你想个办法，中央党校二部的房子刚刚交给军委，地点就在玉泉路八宝山旁边，只是这块校址此前已商定交给解放军工程兵设计院。你去找军委秘书长、参谋总长黄克诚同志。”我就去找黄老请求支持。黄老在军内很有威望，当即表示支持，下令已进驻的工程兵设计院搬家。聂总也表示支持。我又向郭老汇报这件事，我对郭老说：“借你的牌子我俩一起去看看工程兵设计院的院长唐凯同志吧。”我俩一到，唐凯同志已迎了出来，热情得很，一见面，唐将军快人快语主动先开了口：“郭老来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保证在一周内搬家，绝不耽误开学。”1958 年 7 月 21 日，学校校址从西苑改至北京复兴路门外玉泉路 19 号，筹备处从中科院天津街 3 号搬至玉泉路 19 号办公。

“六大基础课”

创办科大期间，院内科学家兴致很高，在玉泉路多次讨论科大的方针、任务。当时十三个系的主任互相熟悉，都有同样的语言，每会必到。郭院长更是如此。大家发言踊跃，讨论决定：不采取苏联的“物理工程学院”的方针，而是从基础课做起。在讨论基础课时，大家赞成除了数理化外，科大学生一律要读外语。当时国内大学都未这样做，郭老决定将外语列入基础课。数、理、化、外、电、图六门课从此成为科大基础宽厚的柱石。

期许诺奖

中国科大在成立初期，就已经提出科大人不仅要为“两弹一星”服务，也要争取获得诺贝尔奖。1958 年，教务长张兴民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如果将来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能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出现一个像爱因斯坦式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科大培养的成果。”

建校劳动

1958 年 9 月 3 日开始，一部分提前报到的同学进行了修建操场的劳动。每日参加劳动的平均 70 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北京地区的同学，也有少数同学来自四川、辽宁、福建等地。7 天共锄草约 19000 平方米，压场约 12000 平方米，填土约 250 立方米，安装活动篮球架 2 付、肋木 2 付、双杠 15 付、单杠 9 付、平衡木 2 付。这些工程如果包给外面做的话，至少需要 3000 元。



建校初期的办学

全新的专业设置

建校伊始，中国科大确立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国际科技前沿，注重科学与技术结合”的学科建设方针，共设立了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技术物理系、化学物理系、物理热工程系、力学和力学工程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等13个系41个专业。这些系和专业全部围绕当时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家战略需求，同时体现了新兴、交叉、尖端、基础的鲜明特征。

1959年，科技情报大学并入我校，增设科技情报系。1964年4月，学校原来的13个系合并成数学系、物理系、近代化学系、近代物理系、近代力学系、无线电电子学系等6个系。根据中科院的要求，系和专业调整后，专业课程基本不变，教研室继续保留，以便经常和研究所取得密切联系。

独特的办学模式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即中科院集中全院人财物支持中国科大办学，研究所和我校的系科专业对口合作，资源共享。这是我校创办时由中科院确立的方针，也是我校最为独特的办学模式和最显著的办学特色，体现了教育与科研双赢共进的强大动力，使我校得以超常

规发展，迅速跻身一流，为中国高等教育探索了一种教育与科研紧密结合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宽厚的基础教学

中国科大在教育界最早强调宽口径培养人才，5年学制中用3年时间讲授基础课程，选用最深、最难的教材，专业课教材一律新编，吸收最新的科技成果。华罗庚副校长亲自担任教材审委会主任，各系成立教材编审小组，做好教材编审工作。学校还在国内大学中率先将外语列入全校基础课，数、理、化、外、电、图是科大的六大基础课。

高年级学生直接进入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在一线科技人员的言传身教下，开展科研实践或撰写毕业论文，不仅保证了毕业论文的质量，而且使学生较早受到科学研究的训练，增强了他们毕业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雄厚的教师队伍

建校初期，中科院各研究所每年到校授课的科研人员达300人次。马大猷、贝时璋、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柳大纲、赵九章、赵忠尧等一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亲自登台，及时讲授最新科技成就和科研前沿进展。他们承担了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

大纲制定以及编写讲义等一系列工作。这样，既解决了建校初期师资缺乏的困难，也极大丰富了教学内容，保证了高起点、高水平的教学质量。

实力雄厚、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使得中国科大一诞生就以人才荟萃、群星璀璨而盛极一时。

优良的校风学风

1958年9月20日，郭沫若校长在开学典礼致辞中说：“我们的

大学是尖端科学加共产主义的大学，也就是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大学。”

次年，他又以《勤奋学习，红专并进，团结互助》为题，在开学典礼上作长篇讲话。郭沫若说：“不红不专的懒汉是不能容许的；只专不红或只红不专的人，也是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不红则专不能深，不专则红不能透，这是可以肯定的。”“总之，‘勤奋学习、红专并进’是很好的办法，不仅在

学问上应该这样，就在做人上也应该这样。我们大家都用两条腿走路，迈步前进，不能做独脚龙。”他说：“我们的校风是好的，就是勤俭办学，艰苦朴素，红专并进，团结互助。同学们已经学习了一年，和学校的教职员一道把这种优良的校风初步树立起来了，我们要更进一步把它巩固下去。”郭沫若自己还经常为学生朗诵诗歌、题词，为校刊设计副刊并多次撰文，亲自给学生作报告。一有机会，他就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家和英雄模范到学校作报告。“文革”前，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罗瑞卿等先后到校作报告和参加毕业典礼。

在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的悉心教育和培育下，我校“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得以形成并发扬光大，成为学校重要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发展动力。

杰出的培养成就

先进的办学理念，卓越的师资力量，优良的校风学风，严格的科学训练，共同造就了中国科大杰出的人才培养成就。截止1966年，共毕业3届4710名学生，其中85%分配在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工作，他们基础扎实、实验动手能力强、后劲足，绝大部分成为业务和领导骨干，为我国科技、国防、教育等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仅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就有白以龙、徐建中、龚惠兴、吴有生、赵忠尧、杨秀敏等29人，比例高达6‰，还涌现了近20余名科技将军。



1963年7月14日，学校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陈毅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郭沫若校长等参加毕业典礼，并和全体毕业生合影。

● 记忆 ●

钱学森：

让力学系学生复学半年基础课

钱学森先生为近代力学系58级、59级学生主讲《火箭技术导论》，每周上1次课，每次3学时，从不无故缺课。当时不同年级的学生都去听，其他学校、研究所的人员也去听，人数多达400余名，把大阶梯教室挤得满满的。该课程后来改名为《星际航行概论》，并编写专著，为科大学生专用教材。

钱先生给学生的考试也很特别，是开卷考试，但学生最怕的就是开卷考试，因为开卷考试的题目肯定是书本、笔记本上找不到的。据说，1962年1月有一次考试，只有两道题，可从早上到中午，没有一个人交卷。钱先生让大家吃过午饭回来再考，直到傍晚，大家只好交卷。成绩出来后，竟有95%的同学不及格。

这次考试让钱先生很不满意，他认为同学们的数理基础还不够扎实，需要一定的时间补补课。结果是力学系58级学生在校多留了半年时间，钱先生选用冯·卡门和比奥(钱先生在美国上研究生时的导师

和师弟)写的《工程中的数学方法》一书作为课程教材，再加上补高等数学，从极限开始到数理方程。半年下来，光数学题就做了近3千个。

58级力学系的同学虽然晚了半年参加工作，但大家都从中获益，打下了扎实的数理基础。

严济慈：

讲课是一门表演艺术

严济慈先生从1958年起，在小礼堂给几个系的数百名学生讲授力学和物理，每周3次，每次2小时。这样的大课他连续讲了6年。严老上课时，一手拿粉笔，一手拿录音话筒，不用看教材，滔滔不绝，一气呵成。内容深入浅出，概念交代清楚，讲到兴奋处，经常“拖堂”。尽管严老带有浓浓的江浙口音，但他讲课十分有激情，常常双手高举，作出形象化的比喻，给人印象深刻，所以尽管有些北方同学听不太懂他的话，但课堂上总是绝对的安静，每个人都在努力捕捉他的思想，认真记录笔记。许多同学说，听严老讲课是一种享受。他的一本本字迹工

整的备课笔记至今珍存在学校档案馆，观者无不感动。

严济慈先生经常向青年教师传授经验。他说：“将一本小说搬上舞台需要加工，因为看小说可以间断地看，慢慢体会，而在舞台上则要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将小说中最重要的和最突出的、感人最深的东西反映出来。一个教师也就要像演员一样，要使学生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书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内容。因此，教学是一个提炼蒸馏的过程，教师不仅要给同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同学做学问的方法。”

严老认为教书的诀窍，“一是表演，一是掌握”。他说，讲课是一门表演艺术，一个好的教师要像演员那样，上了讲台就进入角色，目中无人，绘声绘色。还有就是“掌握”，对所讲课程烂熟于心，运用自如，就像杂耍艺人玩手中的球一样，得心应手。

华罗庚：

书要从厚读到薄

科大创办后，华罗庚先生给应用数学与计算机技术系一班和二班学生上《高等数学

引论》，教室不大，也没有课桌，只有一把把椅子，但可以在扶手上写字记录。每次华先生走上讲台，很少有废话，拿起粉笔就开讲，而且不时在小小的讲台上踱来踱去。还不时地点上烟，拿在手里吸上一口，很快就吐出。同学们常开玩笑说：别人是吸烟，华先生却是吐烟。

时值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和围绕贯彻教育方针的大鸣大放时期。58级校友颜基义回忆说，当时，不少高校开展了对数学课程基础理论体系的批判，有的甚至把教师轰下台，学生自己讲课，拒绝接受严谨的数学基础训练。而在科大，虽然也贴出了数以万计的大字报，但大多谈行政管理及教学中的具体问题，鲜有对基础课的理论体系提出严厉抨击和批判的。更为难得的是，校领导“尽可能地保证课程的教学时间，足够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当时教务长张新铭之语)。因此，华罗庚得以按照他预先考虑好的方案，有条不紊地给学生上课，且一讲就是三年。他在课堂上经常挂在口边的一些话语，如“生书熟讲，熟书生温”，“书要从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高的内容要会放低，难的内容要会改易，繁的内容要会化简”等等，成了科大学生后来受用不尽的金玉良言。



钱学森先生指导研究生



严济慈先生为学生讲课



华罗庚先生为学生解答难题



1969年12月,科大近千名师生迁至安庆市,图为当时暂住的市委党校原址。



原合肥师范学院旧址

南迁重建 逆境图存



南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全国高校正常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中国科大也难逃此劫。1968年3月,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大革命委员会成立。同年8月,解放军驻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余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科大,领导学校“斗、批、改”运动。

然而,与其它高校相比,科大人更多了一份劫难——下迁。

1969年1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

中国科大被指定“战备疏散”到安徽省安庆市。1969年12月,学校开始南迁,近千名师生被安置在安庆市委党校的一栋三层小楼里,拥挤不堪,食宿等基本生活无法维持。1970年1月,经中科院和安徽省革委会商定,学校搬迁到合肥市,在原合肥师范学院校址办学。至1970年10月基本完成搬迁,总计组织货运装车70余次,运货量865吨,装运仪器、器材、图书、档案等35000箱;迁出家属470多户,组织职工、学生、家属客运20多批,约6000人次,用火车皮510多节,搬迁费达77万元。

南迁使学校仪器设备损失2/

3,教师流失50%以上,教学、生活用房严重不足,校舍面积不到6万平方米。到1972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除了几栋教室楼和学生宿舍外,一无所有。

重建

在濒临解体的困难条件下,全体教职员自强不息,重建家园,开始恢复教学和科研工作。1971年,学校重建数理化基础教研室,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5年,举办“回炉班”,挑选300多名1967—1970届毕业生回校再培训后补充师资,并陆续

从全国各地物色调入200名教师,使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后来形成以年轻人才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科学研究工作也在简陋的条件下悄然进行。1974年上半年,学校举办了一次科研成果展,参展成果达到100多项。到1976年,学校恢复、开展的科学研究已近400项。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我校共有15项成果获得大会奖励。

求进

与此同时,一系列教育改

革创新构想已在酝酿之中。1975年9月,中国科大代中科院起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即代拟稿),以便向国务院领导报告我校对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思考和举措。《代拟稿》明确提出采取“自愿报名、上级审核、文化考察、择优录取”的办法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这表明我校希望通过高考录取新生的整体构思,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炉,虽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推迟,但在当时的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文革”后中国科大在科教战线率先“拨乱反正”的先声。

稻草涨价

1970年,科大下迁安徽时,起初落脚于安庆市委党校,屋里没有床铺,没有被子,连窗子都没有,一间屋子要睡十多个人。时值冬天,水泥地很冷,没有席子,就从附近老乡那里买来稻草铺在地上,各人自带被褥,就睡在稻草垫上,不少老师从此患上了关节炎。稻草在科大人去之前只要2分钱一斤,连买了几天稻草后,周围几个村子的稻草就涨到5分钱一斤。

后来,随着下迁师生陆续到来,人越挤越多,3层小楼根本住不下。实验仪器、木器台柜也都露天堆放,别说搞教学,就连吃住都成大问题。那一年的雪下得特别早,天气骤冷,连山上的自来水管都冻上了。用水要过一道沟,爬到对面的山坡上去挑,条件十分艰苦。

盖窑烧砖

科大在合肥的校园原是合肥师范学院校址,除了几栋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外,一切都要从头建设。1971年3月,科大

● 记忆 ●

在东区加速器小楼所在的地方,成立了一个制砖厂,陈希孺、钱大同、黄茂光、朱兆祥等老师开始参加烧砖劳动,为科大“添砖加瓦”,至今还在使用的化学楼,用的就是这个砖厂烧制的砖。

据校史记载,1972年至1976年前后5年的时间里,科大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9栋职工宿舍楼,先后建设了低速风洞实验室、高速风洞实验室、压气机房、低温液氮车间、钣金焊接热处理厂房、合成橡胶厂房、硅冶炼厂房、玻璃加工厂房、变电站、化学实验室、力学实验室、普通实验室、加速器实验室、图书馆书库、地震台等基础设施。

不怕工农兵学员造反

1972年开始,全国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定位是“上、管、改”,也就是说上大学的目的是管理大学,改造知识分

子“臭老九”。可科大的教师们却不吃这一套,认为当老师就是要好好教书,当学生就该好好学习。据阮耀钟教授回忆,复旦大学的老师来科大参观,看到工农兵学员在看英文专业参考书,知道科大对工农兵学员的教育抓得很紧,曾奇怪地问:“难道你们不怕工农兵学员造反?”

因为学校对工农兵学员严格要求和认真教育,科大工农兵学员的培养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

偷偷摸摸搞科研

“文革”期间,科大虽然身处逆境,但老师们敢于顶着压力从事科研工作。天体物理专业的几位年轻老师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利用晚上时间躲在地下室从事天体物理研究,1972年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宇宙学论文,但很快受到批判。因为宇宙学在当时的中国一直被禁止,认为研究宇宙学是唯心主义的。可学校领导却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鼓励他们继续研究下去。结果天体物理研究小组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先进集体”奖,而这个“先进集体”里后来出了好几位院士。



近代物理系“回炉班”学员



1980年的科大化学楼



开泰布新 声动寰宇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初,中国大地开始解冻复苏,万象更新。中国科大秉承改革东风,领风气之先,率先提出并实施一系列创新举措,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师资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为国家培养出一批高素质创新性人才,并取得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1977-1997 年入学的历届学生中,有 60%以上考取国内外研究生;在中美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CUSPEA)考试中,我校共考

取 237 人,占录取总数的 25.8%,为全国高校之冠。在历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统考中,我校学生平均成绩一直名列榜首。

1983 年 12 月,邓小平在一份关于我校办学情况的报告上批示:“据我了解,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同年,英国《自然》杂志撰文称赞中国科大为“招风的大树”。

1988 年 5 月,严济慈名誉校长为我校 30 周年校庆题词:“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



第一次科大工作会议期间,郭沫若(左)与严济慈亲切握手。

深化教学改革

1980 年代初,中国科大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对学科专业进行结构调整和改造,使当时以理工为主的学科结构调整为理工结合、兼有文管的综合性学科结构。学校还及时提出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调整,进行了“4-2-3(学士、硕士、博士)分流培养”的试点,将高等教育的三个层次通盘考虑,旨在针对学生兴趣、学业等不同情况,进行分流培养,提高培养质量,缩短培养周期,为后来国内高校推行“本硕连读”、“硕博连读”等积累了成功经验。

与此同时,学校首倡学分制,实行免修、选修、主辅修、双学位等措施;开办不分系科专业的教改试点班(简称“零零班”),宽口径培养人才;试行导师制,允许对拔尖学生单独拟定培养计划;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尽早参加科研活动,设立学生科研专项经费,开放部分实验室供学生使用……这些现在看起来不起眼的举措,在“文革”后的年代里,却显得那样的难能可贵。

率先开放办学

中国科大在全国大学中率先实行对外开放,从 1979 年开始,先后选拔 200 余名优秀青年教师和一批优秀学生赴欧美进修访问或攻读学位,他们学成回校后,很快成为学校师资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学校还邀请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陈省身、萨拉姆等国际著名科学家到校讲学,并聘为名誉博士、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和欧美日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科研机构建立稳定的校际合作关系,主办或承办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郭沫若奖学金

1980 年 12 月,国务院批准中科院在中国科大设立“郭沫若奖学金”,该奖学金系用郭沫若生前交给中科院的 15 万元稿费设立,为我校学生的最高荣誉奖项,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奖学金。

中科院第一次科大工作会议

1977 年 8 月 5-13 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大第一次工作会议,为中国科大在“科学的春天”里的扬帆远航谋篇布局。会后,中科院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继续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办学方针,将中国科大办成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加强基础课教学,主要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北京设立研究生院等七条战略举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随即批示同意。

新华社以《一定要办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题,报道了中科院召开中国科大工作会议的消息。8 月 19 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并配发评论称:“在教育要大上的形势下,中国科技大学先迈出了一大步。”

第一次科大工作会议的召开,使我校在全新的办学理念推进下,挣脱羁绊,励精图治,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之举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它标志着我校在坎坷中重新崛起,从曲折中迈向辉煌。

创办第一个研究生院

1977 年 10 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大在北京成立研究生院。1978 年 3 月,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北京)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研究生院。由此,我校在全国高校率先建立起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培养体系。

1981 年 11 月,学校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其中博士点 11 个,硕士点 24 个。1983 年,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获得博士学位的 18 名博士举行学位授予仪式,他们中有 7 名是我校培养的。1986 年,中国科大在合肥校本部也设立了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的创办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由此肇始,新中国现代学位制度建立以来,无论在培养数量还是培养质量上,中国研究生教育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为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首创少年班

1978 年 3 月 8 日,经中科院和教育部批准,中国科大少年班诞生了。首期少年班 21 人,平均年龄 14 岁,年龄最小的仅 11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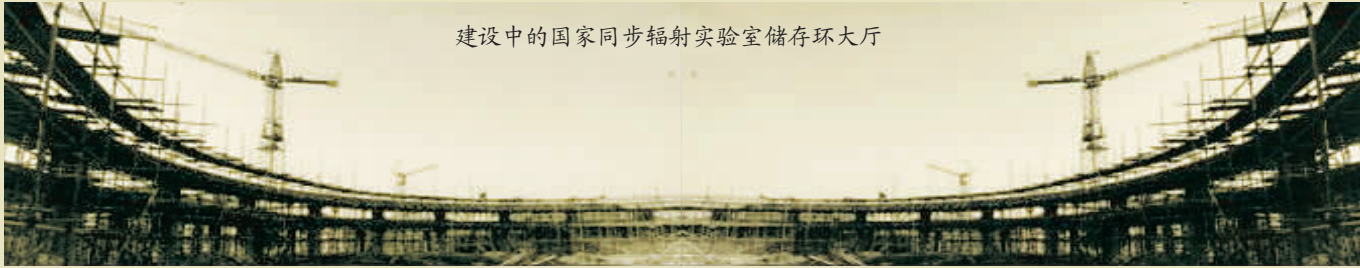
少年班的创办如一声春雷,在神州大地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人才稀缺,不仅需要全面恢复正常的教育制度,更需要突破常规又好又快地培养人才。少年班的应运而生,对促进正常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恢复和发展,乃至对全国青少年立志向学,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她像“科学的春天”里的第一枝报春花,向世人透露了“文革”浩劫后的中国将致力于科学创造的全新信息。

少年班针对早慧青少年的特点,实行破格选拔、创新培养,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广泛赞誉。李政道先生曾专门为少年班题词:“人才代出,创作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邓小平 1984 年 8 月会见丁肇中时也高度评价说:“少年班很见成效,也是破格提拔。”



少年班学生与老一辈科学家在一起

建设国内高校唯一的大科学工程



建设中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储存环大厅

1970年代末，中国科大在国内率先提出建设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1977年同步辐射装置的建造列入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78年春，中科院决定成立以中国科大为主的同步辐射加速器筹备组，讨论建造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的初步方案。经过几年的预研制，1983年，经国家计委批准，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正式立项。

西区建设

1984年，中国科大被国务院批准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10所高校之一。7月，中科院审核同意我校重点建设

1984年11月20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一期工程在西校区破土动工。1989年建成出光，1991年12月通过国家验收。

1999年4月，国家计委批准投资1.1亿元人民币进行实验室二期工程建设，2004年12月二期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实验室，实验室拥有的同步辐射光源是目前国内

总体计划任务书，并报送国家计委、教育部审定。1986年6月，国家计委批准我校第一期工程计划任务，扩建校舍建筑面积167000平方米，总投资9300万元。9月20日，学校举行新校区工程奠基典礼，严济慈为新校区奠基题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

高校中唯一一台大科学装置和国家级实验研究平台，可广泛应用于物理、化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力学、地质学、医学、药学等众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目前，实验室建有X射线光刻、红外与远红外、高空间分辨X射线成像、X射线衍射与散射等15条光束线和相应的实验站。

校区奠基”。

经过“七五”、“八五”国家重点建设，截止1988年底，我校校园面积扩大近一倍，建筑面积由迁址合肥时的6万平方米增至51万余平方米。教学三楼、电子楼、力学楼、生物楼和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等相继建成。

1985年6月，中国科大第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全校共有23个代表团参加大会，正式代表和特邀代表411人。本届教代会首开教职工参加学校民主管理、维护自身权益的先河，并从此形成制度。教代会“质询”环节是我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保留节目”。每次会议，组织者都要安排专门时间，请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回答代表提问，直接对话，当面批评和咨询，充分体现了民主管理、宽松自由的良好风气。

首倡民主办学新风气

学校还相继成立了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职称评定委员会，实行校务公开和基层院系主任负责制，有效地界定了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力的边界，避免了行政权力对学术的过度干预。

宽松民主的校园风气，使得中国科大的师生如鱼得水，创新活力不断激发，学校各方面事业也蒸蒸日上，成为举国瞩目的科技创新重镇和青年学子向往的学术殿堂。



建成后的西校区

● 记忆 ●

追逐同步辐射光

1977年夏，合肥的伏天酷热难耐，而何多慧和加速器专业的青年教师金玉明、张武、裴元吉，窝在窄小的实验室里探讨着，争论着。同步辐射光在他们眼前展开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诱惑着他们度过了一个个难眠之夜。终于，四人超前的目光盯住了同步辐射加速器。他们摩拳擦掌，主动请缨，建议在合肥兴建我国第一台专用同步辐射加速器，以提供最佳的基础研究环境，使中国的科技发展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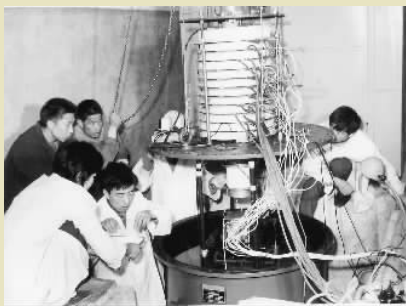
建造同步辐射加速器，这在中国尚属开创。当时偌大的中国最高能量的电子加速器不过是一台3千万电子伏特的低能加速器，一下子要跳到建造能量高达八亿电子伏特的储存环和2亿电子伏特的直线加速器，似乎是天方夜谭。有人挖苦道：这几个三十几岁的助教简直

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

“我们都是新中国培养的科技工作者，毕业十几年了，也憋了十几年了，没能甩开膀子为祖国大干过，如今国家需要同步辐射加速器，我们中国人一点儿也不比外国人笨，外国科学家能做到的，中国的科学家也一定行！我们一定要建成同步辐射加速器，填补祖国的这项空白。”何多慧憋足了一口气。

何多慧和他的战友们拧成一股绳，一趟趟从合肥赶到北京，进中科院，找国家计委，直至惊动中央政治局领导……

1978年，同步辐射加速器筹建组成立了！科大近代物理系破旧楼房里两间简陋的实验室就是战场，筹建组副组长兼总体组组长何多慧率领着十几个年轻科技人员投入同步辐射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和物理设计。



何多慧等人正在紧张调试直线加速器调制器

随着“出国潮”一浪高过一浪，激战中的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何多慧异常清醒。科学无国界，去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新技术，固然有益于加速器的研制，但军心不能动摇。于是，在筹建组全体人员的会议上，他斩钉截铁地发出誓言：不建成加速器，我决不长期出国。

军中无戏言。何多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

退路，他不看电影，不看戏，甚至很少上街，带领着大家啃透上吨重的资料，反反复复地设计计算，成百次上千次地做实验。饿了，啃个馒头；困了，坐椅子上打个盹，再接着干到凌晨。就这样，他们硬是在三年时间内，完成了同步辐射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和物理设计。1981年，这个项目获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他们真的成功了。

1983年4月8日，国家计委将中国科大同步辐射加速器工程正式立项，命名为“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实验室。次年，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正式列为国家重点工程。1984年11月20日，科大西区校园，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工地，彩旗和锣鼓声在温暖的阳光中飞动，白色大理石上镌刻着严济慈先生手写的铭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奠基。

几经沉浮，这个激动人心、令人难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从这一天起，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进入了工程建设阶段。（休兰）

1987年，当我们兴冲冲地来到西区时，颇有当年知识分子去到北大荒的感觉，有种慷慨赴死的豪迈。那时西区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楼，没有教3楼，没有4号楼和5号楼，也没有书店、理发店和卖苹果的，只有空荡荡的食堂，3座宿舍楼和西边乒乓球室及东边医务室那片平房。晚上，除了3个宿舍楼，放眼望去，一片黑暗。当第一个冬天来临，朔风吹起，看着那一片旷野，听着那声声凄凉的呼号，无人不起思乡之情。

那时西区基本上没有路，图书馆是一片芦苇荡，体育场也是，似乎是很遥远的僻静之地。到了夏天，一人深的荒草随着微风起伏，草丛中躲着永远唱歌的烟烟。红

蜻蜓、绿蜻蜓在草丛和水塘间穿梭。听到人的脚步声，几只青蛙相继跳入水中。水面荡着微波，有时会有鱼儿“扑通”一声在水面上翻个跟头，仿佛在诉说着惬意的生活。在嫩绿的新苇里往往站立着三、两学生，捧读着书本。

早上，红红的太阳从芦苇丛中升起，看着鱼儿、鳊鱼的舞蹈，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你会觉得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入夜，震耳的蛙鸣响彻泛着月光的水塘，偶而小鱼哗啦

那时西区

翻个跟头，将月光击成碎片。此时只觉得有首歌在心中唱着，可你却不知道它的旋律，你也怕唱出来会打破这美丽的宁静。于是，你就静静立在那里，倾听着大地的歌声，享受着这无与伦比的旋律，沉浸在难以言状的激动之中。

秋冬季节，西区白茫茫的芦苇花映着昏黄的太阳，一副极尽肃杀壮美的景象。几次想着给妹妹带些芦花回去，总是忘记。后来又说得芦苇花开时让她来西区照相，可惜也错过了，至今相册中还缺少一张西区连天芦花的照片。站在那时西区的池塘边，心中的旋律有点象《红高粱》结束时的唢呐声，你只觉得好想长啸。

那时，西区生活很不方便，虽然在西区收发室隔壁有个商店，却似乎什么也没有。若想买东西，就得出校门走很远。那时的黄山路狭窄而不平，也就是乡村小道的水平。我们上课的地方是平房，冬天特别冷，窗缝里不断地漏凉风，大家都不愿坐靠窗的位置，纷纷挤在中间。后来学校给每个教室装了一个烤火炉。不过，夏天在平房上自习倒还挺不错，上一会放下书本出去，听听蟋蟀叫，或是躺在草坪上数数星星，有时会被夜风吹迷糊了。也有时遇到同学，聊聊家乡，聊起劲来就越走越远，远得平房的灯光象星星，远到铃声若有若无地响了，才匆匆回去收拾战场。（1987级 听素）



科学发展 精品办学

1990 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核心要素。中国科大借国家实施“211 工程”、“985 工程”和“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三大重点建设的契机，不断提升办学实力和水平，坚持走适合自身发展的“精品大学、英才教育”之路。

在人才培养上，我校没有盲目扩大规模，始终坚持自身办学理念、目标和特色，

继续坚持“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注重培养全面素质和创新精神”的教学原则，不断强化基础课教学，加强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培养，集中资源建立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工程科学、信息科学等大型公用开放的实验教学中心，打破条块分割的格局，推动学科交叉，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大大提升了学生对科技创新的兴趣和能力。

学校不断探索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与机制，以开拓交叉前沿领域为着眼点，集中

资源构筑创新平台，下大力气促进学科交叉，实施人才、项目、基地、成果一体化建设，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龙头的园区式科技创新体系，在组织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创造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进入新世纪，中科院继续高扬“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大旗，中国科大与中科院数十家国立科研机构建立了互惠共赢的全方位、多层次、实质性合作关系，办学实力得到很大提高。经过长期的坚持与努力，“精

品大学、英才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模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扬。

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李鹏、李瑞环、贾庆林、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视察，对学校建设与发展给予热情关怀和勉励。2006 年 7 月，原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新华社关于中国科大培养创新人才的报道上批示：“中国科大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作法应很好总结。希望更多的大学能学习他们的作法，探索中国特色创新人才培养之有效途径。”2006 年第六期《新华文摘》载文称：中国科大“近几年来基础研究成果和杰出研究人才忽如火山爆发，喷涌不止，源源不断。……科研俊杰可谓群星璀璨，……研究成果更是丰硕喜人。该校一流人才和一流成果显示出的群聚效应，值得认真总结、推广。



胡锦涛来校视察



江泽民为我校题词



吴邦国听取学校领导工作汇报



贾庆林视察我校实验室

三大工程建设

首批进入“211 工程”

1995 年 12 月，中国科大首批进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1996 年 8 月 7 日，“211 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顺利通过国家立项论证，进入以项目实施为重点的实质性建设阶段。2001 年 5 月，“九五”期间

“211 工程”项目通过国家验收。

2002 年 9 月，“十五”“211 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教育部和中科院组织的专家立项论证审核；10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我校继续进行“211 工程”建设。

2006 年，“十五”“211 工程”建设项目通过国家验收。

2008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批准我校正式实施“211 工程”三期建设。



专家组来我校验收“十五”“211 工程”建设项目

首批实施“985 工程”

1999 年 7 月，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以及主管部委分别签订了协议，决定共同加大力度支持若干所重点大学在 21 世纪初建成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我校成为国家首批建设的 9 所“985 工程”高校之一。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安徽省省长王太华共同签署三方共建中国科大协议。

2004 年 10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教育部部长周济，安徽省省长王金山在北京签署协议，继续重点共建中国科大，推动学校创建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我校成为第一所通过签署共建协议启动实施“985 工程”二期建设的高校。



路甬祥、周济、王金山在共建中国科大协议上签字

参与国家知识创新工程

1998 年，经国务院批准，中科院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开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2000 年，中国科大整体进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

中国科大发展与建设规划

总体战略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中长期建设与发展目标：

到 2018 年建校 60 周年前后，建成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为国家重要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和创新能力卓越的国际科学研究中心。

“十一五”建设目标：

质量优异：“办精品大学、育科技英才”。以提高教育质量为重点，培养一流人才，创造一流成果。巩固和发展本科教育优势，着力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保持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优秀声誉。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的部分领域形成科研优势，人均科研产出水平居国内高校领先地位。

特色鲜明：“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积极探索促进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创新模式，为国家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强化学科优势，推进多学科的汇聚、交叉与融合，培育和发展若干新兴交叉学科。

规模适度：“学科和谐发展、规模服从质量”。提高规模效益，建立控制人数指标、提升人均指标的评价观念。教学科研人员保持在 1500 人左右，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规模约 16000 人，本科生与研究生分别为 8000 人左右。

结构合理：“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优化师资队伍组成结构；形成学科和人才动态发展的和谐架构。改革教学科研的组织模式，形成促进教学科研融合、共享并充分利用资源、科学高效的矩阵式、网格化管理体系。

● 声音 ●

路甬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科学院院长)

中国科大秉持中科院“科学民主、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和“唯实求真、协力创新”的优良院风，成功实践了教育与科研结合、理科与工科结合的高等教育模式，面向和主张科技前沿，结合国家发展需求，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办学之路，形成了培养学士、硕士、博士完整的教育体系，已经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受到党和国家几代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陈至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科大得到了超常规发展，培养的学生活跃在国内科技、企业等各个领域，1963 年以后毕业的学生当选“两院”院士的人数位居全国高校之首，这种现象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是不多见的，也经历了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为中国科大 40 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骄傲。中国科大的确是一所精品大学，有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办学道路，希望中国科大在今后的岁月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杨福家 (中科院院士 原复旦大学校长)

朱校长很多次讲到加州理工学院，我感到你们的追求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个追求，不仅在你们身上感到，而且在一些学术骨干身上，在一些年轻人身上，还有学生身上，都感受到了这种精神的力量。科大现在的这种气氛，我感觉是可贵的。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在这里非常生动地体现了这种理念。像学科的交叉，还有学科的重组，这个也是很合乎今天国际发展的潮流，在这里也做得非常好。我们

完全有理由期望这所学校不仅在国内成为知名大学，而且会成为国内外一流的大学。我感到，科大建设一流大学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侯自新 (原南开大学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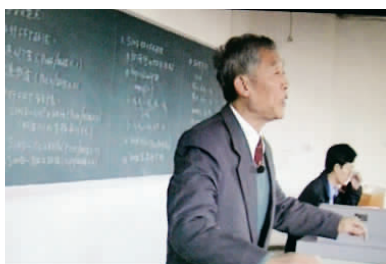
除了学科交叉以外，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点，是如何敏锐地抓住前沿问题进行重点突破。特别是在量子信息研究方面，科大最初的研究是非线性在等离子体和孤子的理论研究方面，随着工作的深入，科大很敏锐地抓住了量子计算、量子信息。而且在原来的理论基础上，通过“211 工程”的支持，把实验科学加了进去。应该说，这个学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有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我觉得这个经验应该认真地予以总结，我们国家很需要这样的工作。这个经验不仅对科大和全国的高校，甚至对全国的科技界都很有意义。

中国科大以培育科技精英、创新科技知识、服务国家社会为基本使命，自成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本科教育质量，注重探索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科大的人才培养目标：“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科学发展，培养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研究型、技术研发型和掌握关键技术的人才，并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一定的人文综合素质，使之在未来社会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中成为敢当大任的领军人物和关键性骨干”。

学校依托中科院优势，摒弃传统的理工分家，坚持研究与教育相结合，坚持“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注重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培养理念，坚持“育人是根本、教师是基础、学生是主体、质量是生命”的基本要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本科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基础，抓好本科教学工作是提高整体教育质量的重点和关键。多年来，我校教授和副教授坚持讲授本科生课程，尤其是重要基础和骨干课程必须由教授担任。近年来，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比例达到 94.5%。一批院士、名师走上课堂，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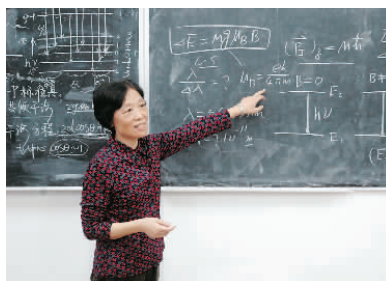
国家级教学名师陈国良院士



国家级教学名师施蕴渝院士



国家级教学名师福臻教授



国家级教学名师霍剑青教授

本科教学传统

世界一流大学招收研究生时，对传统的高质量生源高校会给予加分。中国科大是国内屈指可数的享受加分待遇的几所学校之一，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科大学生具备基础宽厚的优良素质。多年来，本科毕业生中约有 70%—80% 的学生被录取为国内外著名大学的研究生。

基础宽厚实是中国科大本科教学的主要特色和传统，也是毕业生在国内外获得广泛赞誉的重要原因之一。学校一贯重视

基础课教学，尤其是重视数理、外语等基础课程教学在教育过程中的养成作用，使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过程中，培养严谨的思维能力和实验能力、创造能力和想象力，并对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基本思想有所领略。

学校按照“厚基础、重能力、求创新”的理念，将课程设计成全校性基础课、学科群基础课、专业课、文化素质课等四大模块。新生入学后，无一例外都要修

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综合英语》、《计算机文化基础》、《C 语言程序设计》等课程。课程内容与要求不带专业色彩，从而构建一个全校基本一致的基础知识平台。

宽厚的数理基础课程，使各专业学生受到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特别是工科学生具有深厚的数理背景，经管文史类学生具有很好的科学素质，使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有可能厚积薄发，更加具有创造力。

以人为本 因材施教

中国科大之所以人才辈出，主要得益于学校遵守最基本的教育规律——以人为本、因材施教。

学校从 1980 年代起就实行按学科大类招生，并允许学生在校期间调整专业。近年来，在总结少年班和教改试点班培养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完整的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运行管理机制。这种完全尊重个性发展、因材施教的方法让大学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发展定位。

1999 年，学校确立了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学校提出了相应的人才培养目标：即“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主，完善具有加强基础、拓宽应用、个性学习、介入科研、重在素质等鲜明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提出并实施“以学生为

中心，因材施教，以培养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制度及措施。

从 2002 年开始，学校在所有学院广泛推行专业重新选择和个性化学习机制。所有新生入学时不论专业均在同一公共基础课平台和专业基础课平台上进行培养；在进校一年后可以在全校范围内重新选择专业，两至三年内可以在学科内调整专业，结合弹性学习年限也可以跨学科调整专业。

为了更好地落实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育人观，学校在把好教学质量关的前提下，实行弹性学习年限，允许四年制学生在 3 至 6 年的时间内自主安排学习进程，学有余力的优秀学生，可以在院系指导下提前修读高年级课程，达到毕业要求可以

申请提前毕业；可以在完成本学科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在导师的指导下跨学科选修课程，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可以选修双学位和辅修专业课程；可以提前修读研究生课程，实行本科—研究生一体化培养。对于高年级跨学科调整专业的学生，或因各种原因需调整学习节奏的学生，可适当延长学习时间。

灵活宽松的个性化培养模式、各项配套的管理政策，构筑了因材施教、特色培养的平台，促进了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发展，给学生创造了最大的成才空间。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许多本科生在校期间就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并获得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及国家专利。

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

学校以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为契机，以重点学科为支撑，高起点、高标准地开展基地建设和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学校奠定了可靠的本科教学基础。

学校拥有 5 个国家人才培养基地：数学、物理、力学、生物科学、天文学国家理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

数学、物理、力学国家理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综合培养，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改革中，集中体现了科学与技术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和特色，在基地建设、教学改革以及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许多成果直接应用于基础教学，对全校的本科教育起到了

示范和支撑作用。在国家历次对理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的评估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数学和物理人才培养基地拥有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学科 12 个，具有一流科研水平和高素质教师队伍，不仅担负着相关专业的教学工作，还承担了全校的数学类和物理类通修课程的教学，基地创建的名牌课程和精品课程，如大学物理实验、电磁学、量子力学、数学实验等，都是全校的通修课程，全校本科生都能从中受益。

生物科学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坚持“规模适度、厚基础、宽口径、重创新”的精英教育理念，在教育教学中突出学科交叉、强化基础教学、重视能力培养、加强实践教学。基地从教学实际出发，注重课程体系建、教

学平台建设及实习平台、实习基地的建设以及学生就业渠道的拓展。基地还投资新建了 8 个高质量的教学实验室，使学生可以受到生物技术方面的全面训练，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基地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 4 个，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各 1 个。

天文学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培养学生熟练掌握天文观测的技能及观测资料的处理、分析的方法。基地建有天文教学开放实验室、天文数据处理实验室、物理教学实验中心、空间探测实验室等。有国家重点学科 1 个，并主持建设了国家级和省级精品课程各 1 个。

教学实验平台

近年来，学校重组、新建了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化学实验教学中心、生命科学实验教学中心、工程科学实验教学中心、信息科学实验教学中心、地球和空间科学实验教学中心 6 大教学实验平台，下设 40 多个教学实验室。另外建设了专门的“创新基地”、“金工实习基地”，投入大量专项建设经费，充分满足实验室在时间、范围、内容等方面的开放要求，做到了教学时段内全天候开放。

目前全校共开设近 2650 个实验项目，其中必修实验项目近 1900 个，开出率达

100%，另有近 650 个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供学生选做。其中，基础物理实验中心面向全校学生，覆盖面达 100%，建立了开放式选课交互系统，学生可在网上选择实验项目和实验时间，实现网上布置作业、提交答案等。该中心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开设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是国家级精品课程。此外，计算机公共实验室也实现了全天开放，满足了学生课内外上机需求。

学校的科研（专业）实验室也面向本科生开放，供全校本科生参与“大学生研究计划”或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

学校从 1993 年即开始规划校园网络建设，1994 年底，一个以 100 兆的 FDDI 环网为主干的校园网络初步建成并投入运行。

在中国科大，无论是高年级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平等地申请使用公共实验平台，彻底打破了条块分割的格局，推动了学科交叉。据统计，公共实验中心每年提供测试服务约 8 万机时，约 3 万人次。学生在一次次的科学实验中，提升了对科技创新的兴趣，受到科学理念的熏陶，公共试验中心已经成为原始创新的肥沃土壤。



大学生研究计划

学校特别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从 2000 年起，学校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实施“大学生研究计划”，开设探究式研讨班，设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和创新培养基地，将学生进本校或中科院所属院所实验室、课题组从事科研活动，纳入本科生的正常教学之中。

目前，每年实施的大学生研究计划项目

近 700 项，每届本科生约有 45% 的学生参加该计划项目。在每年实施的近 700 项“大学生研究计划”项目中，学生发表文章的比例约为 15%。

“大学生研究计划”可以让本科生尽早参与科研，体验科技创新过程，培养创新意识、独立工作能力和团队精神，这是对人才培养、尤其是研究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的重要改革。

重要改革。

为了培育和提高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学校专门设立了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建立创新培养基地。机器人活动周、软件设计大赛、网页制作竞赛、创意设计大赛、数学建模、程序设计竞赛等丰富多彩的课外科技创新活动，激发了学生开展科技创新的热情，培养了大学生在生活中注意观察、推陈出新

的创新思维。航模、天文等课外活动兴趣小组，开展了引人入胜的课外科技活动，并参加了多项科技竞赛。学生机器人代表队包揽了首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电视大赛亚军，并代表我国参加了亚广联机器人比赛，获亚军和最佳技术奖。在“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中，中国科大历届捧回“优胜杯”。

倡导探究式教学方式

在中国科大的本科教学中，能经常见到这种情形：几位学生与老师围坐在一起，在轻松与平等氛围中，表达观点、畅所欲言。这是学校借鉴研究生研讨班和美国斯坦福、杜克大学本科生研讨班经验，设计的 Seminar 课程（大学生研讨班）。

研讨班课程内容可以结合某一学科专业主题组织学生深入进行研讨，如量子信息与量子计算、生命化学中的若干前沿问题等；可以围绕一个较为广泛的介绍性的主题，着重就解决和处理问题的思想、原理、方法和过程进行讨论，如活动的地球、物理学史的启迪、建筑节能等；也可以将一些专业课程与自学相结合，通过研讨班形式组织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如理论物理中的计算机计算、分子生物学与结构生物学前沿等。

目前，每学年为大学生开设 60 余门研讨班课程。通过对选修研讨班课程的学生调查表明，100% 的学生认为这种教学模式优于传统教学，88.6% 的学生认为收获较大和很大，这种教学模式受到大学生的充分肯定。

文理交融育英才

学校围绕“文理交融”的主题，充分挖掘各类专业课程中的文化素质教育的潜在功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多年来学校在课程设置、校园文化建设等各方面注重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995 年，中国科大被确定为全国 52 所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高校之一，1999 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首批 32 个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之一。中科院和学校拨款逾 1000 万元支持基地建设，用于改善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环境，支持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设和相关活动。一项项文化活动、一个个文化载体和一座座纪念馆塑像……构成了中国科大特殊而

浓郁的校园人文氛围。

中国科大的文化素质教育成就主要是通过四大阵地的建设取得。第一阵地是课堂教学：本科生培养计划中明确设置了文化素质课程模块，规定了必修的基础学分，使第一课堂成为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主渠道；第二阵地是开设名家讲坛，组织高雅文艺演出，营造高雅文化的校园氛围；第三阵地是引导学生开展科技文化活动，促进学生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第四阵地是精心建设网络平台，拓展素质教育空间。

“文理交融”的育人氛围对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人才有着重要的牵引作用。有媒体在报道中写道，中国科大如一只展翅的鲲鹏，正是“文理两科协同飞，才成就了九万里风鹏正举”的雄伟！

动手动脑学得更好

2005 Robo-Game 活动周机器人大赛上，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系的同学们创作的校园轻喜剧“爱在芳华”的主角是两只造型别致的七星瓢虫。这种机器人有 6 只脚，行走自如且非常稳定，善于攀爬。

机器人的每一个零部件都是同学们自己加工制作的。队长陈向成同学说：“自己动手制作机器人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张晖同学说：“三个月做下来，电钻、台钻、锯子、改锥、扳手、丝攻……所有的工具我们都会用了，另外，在实践中还发现不少实际问题与理论不一致的地方。如理论上讲传感器探头在识别的时候只发一次信号，而我们在实际做的过程中传感器却发出两次信号。尽管在制作过程中，我们把两次信号作为一次信号来处理解决了问题，但是，原理上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才开始做机器人的时候，心里一点谱也没有，还缺少很多相关知识。”“进入训练后，缺什么，补什么，边学习边摸索，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自主学习，在交流中学习，学起来有兴趣，效果明显，机器人比赛做下来之后就基本掌握了单片机编程的原理。”

恒流源队的“感恩的心”机器人演员，能够用手语完整地表达歌曲“感恩的心”，和请来的聋哑学校的女生现场表演的几乎是一模一样。金恬同学介绍，创意确定之后，他们专门到聋哑学校学习哑语，并邀请哑语老师进行指导，然后根据歌曲“感恩的心”来设计制作机器人演员的动作。为了让机器人表演和真人表演无异，他们还尝试机器人的手指动作，由于手指的关节过于复杂，在技术实现上非常困难，而且不够稳定，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

“每一个细节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Roboking 队的程显刚同学说，他们的机器人吸球能力很强，但在赛前一次调试过程中怎么也吸不进球，检查电路和程序都没有问题，什么原因呢？经过反复检查才发现，原来是输球管道的纸筒磨损了，把球卡在通道里上不去。说起这些，程显刚同学如数家珍。“我们正是在这些细节上进行了完善，所以能够在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科大蓝鹰队称雄机器人世界杯赛

2007 年 7 月，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 11 届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大赛上，中国科大蓝鹰队获得两项冠军、一项亚军、一个第 4 名，按主要项目进入四强的成绩统计，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并首次实现了优势项目在同一届世界杯上全部进入世界四强的目标。这是我国高校首次在综合成绩上排位世界第一。由于蓝鹰的优异表现，中国参赛队的总成绩第一次跃居第 4 名，与美国、德国、日本形成四方争霸的局面，改变了历来美、德、日三强鼎立的格局。

机器人足球世界杯赛是国际上最高级别、最大规模的机器人足球比赛，比赛分小型机器人组、中型组、仿真组和有腿组等类型。仿真组比赛在仿真软件平台进行，每队有 11 名机器人队员，每个队员由一个独立的程序控制，它历来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赛里争夺最激烈的项目。在 1999 年首届全国 RoboCup 仿真比赛中，科大蓝鹰队包揽了冠亚军。2000 年蓝鹰队成为我国第一支进入 RoboCup 世界杯赛决赛阶段的队伍。2001 年，学校成立蓝鹰四足机器人足球队，并成为我国第一支进入 RoboCup 世界杯赛决赛阶段的实体机器人队。此后三年，蓝鹰队始终保持世界双八强的成绩。2003 年，蓝鹰队参加了第 7 届 RoboCup 世界杯小型组比赛，成为我国第一支单独组队进入 RoboCup 世界杯赛决赛阶段的小型机器人队。



机器人表演



DV 大赛

中国首位在校本科生赴南极科考

1999 年 12 月 9 日，地球和空间科学系地球化学专业 95 级本科生尹雪斌作为中国第 16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正式队员，赴南极长城站进行极地环境科学考察。这是中国首次派出大学本科学子参加极地科考。

尹雪斌赴南极考察是在学校开展的“大学生研究计划”的支持下成行的。当时，21 岁的尹雪斌已在极地环境研究室参与了为期半年的科研工作。作为第 16 次南极科考队最年轻的成员，尹雪斌在长城站度过了 102 天的科考生

活，独立完成采集高海拔处的岩石、土壤、大气、生物等样品以及纳尔逊冰盖附近湖泥沉积物的样品等任务，带回了 200 多公斤的南极样品，包括岩石、土壤、生物、动物粪土、气体等，这些样品涉及了多个研究领域。

自 1999 年以来，中国科大先后有 14 名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赴南极、北极参加科学考察。基地环境研究室独创的“企鹅考古法”被学术界人士认为是开辟了考古研究中的一个新的领域。



科大人在南极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在北京成立。30年来，中国科大研究生教育已形成了鲜明的特色：重视在学科交叉中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高级尖端人才；坚持以国际学科前沿为导向，鼓励研究生勇于选择富有挑战性的学科或高新技术前沿课题进行研究，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建立环环相扣、层层把关的质量保证机制，稳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 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的创办



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大研究生院旧址

早在1962年，中国科大地球物理系主任赵九章先生就曾向中国科学院提出在科大创办研究生院的建议。1964年，学校开始筹建研究生院，后因“文革”的开始而搁浅。

1977年10月10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10月20日，严济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全力》，阐述办好研究生院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是中国科学院委托中国科技大学协同京区各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的直接领导下筹办的，对研究生的培养有具体的途径和明确的要求。我们希望造就政治觉悟高、知识面广、专业训练好、进取心强、敢于攻难关、攀高峰、开拓新方向的一代闯将，成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生力军。

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科技队伍的

建设，基础在教育。作为科研机构来说，不仅要出成果，也要出人才。我们要进一步总结过去招收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建立全新的研究生制度，努力把研究生院办好。

我虽已古稀之年，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的亲切教导，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决心为培养我国年青一代的科学技术人才而竭尽全力。”

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一九七七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在中止了12年之后的恢复。

1978年3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在北京成立，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研究生院，也是我国唯一由国务院批准创办的一所研究生院。

中国科大研究生院1978年10月14日开学，首任院长由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严济慈先生兼任。

改革举措—— 发掘创新能力的源头活水

学校在研究生教育工作中坚持“我创新，故我在”的办学理念，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多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举措。

在研究生中设立了“三助”（助学、助研、助管）岗位，大幅度提高研究生待遇，吸引有志于献身科学的优秀人才报考中国科大。设立各类专项奖学金，激励在校研究生勤奋学习。

采取“本科—硕士—博士”、“本科—硕士”、“本科—博士”及“硕士—博士”连读等培养方式，保证博士生生源质量。

面向国际前沿，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优化课程体系。

重视创新环境营造，支持研究生开展创新教育活动。通过举办学术报告会、学术论坛、研究生暑期学校、研究生创新基金评选，设立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后备人选资助基金等方式，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严把学位授予关，实行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统一管理体

制。从学位论文的开题、送审、答辩等各个环节加强管理和监控。在学位授予过程中，充分发挥导师、学位点、学位分委员会及校学位委员会的把关作用。

学校专门成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中心”，开展一系列与学位相关的评估工作，逐步建立起了有效的质量监督和激励机制。

近年来，学校又推出三大有影响的改革创新举措：

导师队伍建设：“尊重导师、服务导师、依靠导师”，始终坚持导师是研究生培养质量把关的第一责任人。

三大工程支撑：充分依托“211工程”、“985工程”、“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三大工程，建设各类、多层次研究生教育硬件平台，为交叉、创新型研究生培养提供肥沃土壤。

服务型研究生院探索：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模式，强化服务意识，积极构建服务型研究生院，为研究生教育发展营造良性、和谐的生态环境。



1979年，我校研究生赴京听李政道先生讲学后与李先生（前排中）的合影。

导师队伍—— 研究生展翅飞翔的领路人

1990年代后期，中国科大在全国率先实行导师上岗遴选制度的一系列改革，简化遴选程序，加大关键条件和关键环节的审核力度，在遴选中特别注重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设立岗位，目前，已经形成了研究生导师能上能下的动态竞争机制，增强了导师的岗位意识，并建设了一支能立足国际学术前沿、结构相对合理、创新能力较强的导师队伍。

学校现有研究生导师800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561人。在导师队伍中，有“两院”院士28人（含通过所系结合聘请11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6人，教育部“长江学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国家杰青110多人。拥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6个，教育部创新团队6个。45岁以下的研究生导师在国外知名大学获博士学位者占44%。

加强导师的上岗前培训是强化导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针对年轻导师群体在培养经验方面的不足，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对新导师进行岗前培训，聘请一些德高望重、博士生导师培养经验丰富的教授开设讲座，交流培养经验。

通过培训，新导师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学术道德规范意识，而且熟悉了解了研究生培养方面的政策、过程环节及培养规律。

充分吸纳国内外优秀学术资源是学校强化导师队伍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学校利用依托中科院的有利条件，与中科院几十个研究所建立了学术交流和协作关系，目前，有200多名来自研究所的导师在中国科大上岗指导研究生，每年有100多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我校开设研究生专业课程。

学校设立了“大师讲席”，常年有200多位外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合作研究。学校还与欧美、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高校、研究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与解放军总装备部、国内著名企业（联想、华为等）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全方位合作，有效地拓宽了研究生的培养渠道。学校还聘请了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世界著名科学家为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聘请了许多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为兼职教授或兼职导师。这些措施有效地改善了导师队伍的知识结构，提高了学术层次，使研究生的眼光能早早地关注到国际科学前沿上。



丁肇中先生在指导科大学生

专业学位—— 声誉良好的知名教育品牌

专业学位工作在中国科大虽然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但经过近年来的努力和建设，认识逐步明确、种类稳步扩展、制度不断完善、社会影响持续增强，已成为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改革举措的实施，中国科大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同全国的兄弟院校相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办学起点高、教学特色鲜明、社会声誉良好的知名教育品牌，

逐步取得了国内的优势地位，正在快速地由区域性品牌向全国性品牌过渡。

在办学实践中，学校依托理工学科背景，在工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公共管理硕士（MPA）等专业学位领域开辟了一些特色性学科方向，并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成效，不仅加强了与地方政府及有关行业、部门的联系，促进了产、学、研的结合，而且成为为地方和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



人才培养—— 铸造学校科研工作的生力军



自 1978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至 2007 年 12 月，学校累计已授予博士学位 3241 人，硕士学位 7948 人，专业学位 3381 人。近 30 年来，特别是实施“三大工程”以来，学校把研究生教育提高到相当重要的地位，加强了对整个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领导，使之得到了迅速发展。研究生在学生中的比例逐年提高，研究生与本科生数量之比已达 1.2:1。

目前，中国科大毕业研究生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新一代学术带头人，有的已经成为中科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据统计，自实施学位制度以来我国自主培养的博士有 17 人成为“两院”院士，其中科大培养的博士生就有 3 人。他们在教学、科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施展才能、担纲顶梁，为中华民族、为中国科大赢得了荣誉。



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2003 级博士研究生赵爱迪，使用扫描隧道显微镜，利用单分子选键化学的方法对吸附于金属表面的单个钴酞菁分子进行精确的分子“手术”，从而实现了单个分子中离子磁性的改变和调控。该工作发表在 *Science* 杂志上。2006 年 8 月，赵爱迪获第三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图为赵爱迪（左一）2006 年 6 月赴德国参加第 56 届诺贝尔奖得主大会时，与 1985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化学家杰罗姆·卡尔勒及夫人合影。



1983 年 5 月，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为我国首批获得博士学位的 18 名博士举行学位授予仪式，在这 18 名博士中，有 7 名是中国科大培养的。图为我校首批博士走向答辩会场。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成绩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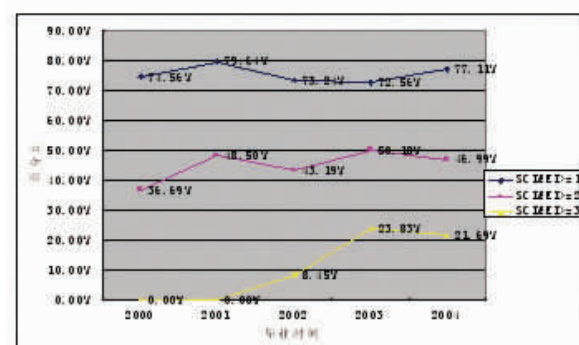
1998 年 5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委托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首次开展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工作。此后，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工作每年进行一次，每次评选出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不超过 100 篇。

参加评选的学位论文，一般是评选年份的上一个学年度，在国内学位授予单位获得博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获得情况已成为衡量各培养单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目前被公认最能体现国内高校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全 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中国科大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自 1999 年教育部开展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以来，中国科大共有 28 篇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列全国高校第五，入选比例（占同期授予学位人数）高居国内高校第二。

此外，中国科大还有 45 篇论文被评为中科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占入选论文总数的 18%。



据统计，目前研究生对我校 SCI/EI 的论文贡献率呈逐年增长趋势，2005 年分别已达到 71.9% 和 72.3%。2000 年以来，博士生发表过的高影响因子（ $IF \geq 3$ ）论文的人数比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在高影响因子（ $IF \geq 3$ ）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博士生比例已达到 25.1%。

在博士生教育方面，培养了若干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取得一批对学校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 1999 年以来，每年都有在校博士生独立或合作在 *Science*、*Nature* 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发表论文总数居国内高校前列。

● 记忆 ●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1978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在填报报考志愿时，我选择了中国科大“概率统计专业”。我从事的专业是数学中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工作的方向是概率论中的极限理论。初踏概率统计之门时，多少还有些盲目。在殷涌泉老师的指导下，我选定了“独立随机变量之和的极限理论”作为研究方向。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选择是十分正确的。

我的博士生阶段，前后仅 1 年时间，这使我得以跑步赶入第一批博士生的行列。我的导师陈希儒教授要我投身到当前的热门课题中去，解决主流上的课题。记得他给我出的第一个课题是：正态逼近的非一致估计界限是否已经达到最佳？这是一个当时的极限理论界正在争论的热门话题。当时我真是硬着头皮想，日也想，夜也想，坐在那儿想，走起路来也想。渐渐地，我感到有了些眉目，便坐下来写。我发现，无论对现有的界限再增加一个收敛得无论多么慢的界限，都能找到不满足该界限的例子，从而明确地肯定了现有的界限就是不能再改进的最佳界限了。这便是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一章的出笼经过。

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二章是关于 m 相依随机场正态逼近的一致速度的，课题来自最新一期的德国概率杂志。那是 1982 年，我在翻译杂志时直觉地感觉到这篇论文中所给出的收敛速度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量级，这使我联想到登在 1980 年苏联的《概率论及其应用》杂志上的另一篇研究相依随机序列正态逼近收敛速度的文章，两者相比较，课题有紧密的联系。但后者的方法远比前者精细，后者的结果也达到了应有的量级。于是我便尝试用后者的方法来解决前者问题。当然不能全然照搬，因为两者所研究的对象不同。我所面临的是如何由一维向多维转换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我的尝试成功了。当我把成果报告给陈老师时，他非常高兴，认为我已经可以独立开展科研工作了，并鼓励我放开手脚大胆地往前闯。就这样，我又相继完成了几篇论文。终于用 1 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博士生阶段的学业，于 1983 年 4 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赶上了是年 5 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批博士学位授予仪式。

（苏淳）

1978年3月，经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批准，中国科大少年班正式成立。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创办，开创了中国超常教育的先河，是新中国教育的一大创新。

30年来，少年班从招生、教育、管理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索，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多个第一：率先实行“自主招生”；首创通识教育培养模式；首倡个性化教育。已初步实现了少年班早出人才、出高质量人才的办学目标。

少年班的创办

1974年5月，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向毛泽东主席建议，在中国要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理科人才也可以象文艺，体育那样从小培养”。李先生的建议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同。1979年4月，李政道教授访问中国科大少年班，谈到这一建议的依据时说：“在国际上，理论物理方面的人才，一般都在20多岁时出成果，几乎没有例外。”虽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李政道教授的这一建议不可能立即得到实施，但是，给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知识界带来深刻的启示和影响。

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写信给方毅副总理，推荐13岁的智力超常少年宁铂。11月3日，方毅对此信作出批示：“请科技大学去了解一下，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与此同时，党中央、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大不断收到全国各地推荐少年英才、早慧儿童的信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大提出了创办少年班的设想并得到了中科院的批准。中国科大随即选派十多位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教师，前往上海、江苏、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对被推荐者进行考核、观察、分析，最后，21名智力超常少年被中国科大破格录取。

1978年3月8日，少年班正式创办，并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

基本目标

对我国的智力超常少年，进行超越常规的教育，使他们的智力得到充分开发，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终生追求卓越、具有创新能力的杰出的科学技术人才。

招生模式

少年班采用高考初选和本校有针对性的复试、面试相结合的录取方式。

经过高考初选后，少年班的复试内容包括：数学、物理、英语三科考试，主要了解学生对这些学科理解的深度、广度以及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其次，请大学教授给他们上数学和物理课，用通俗的语言讲授一些学生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并立刻进行考试，以检测他们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最后，还要进行心理测试，了解他们的心理成熟度。

少年班实施自主招生、初试与复试相结合、科学选拔和鉴别、尊重个性的科学公正的招生模式，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学自主招生的最早的、最系统的探索。

培养模式

因材施教、宽口径通识教育是少年班培养模式的核心；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是少年班培养的基本途径；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和创业能力、创新人格，培养创新型人才。

学导制

聘请院士、资深教授、杰出青年学者担任少年班基础课、专业课教学教师和学业指导教师（即学导）。学导根据少年班学生的普遍特点和个性，指导他们进行个性化的专业选择和选课、学习计划的制定，指导其学习，帮助他们掌握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以及选择合适的科研课题，每个学导负责指导3~8名学生。

毕业逾千人 九成获博士硕士学位

在少年班成立30周年之际，学校对少年班毕业生进行了追踪调查。统计数据表明：30年来，少年班共招收31期学生总计1220人，已毕业1027人，其中935人考取研究生，占91%。前16届毕业生（1983—1998年）共590人，64%获得博士学位，26.9%获得硕士学位。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约20%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有93人拥有国内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国外终身教职，许多人已成为国际著名科学家；有超过70%的少年班毕业生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其中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约35%。

少年班创办30年来，探索了一条通识教育和因材施教相结合、专业教育与全面素质教育协调发展的培养模式，培养出一批最年轻的国内外著名学术机构

的博士、教授，初步实现了少年班早出人才、出高质量人才的办学目标。

在国内，少年班毕业生分布在大学、科研机构和IT、金融等领域，他们大多数有在国外获得学位和工作的经历，在北大、清华、中国科大、复旦等一流名校担任教授的有近20人，其中78级翁征宇是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首位“杨振宁讲座教授”；81级张辉最近辞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终身教职，回到国内被聘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长江计划”特聘教授。

在国际学术前沿，少年班毕业生同样取得突出成绩，已知有18人在西方一流研究型大学任正教授，有3人当选IEEE会士，3人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另有数人入选美国医疗信息科学院、美国光学学会等会士，有多人获

得海外华人物理学会优秀青年科学家奖、新加坡李光耀顶尖科研奖、美国Sloan研究奖、青年科学家总统奖、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就奖、材料学会青年科学家奖、Parkard科学和工程奖等国际知名大奖。如87级庄小威34岁时成为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物理系双聘正教授，她是获得美国“天才奖”第一位华人女科学家。

与此同时，一批少年班毕业生活跃在国际工商、金融等领域。据不完全统计，仅在IBM、Intel、微软、杜邦这样的国际500强企业就职的就有149人，许多人在这些企业担任重要职位。如78级张亚勤曾是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1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会士，现任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董事长。

科学家与少年班大学生



- ① 杨振宁教授与少年班学生亲切握手
- ② 李政道教授与少年班学生合影
- ③ 丁肇中教授与少年班学生交谈
- ④ 周光召院士为少年班学生题词

开办零零班

1985年9月，为了把少年班办学的成功经验向普通本科生推广，学校仿照少年班办学模式，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将当年统招新生中的成绩拔尖者从各系挑选出来，单独组成一个班级，不分系和专业，纳入少年班的统一管理系统，与少年班按相同教学计划进行学习。因其没有系的代码，因此又称“零零班”。

与少年班学生一样，零零班实行不分系的强化基础教学。经过2至3年强化基础教育后，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全校范围内自主选择系和专业方向，然后到各系继续接受相关专业教育；对他们同样实行个性化教育，建立本科生导师和班主任制，全面关心他们的生活，指导他们发展。



在“远望号”上举行十八岁成人仪式。

课外科技活动成绩斐然

少年班同学勤奋学习，热爱科学、勇于创新，学习风气浓厚，学业成绩优异。他们积极参加各类课外科技活动，所获奖项不胜枚举：如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科大机器人比赛特等奖、全国“CCTV”英语演讲大赛特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全国个人冠军等等。多年来在学校的数理化信息学科竞赛中，少年班学生基本囊括数理一、二等奖，在历次“华为杯”学生科技创新竞赛中，少年班同学所获奖项也经常占全校奖项的大多数。如1997年5月，我校首次参加“北美精算师考试”，95级张俊妮和94级高洁两位女生获得一等奖（全球总共只有6个一等奖）；1996年，92级黄春峰，王海涛等同学组队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了我国自1989年组队参赛以来的首个特等奖。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2月至2008年2月十余年间，少年班同学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一等奖的接近40人次。

朝气蓬勃的课余生活

杯”科技智力知识竞赛全国总冠军等。

78级江凤同学在1978年4月校运会上打破科大女子跳高的纪录，一直保持至今；01级郑文妮同学多年担任学校教工合唱团的钢琴伴奏；01级胡波同学是学校“树之”演艺社的社长、“中国科大学生艺术团”曲艺团团长；00级周涛同学是学校辩论队、

象棋队和围棋队成员，并发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随笔若干，曾获全国大专辩论赛华东区冠军及总决赛三等奖、安徽省“雪花杯”辩论赛最佳辩手和“美孚杯”辩论赛冠军以及合肥市高校象棋赛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还曾获校运会800米第三名，1500米第三名等。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个性，服务学生的需求，努力营造学生和教师、管理者之间人格平等的环境氛围，发现和激励学生内在的动力，鼓励引导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培养学生主体性，是中国科大的优良传统，也是学校“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生动体现。

在校内，凡涉及到大学生教学、管理、服务的重要事项，都要邀请学生广泛参与论证、讨论，既加强了学校与学生的

沟通与融洽，也对学生事务和学校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学生可以在校园网 BBS 上畅所欲言地表达意见，学校安排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学生意见，转交学校领导批办或由有关部门直接处理，这已成为学校日常管理工作的一个部分。本科生学籍管理条例修订时，学校专门召开听证会，40 多名学生代表踊跃参与，对专业选择、成绩核定、

完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学校管理者由衷地说：“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如果没有学生的参与都是有问题的。”

此外，各级团学组织和学生社团还针对学生入校、在校、毕业等各阶段的不同需求提供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如编辑印发《科大人——毕业生访谈》、组织“我爱我师”名师 DV 访谈、院系专业介绍、实验室介绍、“闪亮的日子——生涯导航系列报告会”等活动，给学生学习上的指导；举办“See You”毕业纪念系列活动、“校园模拟招聘会”、就业指导报告会和座谈会、考研资源共享等活动，为学生的就业、考研和离校服务；通过主题团日项目资助，积极推动各基层团学组织尤其是团支部开展生涯导航活动，近 3 年来，共资助各院系团支部主题团日活动 732 项，其中以大学生生涯导航为主题的团日活动 179 项，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团支部建设及优良班风、学风的形成。



个性化学习、学习警示、考试管理规定的实施等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对条例的

多年来，中国科大以学生为本的传统和理念渗透在学校教育、管理的各个方面。学校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过程中，注重贴近学生实际，先后探索建立了学业、生活、心理、思想、身体和安全等六套“预警与援助体系”，把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努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成才。2000 年、2007 年，学校两次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为面向全国重点宣传的先进典型。



心理微笑协会会员大会



拓展训练

心理健康教育春风化雨

中国科大心理教育中心自 2002 年 5 月成立以来，在大学生中积极倡导“开朗乐群、自信悦己、静心明志、和谐发展”的健康观，努力培养学生客观、相对的自我概念，引导学生摆脱幻想、正视现实、找准定位、快乐成长。

每年 5 月的心理健康周会以“认识两性”、“我爱我”、“让心灵和谐成长”、“朋辈·和谐·成长”等为主题，开展大型签名、心理图片展、心理素质拓展、心理知识竞赛等活动，吸引了学生积极投入，进一步树立学生关爱自己、关爱健康的意识，增强自我心理调节能力。

从 2005 年开始，学校在每个学生班级设立学生心理委员，挑选心理健康、乐于助人、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比较强的学生担任。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对他们进行遴选培训，帮助他们掌握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鉴别及专业测试能力、朋辈心理辅导的技能技巧、校园心理素质拓展活动组织、自我认识与生涯规划辅导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等。充分发挥他们朋辈辅导的感染力，让同学们在自助的基础上学会互助，在互助中和谐成长。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网站“微笑在线”功能完善，内容丰富，在全国高校“十佳网站”评选中荣获“全国十佳服务类网站”称号，是心理类唯一获奖网站。依托网络平台，学校借助自主研发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查系统”，每年为全体新生进行心理普查，为每一位在校大学生建立心理档案；向学生提供专业心理测试。

学生提案中的主人翁意识

自 2001 年起，学校就在校团委委员和校学生会委员中启动了每年 4 次的提案工作。2005 年，又启动了校研究生会的委员提案工作。提案内容涉及学校发展、校园文化、学生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几年来共收到提案近千件。其中切实可行的提案被提交到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得到高度重视，对维护校园稳定，推动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调动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热情，进一步树立了主人翁的意识。

『一卡通』里的低调温馨

10 年前，中国科大就向社会承诺：“不让一名同学因为家庭生活贫困而辍学”。为此，学校建立和完善了以“奖、贷、助、补、减”为主体的助学体系，通过多种途径解决贫困生的实际困难。10 年过去了，学校没有一名学生因为生活困难而辍学。在全面构筑助学体系的基础上，学校还创造性地实施了“生活预警与援助体系”，探索了“隐形资助”的助学方式，不仅使助学体系更加完善，更有效覆盖学生中的隐性贫困生，而且兼顾了受助学生的心理感受，让贫困生“体面”地接受社会资助，受到广大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从 2004 年开始，学校有关部门在“一卡通”网络系统中设定学生消费情况预警线，按月对学生在校内用餐情况进行统计。如果有学生每月在校内食堂用餐 60 次以上、消费总额在 150 元以下，“一卡通”系统就会自动生成此类学生的数据库。这时候，无须学生自己申请补助，学生处便主动核实情况并在其“一卡通”账户中按月存入补助款。通过这种“隐形资助”的形式，从 2004 年 9 月到 2007 年 11 月，学校为 8705 人次贫困学生发放补助款近 133 万元。目前这种生活资助的标准已提高到每月在校内食堂用餐 60 次以上、消费总额在 230 元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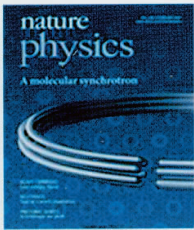


2007 年 6 月，中央骨干媒体对我校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典型经验进行重点报道。



文化长廊是展示院系风采和大学生精彩生活的重要场所，广受师生关注。图为东校区的文化长廊。

中国科大致力于创建一流研究型大学，建校之初就强调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着力开展科学研究。1970 年代，明确提出要建设教学、科研两个中心。近年来，学校不断探索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与机制，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开拓交叉前沿领域为着眼点，集中资源构筑科技创新平台，下大力气促进学科交叉，实施人才、项目、基地、成果一体化建设，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龙头的园区式科技创新体系，在组织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创造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成功制备出由 6 个光子极化状态相干叠加形成的“薛定谔猫态”，实现可以直接用于量子计算的六光子“簇态”。成果发表于 2007 年 2 月的 *Nature Physics*，入选 2007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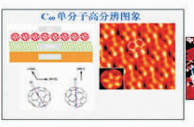


图 1: 利用 STM 获得的 C60 单分子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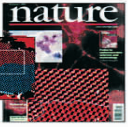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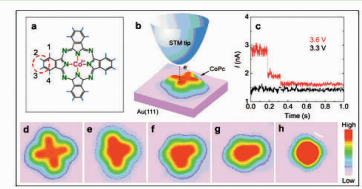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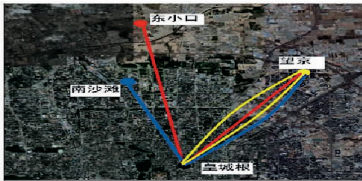


图 2: C60 二聚分子取向畴

在国际上首次获得具有化学键分辨率的 *C60* 单分子图像，并发现 2 维 *C60* 点阵的一种新型取向畴结构，研究论文发表于 2001 年 1 月的 *Nature*，被评选为 2001 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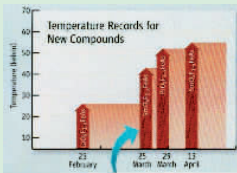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单个分子内部的化学反应，成功实现了单分子自旋态的控制。成果发表于 2005 年 9 月的 *Science* 上，入选 2005 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国内十大科技新闻。



设计出国际上第一个量子路由器，并率先在北京网通公司商用通信网络上完成四用户量子密码通信网络的测试运行。



研制成功我国首台采用国产高性能通用处理器芯片“龙芯 2F”和其他国产器件、设备和技术的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KD-50-I”，这是我国高性能计算机国产化的一次重要突破。



在高温超导材料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发现了第一个临界温度超过 40K 的非铜氧化物超导体，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2008 年 5 月的 *Nature* 上。

培育创新团队 提升重大项目竞争力

基础研究厚积薄发、探索性强、进展难以预测，学校对基础学科进行全面部署，营造自由探索的文化氛围。以学科交叉为核心，促进学科间交叉融合与渗透，不断提升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通过基础研究解决未来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和瓶颈问题，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and 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长远性意义。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对引领国家未来发

展，促进持续创新能力迅速提高举足轻重。学校具有多学科及理论基础研究强的优势，为了全面提升重大重点项目竞争力，学校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通过设立校重大项目启动基金和创新团队培育基金，以促进基础学科之间、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科学与技术的交叉与融合为核心，凝练创新团队。

目前，学校已培育了 6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4 个中国科学院创新

团队、6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2001 至 2007 年，学校共牵头承担 973 计划项目等各类重大项目 19 项，其中，作为首席科学家依托单位，承担了 6 个 973 计划项目；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部署的四大科学研究计划（蛋白质研究、量子调控研究、纳米科学技术研究、发育与生殖研究）中，学校作为全部四大科学研究计划的主要参与者，6 个重大项目获得立项，立项数和获批经费均名列全国高校第一。

原创性成果喷涌而出

近年来，学校在国际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一直名列全国高校前茅，自 1992 年以来，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Nature* 上发表学术论文 11 篇，*Science* 上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每年发表的 SCI 和 EI 论文数、SCI 论文被引篇数和被引次数 4 项指标均持续上升，并且一直保持高校前列。自 2004 年起，被引次数的增幅显著大于论文数量增长，论文质量显著提高。

1998 年以来，先后有 14 项成果分别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6 次、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 2 次，中国基础研究

十大新闻 6 次、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6 次和国内十大科技新闻 2 次，是入选成果数最多的高校，也是 2003 年以来连续 5 年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唯一高校。据中科院科技情报中心统计，1998 年至 2008 年间，中国科大发表科技论文数名列全国高校第五，被引用总次数名列全国高校第三，而反映论文整体影响力的篇均被引频次则高居全国高校第一名。1978 年以来，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 35 项。

历年入选的重要科技进展一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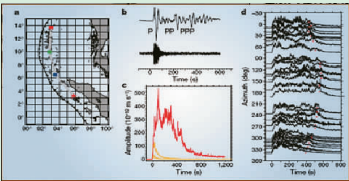
入选年度	重要科技进展（新闻）	重要科技进展（新闻）类别
2001	科学家成功直接观察分子内部结构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200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量子通信实验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2004	我国量子信息实验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2005	我国科学家成功实现首次单分子自旋态控制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2006	实现两粒子复合系统量子态的隐形传输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2007	实现六光子薛定谔猫态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1998	我国科学家关于轻夸克质量比的研究国际领先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
1999	我国科学家确定碳 60 单分子在硅表面的取向状态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
2001	中国科技大学 C60 纳米材料与纳米结构研究获重要进展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
2006	在光纤通信中成功实现一种抗干扰的量子密码分配方案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
2006	发现一种可有效通过皮肤传送大分子药物的透皮短肽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
2007	在多光子纠缠和光学量子计算的实验方面取得新进展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
1998	从四氯化碳催化热解制金刚石	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2000	过去 3000 年企鵝数量变化与环境演变	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2001	C60 单分子的高分辨表征和新型二维取向畴	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2003	多光子量子纠缠态的操纵与鉴别	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2004	五光子纠缠和终端未定量子隐形传态的实验实现	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2007	光子量子计算机的物理实现和算法应用	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2005	中国科大在单分子选键化学研究领域获重大进展	国内十大科技新闻
2005	我国实现国际最长距离实用光纤量子密码系统	国内十大科技新闻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四大科学研究计划的重大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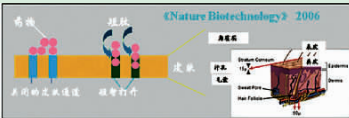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首席科学家
蛋白质修饰、转运和氧化还原的结构生物学基础	蛋白质研究	周从照
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的物理实现	量子调控研究	郭光灿
纳米药物载体增强药物导向性及效应的研究	纳米科学技术研究	温龙平
基卵泡发育的分子调控	发育与生殖研究	史庆华
分子尺度的量子行为和调控	量子调控研究	杨金龙
基于核自旋量子调控的固态量子计算研究	量子调控研究	杜江峰



建成大空间早期火灾智能监测与电气火灾隐患检测系统，形成火灾风险评估与性能化防火设计核心技术，成功用于人民大会堂、奥运场馆、中央电视台、国家“十五”期间建设的 16 个棉花储备库群等 100 多个重要场所。获 2001 年和 2006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找到一种海啸早期预警的方法，可以在地震发生后的 25 分钟内确定地震的破裂长度和持续时间等基本参数，从而为海啸提供早期预警，该研究成果发表于 2005 年 5 月的 *Nature*。



成功找到一种能携带胰岛素通过皮肤进入体内的透皮肤，可望有效治疗糖尿病。成果发表于 2006 年 4 月的 *Nature Biotechnology*，入选 2006 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运用独特的“企鹅考古”方法，通过 3000 年来企鹅种群数量变迁研究推演南极气候变化，成果发表于 2000 年 10 月的 *Nature*，入选 2000 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中科院在“2001 年科学发展报告”中将其列为“2000 年度中国科学家具有代表性的工作”。



在基于数据驱动技术的语音合成、鲁棒性语音识别、汉语韵律规则的模型与生成、中文的文本分析与理解、汉语语音数据库的建立与识别系统评测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创新和突破。KD 系列汉语语音转换系统被认定为“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在汉语语音转换的实用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该项目 1999 年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2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国高校中第一个大科学工程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是国家计委于 1983 年批准建设的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也是目前唯一一台在高校建成的大科学装置。1991 年完成首期建设，1998 至 2004 年实施二期工程改造。目前，实验室拥有 15 条光束线站，轨道稳定性达到目前国际同类装置的先进水平，相关线站亮度平均提高 3 倍。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行为我国同步辐射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做出开创性贡献，为我国基础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研究平台，取得一批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同步辐射用户队伍和装置建设高

素质人才。

创建至今，实验室为我国基础研究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4 项成果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安徽省高校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 项职务专利获得授权，实验室研究人员及其用户发表论文达 1400 多篇，其中 2 篇论文发表在 Scinece 上。“同步辐射真空紫外和软 X 射线的标准光源及标准探测器”的成果为我国探月工程研制计量了大量数据。成功研制出惯性约束聚变（ICF）实验用的大口径光学元件，打破了国外封锁。

目前，中国科大已建有 2 个国家实验室、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1 个国家级野外观测台站，21 个中科院、教育部、安徽省的重点实验室，14 个所系联合实验室，55 个校级实验室。

唯一的国家级火灾科学基础研究机构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国内配套投资兴建的我国火灾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研究机构。1989 年通过立项论证，1992 年获准边建设边对外开放，1995 年通过国家验收，2003 年第一次参加工程与材料领域的 29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被评为“优秀”类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4 年，在“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

实施二十周年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实施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实验室被评为“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先进集体”。

实验室致力于火灾动力学演化规律和火灾防治关键技术研究，设有建筑火灾、森林与城市火灾安全、工业火灾、火灾风险评估等 8 个研究室，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等 17 项奖励，获得各类专利 30 项。



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合肥）



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合肥），前身是国家科委于 1995 年 9 月批准成立的“中国合肥高性能计算中心”，1998 年 5 月，国家科技部将其易名为现名，是我国 5 个国家级高性能计算中心之一。

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并行与分布式算法、近似与概率算法、高性能计算、并行与分布式计算环境、并行与分布式体系结构、网络设计与路由算法、基于并行与分布式计算的应用系统等。中心现有国产曙光-1 号、曙光 1000、曙光 2000 大型并行机以及微波天线、绘图仪、SUN 工作站、高档微机高级计算设备及外设。其

中曙光 2000 是曙光天潮可扩展并行计算机系列的一个产品，作为一个超级服务器，它由 11 个厚节点（含 Myrinet 网络接口）、1 个高性能计算节点及 1 个控制台组成，浮点运算峰值达每秒 200 亿次速度，是具有可扩展机群体系结构的通用超级并行机系统。系统可在下列领域提供高性能服务：通信系统、高性能文件系统、并行库、并行数据库、高速 I/O，以利于高效地进行超级计算、并行查询、高性能事务处理。

实验室研制的“淮河流域防洪防污调度系统”获 2001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是我校实现多学科大跨度交叉融合集成创新研究的重要平台，于 2003 年正式获批筹建，是国家科技部首批批准筹建的实验室之一。

经过短短 5 年时间建设，实验室在培养科技杰出人才，组建创新团队，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等方面，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为充分发挥中国科大基础研究的优势力量，凝练和大幅度提升学校科研核心竞争力，源源不断地做出创新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1 年，学校完全打通学科和院系间的界线，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整合与微尺度物质科学有关的 4 个中科院重点实验室、若干校重点实验室和研究小组，建立起跨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平台。2002 年，通过科学目标的不断凝练，将纳米科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认知科学作为微尺度创新平台的研究方向，确立了面向国家战略目标，开展交叉创新研究，建设开放式国立研究平台与国际知名实验室的愿景规划，并于 2004 年凝练出面向交叉科学国际前沿和国家战略目标相关的研究内容。

实验室在人才、项目及原创性成果建设中成效显著。共有 5 个国家基金委优秀研究创新群体、3 个中科院创新团队、4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承担国家 6 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是目前全国唯一同时主持国家四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基地。创新成果连续 5 年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在 Science、Nature 及其子刊上发表论文 15 篇。建设培育了量子信息物理学、纳米化学、单分子科学、生物材料 4 个二级交叉学科。

大跨度学科交叉综合集成创新研究平台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蒙城地球物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2007 年 5 月，在中国科大与安徽省地震局蒙城地球物理联合观测站基础上，国家科技部批准建设安徽蒙城地球物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观测站以中国科大和安徽省地震局为依托单位，上级主管部门为中科院和中国地震局。

观测站已开展测震、电磁、形变、流体等 27 个测项地球物理观测工作，将增

加 GPS、重力等 10 个野外观测项目。用甚宽频带的地震仪、绝对重力仪和 GPS 监测郯庐断裂以及秦岭大别山带两个重要构造边界的蠕滑（慢地震）或长期缓慢的形变；通过长期积累地电、地磁、形变和重力的观测资料，为安徽及邻近省份的地震活动性、地震预报和地球物理学研究提供可

靠的资料；同时监测中高空大气层中的物理过程，实现固体地球、大气层、磁层等整体、综合性观测；通过可靠的地磁观测和太阳物理、磁层物理的研究，研究磁暴的早期预警问题，探讨和研究空间物理过程对 GPS 测量的影响，以及大气运动对于甚宽频带地震仪的影响。

院省部级科研机构

- ※ 中国科学院结构分析重点实验室
- ※ 中国科学院结构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 ※ 中国科学院选键化学重点实验室
- ※ 中国科学院材料力学行为和设计重点实验室
- ※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
- ※ 中国科学院壳幔物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
- ※ 中国科学院基础等离子体物理重点实验室
- ※ 多媒体计算与通信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
- ※ 安徽省高性能计算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 ※ 安徽省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
- ※ 安徽省光电子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 ※ 安徽省计算与通讯软件重点实验室
- ※ 安徽省生物质洁净能源重点实验室
- ※ 先进功能材料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 ※ 物理电子学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 ※ 网络传播系统与控制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 ※ 无线网络通信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 ※ 中国科学院热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 安徽省生物质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 生物技术药物安徽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综合国力信息监测系统研究中心

学科建设是学校培养人才、创新知识的基础。从建校伊始，中国科大的学科专业设置就确立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国际科技前沿的指导思想。在学科建设上，坚持“科学与技术相结合”、“有所为，有所不为”，基础学科在强调基础性、原创性、前沿性的同时，注重与国家需求和应用前景相结合；工程技术学科在强调面向实际应用需求的同时，注重以深厚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为背景，提高应用研究的深度与高度；管理与人文社会学科在强调学科交叉的同时，注重文理渗透和显著的数理基础背景。在面上学科建设的基础上，选择优势、前沿、交叉学科方向，重点突破，打造精品学科，着力开展基础性、原创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攻关，在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建校以来的学科演变

从建校伊始，中国科大的学科专业设置就确立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国际科技前沿的指导思想，50年来，适应国家需求和科学发展的变化，进行过三次重大调整。

建校初，共设立了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技术物理系、化学物理系、物理热工程系、无线电电子学系等13个系41个专业。这些系和专业全部围绕当时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家战略目标需求，同时体现了新兴、交叉、尖端、基础的鲜明特征。

南迁合肥办学以后，结合学校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从1980年代开始，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对学科专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改造，在继续巩固基础学科建设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工程技术学科，由原有的无线电、化学等学科“裂变”出计算机、火灾科学与工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统计与金融等若干工程技术和管理类学科专业。改革使学科专业结构更为完善，“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特点更为显著。

进入1990年代以来，学校坚持稳定规模、提高质量，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着力在促进学科交叉、催生学科生长点、打造一流学科上做出积极探索。1994年，国家实行“211工程”，重点建设一批一流学科，学校遴选了6个学科进行重点建设，这6个重点学科全部是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1998年国家实行“985工程”后，仍然将学科建设的重点放在交叉、新兴领域。2003年后，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大旗下，学校又与中科院近百所国立研究所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与研究所合作建设的学科专业和联合实验室，以及开展的互补互惠型科技攻关合作，将学科的交叉、集成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2006年5月,我校“十五”“211工程”项目通过“十五”“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国家整体验收:“科大在经费不多的情况下,集中有限资源,汇聚优势学科力量,选准突破口,实现了学科的跨越式发展。”图为专家组在校听取验收工作汇报。

学科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十五”期间，学校的国家重点学科由4个增至19个，增长幅度居全国高校之首。一级学科博士点由13个增至18个，理学一级学科覆盖率已达到95.2%，工学一级学科覆盖率已由立项前的20%上升到96%；二级学科博士点由60个增至100个，覆盖了我校绝大部分理工类专业。硕士点由79个增至135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点增加了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由12个增至17个。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全国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排名中，我校11个一级学科进入全国排名前5名。

交叉学科点的建设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学校在18个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了近20多个优势明显、特色鲜明、集成融合的交叉学科博士点，进一步适应了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与改善学科布局、优化学科环境的需要。

数学、物理、化学、力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等基础学科的优势继续保持并得到加强，信息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与技术、工程和材料科学与技术等学科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与科技相结合的管理学科和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科也稳步发展。

在单分子选键化学、量子信息科学、火灾科学与防治技术、生命科学、以生物质洁净能源为中心的绿色化学、极地科学、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等优势学科、交叉学科和特色学科，取得了一批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标志性成果，提高了跟踪国际先进水平的能力。

在2007年9月完成的国家第三批重点学科评审中，中国科大8个学科被列为一级学科的国家重点学科，其中理学门类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6个，并列全国高校第一；在二级学科层面上，我校的国家重点学科达到45个，总数并列全国高校第6，其中在培养理学博士研究生的学科点中的涵盖率达到了100%，即所有招生的理学学科博士点均为国家重点学科。与此同时，工程学科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数达到10个，在培养工学博士研究生的学科点中的涵盖率达到37%。这标志着我校理学基础学科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工学学科的竞争实力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专家们评审“211工程”重点学科

“九五”“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项目

- 极端条件下的凝聚态物理
- 火灾安全科学与防治工程
- 加速器物理及同步辐射应用
- 数学与非线性科学
- 化学反应的人工控制
- 现代工程材料的力学行为和材料设计

“十五”“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项目

- 数学、天文及理论物理中的重大问题
- 微尺度物质电子态、自旋态的控制与应用
- 化学反应的本质及选控
- 地球圈层相互作用的环境效应
- 蛋白质网络与细胞活动
- 多尺度复杂系统力学
- 带电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
- 火灾科学与安全工程
- 先进功能材料和相关技术
- 量子通信与信息新技术
- 可再生洁净能源

“985工程”二期建设期间重点建设的科技创新平台与基地

-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 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 火灾安全科技创新平台
- 信息科技前沿理论与应用创新平台
- 地球与空间系统科学科技创新平台
- 科技史与科技文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学科名称	学科名称所含二级学科
数学	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
物理学	理论物理、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原子与分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声学、光学、无线电物理
化学	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含化学物理)、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地球物理学	固体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学
生物学	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水生生物学、微生物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生态学
科学技术史	科学技术史
力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工程力学
核科学与技术	核能科学与工程、核燃料循环与材料、核技术及应用、辐射防护用环境保护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学科名称
天体物理
地球化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学科名称
安全技术及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校按照“用好现有人才、稳定关键人才、引进急需人才、培养未来人才”的原则，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着力引进、培养和稳定高层次优秀人才，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师资队伍结构更加优化，继续保持了“年轻人才较多”的优势。目前，全校 1132 名教师中，教授 383 名，副教授 376 名。其中，“两院”院士 28 名，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和中科院“百人计划”学者 138 名（不重复计算），占全部教师比例 12.6%；教师中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比例达 67%，年龄在 45 岁以下的占 75%，教授中 50 岁以下的占 60.3%。

两院院士



刘有成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



常印佛 安徽省科协副主席 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陈颢 国家地震局研究员 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院长



何多慧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研究员



伍小平 工程科学学院教授



钱逸泰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



杨国桢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原所长 理学院院长



朱清时 校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



王水 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李国杰 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 计算机科学技术系主任



蔡惠兴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研究员 信息科学学院院长



施蕴渝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童秉纲 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工程科学学院教授



崔尔杰 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研究员 工程科学学院教授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讲座）教授

经教育部批准，学校已有数学、物理、天文学、化学、生命科学、地学和空间科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力学、工程和材料科学、核科学与技术、火灾安全科学与管理科学、社会与人文科学等学科方向获准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讲座）教授岗位。目前，我校已有 22 位教授入选长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特聘（讲座）教授制度的实施，对我校延揽海内外中青年学界精英参与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带动这些重点学科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并在若干年内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术带头人，以大大提高学校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和竞争实力，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大师讲席

为了吸引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校短期工作和讲学，将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直接带入学校并加以传授，推动学校的部分重点学科达到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和竞争实力，2000 年，学校制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师讲席”制度实施办法》，利用我国老一辈著名科学家有很多曾在我校任职的无形资产，在有关学科分别设立“华罗庚讲席”（数学）、“严济慈讲席”（物理）、“钱学森讲席”（力学）、“贝时璋讲席”（生物学）和“赵九章讲席”（地学）、“吴文俊讲席”（数学）、“赵忠尧讲席”（物理）等。目前，学校已先后聘请大师讲席共 24 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大力推动高层次人才培养管理创新的积极实践，有利于凝聚人才，同时有利于激发人才勇攀科学高峰。学校借助这一政策优势，积极吸引海内外的优秀人才来校工作，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队伍。目前，我校入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年轻教授共 78 位，他们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已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突出的创新性成就。

百人计划

学校充分利用中科院“百人计划”的政策优势，积极组织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重点学科进行申报、引进国外杰出人才，从国内招聘急需的杰出人才。学校为“百人计划”入选者、“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使入选者在聘期内带出一支有一定规模、高素质的、固定和流动人员相结合的队伍，并建好实验室，取得阶段性科研成果。目前，我校已招聘 93 位年轻教授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包括“引进国外杰出人才”）。

两院院士



石耀霖 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周又元 理学院教授



侯建国 常务副校长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教授



林其雄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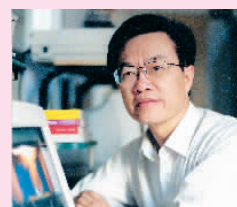
洪茂椿 中科院福建物构研究所所长 化学系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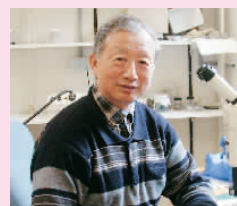
张裕恒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教授



俞昌旋 理学院教授



范维澄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李曙光 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陈国良 软件学院院长 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主任



吴奇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院长



郭光灿 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家铝 理学院教授



吴一戎 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所长 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主任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是中国科大最显著的办学特色，也是科大人 50 年来不懈探索的一种办学模式。学校创办之初，由中科院确立的这一办学理念，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与科研的一体化建设，开创了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先例，也探索了一条科教紧密结合的创造性人才培养之路。

探索新模式

早在 1956 年，我国制定的《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就针对新中国现代科技十分落后、科技战线急需补充优秀后备力量的实际，明确提出，“尤其在力量缺乏、急需发展的学科，如果研究所高级科学干部都同时负责高等学校的教学任务，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1958 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明确提出要按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模式来办学。这一模式，按照聂荣臻副总理的话来说，就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在三、四年级时，让学生到相关的研究机构中参加实际工作”，“以便在短时期内使我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型的科学部门迅速赶上先进水平。”

在这一模式下，中国科大建校之初所设立的 13 个系全部围绕国家空白、薄弱和新兴领域，且与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对口合作。使得中国科大从一诞生起，就呈现出群星璀璨、大师云集的盛况。

当时，华罗庚、钱学森、马大猷、贝时璋、严济慈、吴有训、柳大纲、赵九章、赵忠尧等一大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兼任校系领导并亲自授课。这一做法，保证了人才培养的高规格、学科专业设置的前沿性、课程讲授的高水准。同时，本科生在高年级时可进入中科院的相关研究所开展毕业实践或做论文，直接接触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在科学家的言传身教和研究所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科研实践训练，在参与创新研究的过程之中，深切感受研究者的思维方法。

“所系结合”所带来的大学与研究所的关系，无疑可以用“水乳交融”一词来形容。当时，逢年过节，留校的学生经常去科学院各所拜年、联欢，科学家们也专程到校向同学们回礼。老一辈科学家对青年学子生活、学习、思想上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传承新理念

“文革”期间，中国科大南迁合肥，教学、科研工作被迫停顿。1977 年 8 月，中科院召开中国科大第一次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模式办好科大。但是，在具体落实中却受到了地域和交通不便等因素的严重影响。

怎么办？1981 年 9 月，时任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大校长的严济慈坚决地说：“‘所系结合’不能丢，不执行所系结合的方针，科大可以不办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再次被提到全院和全校的高度。

1981 年 4 月，华罗庚先生邀请了王元、杨乐、张广厚、谷超豪等 13 位著名数学家来校讲学。华罗庚第一讲是“矩阵几何与狭义相对论”，教室内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站在通道上听讲。

当时，众多科学家重新兼任了科大各系系主任，并亲临学校讲学。唐孝威先生主讲《核和粒子物理导论》时，经常是上午、下午连轴讲课，星期天也安排座谈和讲课。为节省板书时间，他甚至利用午休时间把下午要讲的数据、图表抄了满满一黑板。按规定发给他的教学津贴也分文不收。他说：“来教学是我的职责，理当如此，不能再花国家的钱。”涂光炽、叶笃正、曾融生、周秀骥等一大批科学家，都采取所系结合的形式，亲自在科大讲学，并招收一定数量的研究生。

然而，毕竟受到地域、交通等因素的影响，“所系结合”开展起来困难重重，缺乏整体上的推动和全方位结合。

尽管如此，“所系结合”这一方针所蕴含的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理念却在中国科大得到继承与弘扬。学校大力发展自身科研力量，建设了一支融教学与科研实践为一体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本科生进实验室的传统被有效地继承下来，并形成制度化安排。

大师授课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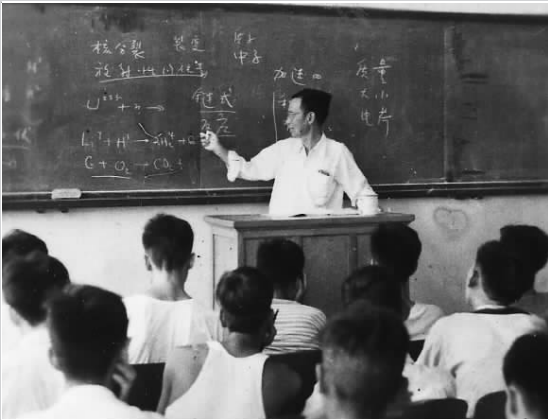
严济慈



钱学森



华罗庚



赵忠尧



杨承宗

建校初期，华罗庚、严济慈、钱学森等一大批顶尖科学家亲自走上讲台，为学生讲授基础课。

首任系主任

主任	系别	中科院任职
赵忠尧	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	原子能所副所长
施汝为	技术物理系	物理研究所所长
郭永怀	化学物理系	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吴仲华	物理热工程系	动力研究室研究员
顾德欢	无线电电子学系	电子研究所所长
武汝扬	自动化系	自动化研究所所长
钱学森	力学和力学工程系	力学研究所所长
杨承宗	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	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侯德封	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	地质研究所所长
华寿俊	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系	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华罗庚	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	数学研究所所长
贝时璋	生物物理系	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
赵九章	地球物理系	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 记忆 ●

在化学所做 本科毕业论文

1963 年秋季开学后不久，我们兴奋而又忐忑不安地去了化学所，当时，到中关村做毕业论文的占全班的一大半。第一天，匆匆赶到实验室，指导我做毕业论文的胡克源老师把事先拟定并写在纸上的毕业论文题目和大纲交给我，并正式介绍当时西安化学所在化学所进修的柴文琦老师（后任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站长）为我实验的第二导师。从此一系列毕业论文的严格训练就开始了。

尽管我所在的实验室是一个大实验室，但非常安静，人人忙忙碌碌却有条不紊，听到的只是轻轻脚步声，或实验用平衡水槽 24 小时连续运转的马达声，还不时飘过来轻轻的讨论声。我刚来实验室不久，但并不感到孤独，因为一遇到任何实验上的困难，甚至只要你表现出任何犹豫，老师们就会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来关心、帮助你。可以说，整个实验室就是一个大课堂，每一个人都是我的指导老师，不但没有陌生的感觉，还可以学到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这样的环境当然使我们很快进入工作状态，结果我的工作进展顺利，自然也有些沾沾自喜。我不知道胡老师是如何觉察到我这种心态的，有一天在他与我讨论工作后，不动声色地说，研究工作的结论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经得起别人的重复，并问我，你想不想毕业后也从事科研工作？事后，我把胡老师的这句话想了很久很久，主动放慢实验进程，但加强了实验重复性和可靠性试验，有时一个数据，需要几天甚至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为进一步提高体系氯化氢浓度，而又不妨碍实验室其他人的正常工作，在柴老师的同意下，我常在人们下班后趁天没黑时，到化学楼顶层做长时间通气实验，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

我们在化学所逗留了 8 个多月，那是在两位老师指导、整个实验室老师关心下的多少个日出夜归啊，这使我们在毕业论文的各个环节都得到了比较严格的锻炼，从开题、入题、深入到整体结果的获得，使我们真正体会了从事科研工作的感受。仅为毕业论文定稿，胡老师一丝不苟，至少前后为我改了 3 遍，最后还严格要求，完全按当时出版格式用印刷体誊写毕业论文，一式两份，交代我必须自己准备包括各种图表的照相制版、参考文献的逐字核对等等。

(1958 级 陈祖耀)



2007年5月14日，中科院“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工作会议在我校隆重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左四）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近年来，学校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新途径、新机制、新模式，以大学与研究所互惠互利的双向需求为引导，将“所系结合”这一传统“法宝”提升到新的境界。2003年以来，一种涵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基地建设、人员交流、资源共享等全方位、多层次、实质性的双赢合作模式，得以在由中国科大与中科院近百家国立研究所组成的国内最大的“科教联盟”中全面展开。

“全院办校 所系结合”指导思想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是中国科学院建设科大、办好科大的基本方针。在新的形势下，积极探索贯彻这一方针的有效新途径、创新模式和深刻内涵。应贯彻以下指导思想：充分发挥科大在推进中科院新时期教育发展战略中的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各研究所的积极作用；有利于科大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促进教育与科研相结合；有利于发挥科大和各研究所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全院办校 所系结合”具体要求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制定教育科研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各项事业发展规划，积极支持科大调整学科与科研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院重点实验室，在队伍建设、重大科研装备、教育科研基础设施改造等方面给予支持，并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安徽省对科大改革与发展的多方面支持。

按照知识创新工程和中科院办大教育的要求，根据大学的特点，积极推进和指导科大凝练科技目标、制定学科发展规划、校园建设规划等总体规划；支持科大的人才队伍、科研基地建设，解决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适当的科研编制问题，稳定重点实验室的中坚力量；进一步加大对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的支持力度，将其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交叉科学研究平台与基地；加强对科大正在筹建的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建设的指导与监督，确保院拨建设经费有一定的支持强度，鼓励科大以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和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建设为基础，积极构建生命科学、信息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基地，与学校其它已建成的重点实验室等逐步形成园区式国家实验室的新格局；把科大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院重点实验室纳入院综合评估体系，根据评估结果调整院支持强度和方式；把科大纳入我院装备发展的总体规划，通过重大装备的投入，有重点地支持科大加强与我院公共科研平台的互补交叉，以及现有优势的研究领域和相应的公共实验平台建设，并通过进一步整合支持，推动其进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序列。

摘自《中国科学院关于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贯彻新形势下“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办学方针的意见》

与研究院所构建战略合作关系



2003年以来，学校先后与中国科学院南京、上海、武汉、长春、成都、兰州、广州、沈阳、西安、昆明、新疆、北京等12个分院以及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长春光机与物理所、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西双版纳植物园、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广州能源研究所、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等11个研究院所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涉及面几乎覆盖了与科大学科专业相关的所有研究院所。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联合培养创新型人才

近年来，学校充分发挥“所系结合”的独特优势，在国内高校率先实施“大学生研究计划”，选送高年级本科生到研究院所从事科研实习和完成毕业论文，以融入研究院所良好的科研氛围，在优秀科研人员的指导下有目的地参与科研活动。目前，每年有700名左右本科生到研究院所开展实践教学，占年招收本科生数的40%。

随着“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深入推进，中国科大学生增进了对知识创新工程的理解和对研究院所的了解，激发了投身科技事业的热情。学校积极将优秀本科生免试推荐到研究院所攻读研究生，每年通过免试推荐到研究院所的优秀本科生占全校免试推荐研究生总数的1/3以上。2003年至2006年，累计向研究院所推荐免试研究生747人。

为促进双方在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部分研究院所先后在中国科大设立奖学金，激励青年学子勤奋学习、献身科学，并吸引优秀学生到研究院所深造或工作。近年来，共有5个研究所先后在科大设立了祖同奖学金、李薰奖学金、长光奖学金、黄鸣龙奖学金、成都光电奖学金等。

中国科大克服办学资源紧张等困难，与研究院所联合招收研究生并实施“两段式”培养，联合培养研究生规模由2000年的379人迅速发展到2006年的1038人；2003年以来，共联合培养研究生3717名。

研究人员互聘 共享人力资源

目前，学校共聘请了17位研究院所负责人或院士兼任院系领导，从研究院所聘请了200多位兼职博士生导师和一批兼职教授。2003年至2007年，研究院所的专家在科大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达40多次，开设讲座、参与暑期学校授课的专家每年达100多人次。此外，双方还共同组织、建设优秀科研团队和创新群体。

学校聘请的研究院所领导和专家兼任学校院系领导一览表

姓名	所属单位和职务	聘任职务
龚惠兴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院 院士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杨国桢	物理研究院原所长 院士	理学院院长
崔尔杰	北京空气动力学研究所 院士	工程科学学院院长
洪茂椿	福建物构研究所所长 院士	化学系主任
包信和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原所长	化学物理系主任
林其谁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院士	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阴和俊	中科院副院长电子学研究所原所长	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主任
谭铁牛	中科院副秘书长自动化研究所原所长	自动化系主任
相里斌	中科院西安分院院长	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系主任
李国杰	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 院士	计算机科学技术系主任
王建宇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所长	电子科学与技术系主任
陈 颀	国家地震局原副局长 院士	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院长
王利群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主任
吴家睿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系统生物学系主任
罗宏杰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主任
刘 钊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主任
陈 凌	广州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	医药生物技术系主任
吴一戎	电子学研究所所长 院士	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主任

加强科研合作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为充分发挥学校和研究院所的科研优势，促进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科大与一批研究院所协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科研合作。

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改造工程、合肥超导托卡马克HT-7、稳态强磁场、合肥同步辐射实验室二期工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上海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子午工程等国家大科学工程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都有科大与相关研究院所的密切合作。2005年以来，学校与研究院所联合承担了一批“973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知识创新工程等重大和重点项目，联合项目经费到款额达1.1亿元，年增长率达15%。学校与13个研究院所共建了核探测技术与核电子学联合实验室、化学物理联合实验室、智能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蛋白质科学联合实验室、网络与通信联合实验室、星系和宇宙学联合实验室、绿色合成化学联合实验室、数学物理联合实验室、网络传播系统与控制联合实验室、科技传播研究所、强子物理研究中心、新能源材料联合实验室等14个联合实验室，同时共同组建科研团队、创新群体和青年科学家伙伴小组，开展申请承担重大攻关项目，共建科学论坛，促进资源共享和学术交流，从深层次上体现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必须遵循的共享、互补、高效原则。

面向世界开放办学，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胸襟，更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中国科大创办伊始，汇聚了一大批留学归来的著名科学家，他们以国际化视野为学校注入了先进的办学理念，确立了独特的办学模式，使学校坚定了在开放中办学、在交流中提高、在国际科学前沿奋力拼搏的“卓越至上”的不懈追求。

率先面向世界开放办学



1980年，我校与美国马里兰大学签署了第一份校际学术合作交流协议。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吹响了科教兴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科大率先面向世界敞开了校门。

1980年初，经过多次接触和交流，中国科大率先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书。从那以后，学校与国际上许多大学及研究机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与交流，先后签署的双边合作协议书有80多份，更多的一线教师与欧美、日本的研究团队、大型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自1979年始，学校通过各种渠道邀请世界各国高水平科学家到校访问讲学。到198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袁家骝、吴健雄、陈省身、丘成桐、任之恭等世界顶级华人科学家频繁来到中国科大访问讲学，被学校授予名誉博士并受聘为学校的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

与此同时，通过教育部公派项目、科学院公派项目以及在国外有影响的专家学者的推荐，我校到发达国家作访问学者的教师超过百人，且逐年增加。他们在国外努力拼搏、刻苦学习，并保持与学校的密切联系，将国外一流学术机构的最新科研进展和管理理念、方法介绍到学校，学成后又大部分如期返校，迅速成长为学校的教学科研骨干。

在校学生通过“CUSPEA”项目（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项目）等渠道，也纷纷走出校门、国门，进入国际著名学府求学深造。

到了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初，学校的校长、副校长，系主任、管理部门的处长、副处长，80%以上都由在发达国家有过留学经历的教师担任，他们带来了全新的治学理念和最新的教学科研信息，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得到迅速提升，形成了浓厚的科学创新和学术交流的氛围。

国际化的学术评审

国际著名学府普遍看重外部评审的权威性和客观性。2001年开始，中国科大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建立国际化的学术评审制度，聘请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学者来校进行学科评审。

2001年5月，学校聘请美国MIT资深教授Jeffrey I. Steinfeld等对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进行了为期4天的评审；2001年12月、2002年5月，又分别邀请了美国科学院院士等一流学者对理学院物理口和信息科学学院进行了评审。

这些专家学者来校后独立召开教师和学生座谈会，亲自到教室听课，倾听学院和系领导汇报现状与发展规划，完全用国际化的视野、一流水平的眼光审视评价学校的学科现状，坦诚地提出他们的看法，为学校的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学校积极邀请世界各国著名专家、著名人士来校访问交流。图为1985年，被誉为当代爱因斯坦的史蒂文·霍金应邀专程来校访问、讲学。



学校积极参与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环太平洋地区研究型大学协会等世界大学组织活动。图为在我校召开的东亚研究型大学第九届理事会。



自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学校教师积极争取主办或承办全国性学术大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校先后承办了国际华人自动化大会，国际生产大会，以及物理、数学、地学、天体、化学、光学、力学等各学科的国际会议、国际双边或多边会议。图为在我校召开的非线性物理国际学术讨论会。



学校十分注重将优秀学生送入国际交流的大环境下，让他们得到熏染、经受锻炼。派研究生参加国际级学术会议，派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世界大学生论坛，和境外大学签订协议互派学生进行半年至一年的互认学分的交流，组织在国内或在境外双边或多边国家地区的大学生夏令营活动等。2006年6月，我校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硕博连读二年级学生栗青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第二批“明日之星”代表赴美国进行访问。图为栗青在微软总部前留影。

中日重点大学群的交流

19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根据中日政府间的协定精神，提出请日本学者帮助中国科大办好5个工科专业。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支持和东京大学及日本文部省的积极响应。1980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议定了中国科大与日本东大合作交流项目的具体内容，并签发了纪要。合作项目从1982年正式启动，当时的目标是东京大学工学部帮助中国科大办好5个工科专业，提升教学水平和科研层次，培养一批优秀人才。

20年中，两校之间的合作交流经历了三个阶段：1982年—1986年，双方在5个学科领域、15个课题方向上合作交流，对中国科大理工科领域中研究方向的确定、队伍的组织、实验室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7年—1991年，以合作研究为主，合作研究项目涉及到46个课题，标志着双方合作交流的目标向多层次、有重点、高水平的方向发展，从一般科技合作向长期战略合作为主转移；1993年—2002年，由于两校10年合作进展顺利，成果丰硕，双方决定将两校合作扩展为中日两国重点大学群之间的合作交流。中方以中国科大作为牵头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和浙江大学参加；日方以东京大学为牵头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和东北大学参加。两国大学群在最为当代科学界重视的5个学科领域17个课题方向上开展合作研究。

20年中，中日重点大学群合作交流不断向纵深发展，共涉及到15个学科领域，46个大项目。双方来往讲学、交流和做研究工作的达1200人次，召开各类学术研讨会20多次。



图为留学生与我校学生一起欢度新年。

奥列格·乌伦尼科夫获“友谊奖”

俄罗斯专家奥列格·乌伦尼科夫教授因其与我校选键化学实验室卓有成效的合作，获国务院颁发的2001年度“友谊奖”。

“友谊奖”是中国政府为了表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

平野敏右获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我校客座教授、日本国立消防所所长平野敏右教授在与我国长达16年的合作中，为我国培训科技人才120多人，并通过讲学、合作研究、人才互访、资助等方式，将国际火灾科学领域的先进知识传播到中国，推动了我国和我校火灾科学、安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发展。2002年，平野敏右教授获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郭沫若校长爱生如子

郭沫若校长是国内外的知名人物，又担任许多重要领导职务。58级新同学私下议论：“郭老兼我们的校长，他工作那么忙，我们能常见到他吗？”有的说：“见不到也没关系，只要毕业证书上有他的大印也就满足了。”谁知开学后不仅经常听到他的演讲和诗歌朗诵，还时常看到他在学生食堂与大家一起就餐，有几回甚至亲自给学生打饭。

1959年寒假，由于时值困难时期，绝大多数同学都没回家。除夕，郭沫若等校领导和学生一起吃团圆饭。饭后，学校举行春节晚会。演出前，郭校长笑容满面地走上舞台，双手合拳高拱，从东到西连连给师生员工工作揖拜年。大家都激动地站起来，热烈鼓掌，高呼“向校长拜年！”随即，校党

委书记郁文宣布：“郭老把他刚收到的《沫若文集》稿费两万元捐赠给学校，其中大部分用于补助生活困难的学生。为使同学过好年，郭校长提议发给每人两元，一元入春节伙食费，一元发到学生手中，作为‘压岁钱’。”

1960年的期末考试期间，学校食堂伙食有了明显改善，连续好几天，同学们的中餐都能吃到黄羊肉炖萝卜、炖土豆。后来，同学们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是解放军将在东北捕获的一批黄羊送给了科大的邻居——解放军政治学院，郭老知道后，“走后门”要了一些给同学们改善伙食。

1961年“五一”节，各系在校大操场及校内空地围成圆圈联欢。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唱歌跳舞，郭校长和其他校领导走走停停，一个系一个系地观

赏表演，看到精彩表演，他便脱下布鞋垫在地上坐着，并一再摇手不让工作人员去搬椅子。

为丰富学生的文体活动，郭校长捐款为学校修建游泳池，给学校购买放映机和影片，请全校师生免费观看自己创作的历史剧《蔡文姬》，还把国外友人馈赠的礼品转赠给学校。

郭沫若任中国科大校长20年，对学校感情特别深厚。逝世前，他将生前积蓄的15万元稿费交给中科院党组，希望用来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经院党组决定，国务院批准，从1980年起，这笔稿费用作在中国科大设立“郭沫若奖学金”。这是当时中国科大学生的最高荣誉，也是全国第一个以个人名义设立的奖学金。

(边宗)



1977年8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科大工作会议。此时的郭老已经久病在身，因国事很多，常住在北京饭店。10日下午，科大的代表们特地赶到北京饭店看望他。当郭老出现在会客厅时，大家长时间热烈鼓掌。在经历“文革”的种种磨难之后，重新见到老校长，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郭老在离开会场时依依不舍，连连招手，频频回顾。他那充满慈爱和深情的最后一瞥，从此铭刻在科大人的心中。这应当是郭老最后一次和科大人、和科大在一起。次年的6月12日，郭老永远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中国科大。

郭老对科大的最后一瞥，流露出无尽的期待和憧憬。科大人也没有辜负郭老的期望，在郭老“科学的春天”的呼唤里，迎风展翅，再一次创造了辉煌。如今，或许可以告慰郭老的是，50年过去了，中国科大已经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最新最美的学校”。

图为郭校长(左四)在北京饭店与科大教师代表亲切交谈。

(卢荻秋)

刘达：非常年代 非常英雄

1964年，刘达接替郁文，成为科大第二任党委书记。很快，“文革”爆发了，他被停职、打倒，戴上高帽，挂着黑牌，游街示众，过上了住牛棚、扫马路、清理厕所的苦难生活。在王震同志的干预下，1972年，刘达获得“解放”，官复原职，直到1975年离开科大。算起来，在科大的11年里，刘达实际在位时间只有短短5年。

就在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刘达做了两件大胆的事情：一是搞了一次效法西方大学的教学改革；二是召回“文革”中毕业的科大学生“回炉”再培养。

头一件始于1965年。当时中国大学全面效仿苏联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僵化，缺乏生机。在刘达的推动下，科大大搞“自由化”，引进西方学分制，在规定学分外，学生可在全校自由选修任何课程，并实行弹性学制，允许跳级、单科升级和提前毕业。与此同时，强调外语教学，要求学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还要求一些课程不限于苏联教材，而直接采用美国教材授课。这些举措大大调动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积极性，使得科大原本就有的“勤奋学习”的传统更加蔚然成风。只可惜，时间不长，“文革”的风暴便席卷了大学校园，这场极具前瞻性的教改也随之半途而废，并遭到严厉批判。

后一件始于1973年。科大经历了南迁重建的挫折，不但仪器设备损失殆尽，更严重的是，在北京时科大的教师队伍主体是中科院各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而这批高水平的师资大多没有随学校南迁。于是，重新出山的刘达一方面重建数理化基础教研室，顶着压力支持校内部分年轻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一方面从全国各地物色调入了200名教师。同时，他还把眼光投向了“文革”前考进科大却因“文革”而提前离校的这批学生，下令开办“回炉班”，重新召回补课，完成学业。到1975年，一共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了300多名1967至1970届毕业生回校进行培训，他们大多在“回炉”后被充实到师资队伍中。“回炉班”很快就被当成“右倾复辟”的典型，而受到严令禁止，甚至有人逼迫刘达签署文件将“回炉生”退回原单位。无休止的围攻、批斗终于使他病发，无法视事。1975年，刘达黯然离开科大，被调往北京，1977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即便在清华期间，刘达还多次亲自写信、推荐，帮助不少散落各地的科大毕业生回到母校。

刘达在科大做的这两件事，头一件虽然没能收获果实，但其中蕴含的教育思想却在科大产生了持久影响，并在改革开放后重新萌芽、开花、结果；后一件虽然也没能善始善终，但已经召回的300多名“文革”期间毕业生，在经过“回炉”重锻后，迅速成长，成为科大自己生长的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至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卢荻秋)

严济慈和他的“掌上明珠”

科大人都知道，严济慈多次把中国科大称为“我的掌上明珠”。1991年12月26日，科大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通过国家验收。90高龄的严老冒着鹅毛大雪参加验收会，会上他深情地说：“我今年已经过了90岁，很少出远门，但是我特别喜欢来安徽，回科大。到科大，我就觉得年轻多了，因为中国科大是安徽省和全国人民以及中国科学院的骄傲，也是我的掌上明珠，我每次都看到她放出新的光彩。”

1993年9月，中国科大35周年校庆，严老再一次亲临学校。学校办公室起草严老在校庆大会上的讲话稿，严老对文

辞修改不多，只是特别增加了“掌上明珠”一段话。于是，20日那天的校庆大会上，很多科大人再一次被严老那带着浓重的东阳口音的话语所感动：“建校35年了，我一直看着她成长，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天一天长大，一点一点成熟起来，越来越有出息，成为我的掌上明珠，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科大人深深感受到严老视科大为“自己的孩子”的那种执著与深情，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就在这天的会上，严老还高兴地说：“从1988年校庆30周年到今天，整整5年时间了，5年里，我是第三次来科大。来到科大，我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好象不是93

岁，而是63岁。”而在此前的1986年校庆28周年时，严老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我年纪大了，很少出门，可是最近8年到科大来了8次，合肥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就是说，作为耄耋老人，严老在1996年逝世之前，竟然不辞辛劳，十多次回到“自己孩子”的身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代著名诗人艾青是这样诠释爱的。严老将科大视为“掌上明珠”，让我们懂得了，最深挚的爱总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也不会是轻描淡写所能获得的，必须伴随着全心全意毫无保留的付出——在付出中升华情感，在付出中积淀深沉。

(卢荻秋)

钱学森：你们发了“科学洋财”

1958年秋冬，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火箭研制小组。没有厂房，就在新搭建的几间简易活动房内活动，加班熬夜成为家常便饭。那种艰苦创业、顽强拼搏的精神，颇像我们国家搞“两弹一星”的那股劲。也不奇怪，搞大火箭和小火箭都是由钱学森先生指挥和指导的，只是后者还增添了育人的色彩！就这样，在我们入校百天之内，就把长约1米、箭体直径约10厘米双基药，使用自己设计和加工的钢制超音速喷管、铝制外壳的小火箭，发射到约5000米的高度。

钱学森先生参与并指导了火箭小组的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取得的初步成绩，并了解了小火箭的设计、加工情况后，高兴极了。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他多次与火箭小组座谈，指导小火箭的研发

工作，有时在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1960年2月28日的一次讨论中，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可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制或陶瓷制。那时全国都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但钱学森先生对这个意见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依据。

火箭组的工作到了1960年已相当深入。那时我们已使用长余辉示波器测量和分析发动机壁所受应力情况，用自己研制的弹道摆测量发动机的推力，请解放军空军雷达部队协，用雷达观测火箭发射情况与发射高度，用自动弹射出降落伞的方式，成功地回收小火箭。为了提高小火箭的射程，还研制出双级火箭。

小火箭的研制较为成熟后，便开始与

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及中央气象局合作，以它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用来人工降雨或增雨，或者消除冰雹。1960年夏天我们曾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做过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与此同时，力学系火箭小组还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前往甘肃兰州地区用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同样收效良好。之后不久，中央气象局等单位曾成百支地向我们下订单；一些新闻媒体也纷纷来校采访报道。前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向我们索要样机，我们很郑重地向他们赠送了一支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

(1958级 张瑜)

郭永怀： 国家利益高于生命



1999年9月18日，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饱含激情地说：“他们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决定，对23位“两弹一星元勋”予以表彰。在追授“两弹一星元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为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郭永怀。

1958年，郭永怀先生与钱学森先生等负责筹建中国科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化学物理系，并出任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1959年6月，郭永怀临危受命，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工作最初的“三大支柱”。

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担任了九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经常风餐露宿，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戏称为核研究领域的“三尊大菩萨”之一。

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扎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而起……

迎接郭永怀的人们从惊骇中醒过来，急忙向出事现场飞奔过去。当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同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85年，郭永怀又被补授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2003年9月18日，郭永怀先生夫人李佩教授将郭永怀的“两弹一星元勋”奖章捐赠给中国科大，在校史馆永久珍藏。为纪念郭永怀先生为我校做出的贡献，2003年，学校设立“郭永怀奖学金”。2007年，李佩教授向“郭永怀奖学金”捐款30万元人民币。



赵九章：倡办中国科大研究生院

1958年，赵九章先生出任中国科大应用地球物理系首任系主任。1960年底，赵先生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建议恢复招收研究生工作。1962年10月，赵九章给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副秘书长郁文写信，信中写道：“我院办有科技大学，将来亦必逐渐加重研究生的培养，在我院开办研究生院之前，是否可以考虑我院及科大的具体情况，逐渐采取一些措施，为我院开办研究生院作好准备。”他还就研究生入学试题、课程讲授、毕业考试及论文答辩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吴有训，科大党委书记郁文就此信作了批示，表示要考虑赵先生提出的建议。

1963年5月，赵九章再次致信张劲夫副院长和科大副校长武汝扬，提出可以先办研究生班，后建研究生院的建议。信中说：“科大已经办了5年，教学基础已逐渐建立，我校的特点有二：一是有较多的科学家从事科研第一线工作；二是各所都是国家的重点

研究单位，有较好的大型实验设备。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这两个特点，一方面在今后高年级教学中予以体现，另一方面应参考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如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普林顿大学等）的情况，逐渐把重点放在研究生院，让研究生院成为我国培养研究生的一个中心。但是考虑到成立研究生院事关重大，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因此我们建议在地球物理系内先试办研究生班，请学校代为解决外语及有关基础课程的旁听等问题，地球物理所解决某些专业的课程和专题报告等。由所系共同负责试办，取得经验，对将来成立研究生院会有帮助。”张劲夫再次批示并请科大提出创办意见。

（季雨）

赵忠尧：建造中国第一台加速器

中国科大至今仍保存着由赵忠尧先生主持建造的中国最早的加速器——70万伏质子静电加速器。这台加速器为我国原子核科学事业的起步和培养核物理研究人才做出过重大贡献。

被周培源教授称为“我国核物理的鼻祖”的赵忠尧，为建成中国的加速器梦寐以求，历尽艰辛。1927年，赵忠尧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该校校长、192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由于出色的研究，他的毕业论文得了优等。1930年代，赵忠尧学成归国后任教西南联大，和张文裕等准备在国内开展核物理研究。起步阶段需要建造一台加速器，他们跑了两年杂货摊，除了找敲水壶的工匠做了一个铜球，搞到一点输送带，做了个架子，其他一无所获，最后在战乱中不得不放弃这个多少有些天真的计划。

1946年夏，美国在太平洋进行原子弹试验，赵忠尧受中央研究院推荐，作为中国惟一科学家代表去参观。此后，他在美国，利用中央研究院

汇去的少量经费，购买国内难以买到的加速器部件，连同几年来先后采购的实验器材，准备运回祖国，以实现他20年前的那个梦想——正负电子对撞。

新中国成立后，赵忠尧利用1949年至1950年底中美之间短暂的通航时期，设法将30多箱器材托运回国。1950年6月，赵忠尧登上威尔逊总统号，从洛杉矶启程，历尽艰辛于1951年初回到北京，供职于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此后，他肩负开创中国核科学研究的使命，利用千辛万苦从美国运回的器材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并于1955年建成我国第一台加速器。

1958年，赵忠尧先生负责筹建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并任系主任。他精心挑选师资，具体落实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专业教材，亲自编写讲义，讲授《原子核反应》课程，并将1955年建成的加速器运到学校进行实验和培养人才。（丁毅信）

华罗庚：“弄斧到班门”

华罗庚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人生态度，集中表现在他的名言警句之中。

1958年学校创办，华罗庚任数学系主任，亲自为58级学生讲授高等数学课，被称为数学系三“龙”之一。他一贯倡导“从薄变厚，又从厚变薄”的读书治学方法。“由薄到厚”是学习、接受的过程，“由厚到薄”是消化、提炼的过程。

华罗庚多次讲过“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1980年3月他给别人题词：“苦干猛攻埋头干，熟能生出百巧来。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华老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通过他不断地努力得来的：尽管他是天才，他仍然勤奋了一生！

华先生鼓励年轻人做学问要勇于和强者较量，认为应该“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他说：“你要耍斧头就要敢到鲁班那

儿去耍。在旁人面前去耍，欺负人家干啥？你到鲁班面前耍一耍，如果说你有缺点，下回就会好一点；他如果点点头，说明我们的工作就有相当成绩。俗话说，下棋找高手。找一个比你差的人，天天在那里赢他的棋，赢得每天哈哈大笑好不好？好是好，但你的水平提不高。如果你找高手下，每一次都输给他，输这么半年下来，你的棋艺能够没有进步吗？所以我主张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另一方面，他又强烈主张不迷信权威，“只是跟着别人的脚印走路，那就总要落后别人一步”，“在科学研究中最主要的精神之一是创新精神”。他多次讲过，要做出好的文章，关键是要有几乎自己的“招路”和“拿手好戏”，别人都不如你，这样你才能做出新的东西，人家才注意你。（卞和）

杨承宗： 一生只做两件事

1951年秋，杨承宗先生从法国居里实验室学成回国。这次回国，他带回了两样东西：一是应钱三强之托，为新中国购置了原子能研究方面的大量资料和仪器，和他向约里奥·居里夫人要的10克标准镭源；二是约里奥·居里先生给毛泽东主席的忠告：“你们要保持世界和平，那么你们必须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先有原子弹。”这两样东西的共同指向是——为新中国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1961年，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后，杨承宗责无旁贷地出任核工业部铀矿选冶研究所业务副所长，带领科研人员奋力攻关，提前3个月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准备好了合格的核铀原料，并取得数十项科研成果。

此前，杨承宗先生参与筹办中国科大，成为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的开创者。杨先生给学生上基础课时，亲自编写教材，十分注意把国际化学界前沿科学知识和科学创新的思维方法传授给学生，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他经常对同学们说：“科学就是前沿，科学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创新。”在1959年欢迎新同学的致辞中，他满怀豪情地说：“化学工作的特点本来是在于探索奥秘，废物利用；但我们还要无中生有，巧夺天工。”

1970年，科大下迁合肥，杨承宗先生已年近六旬，毅然携家带口随同南下，并在“文革”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坚持在学校进行化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在推动科大的火箭推进剂燃烧机理研究和国家同步辐射加速器建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78年11月，杨承宗被任命为科大副校长。

如今，97岁高龄的杨老，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幽默。在北京中关村的一栋“特殊”的住宅楼里，与另一位科大创办者贝时璋老人比邻而居。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科大办了一个专业。”面对校史访谈的科大采访同志，杨老爽朗地笑着，声音依旧那样的宏亮，那样具有感染力。（卢荻秋）



吴仲华 工程热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参与创建中国科大，创立了物理热工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吴先生亲自编写工程流体力学、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课讲义，登台授课。讲解概念清楚、逻辑性强、语言生动，深受学生欢迎。



钱志道：热心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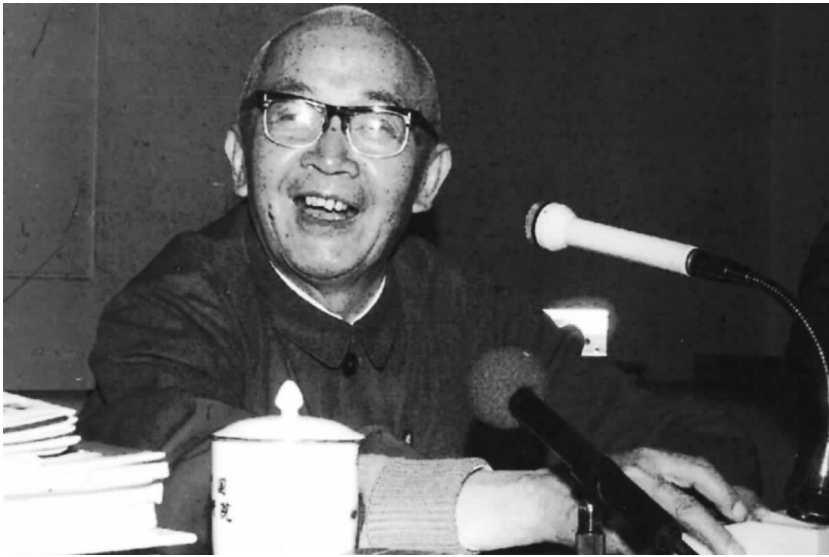
1935年，钱志道先生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37年奔赴延安，受命组织兵工生产，历经千辛万苦，奇迹般生产出大量化工品和枪弹。1944年“五一”节，被授予特等劳动英雄称号，毛泽东主席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解放日报》称赞“模范工程师钱志道创立边区基本化学工业”。1955年，钱志道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65年至1978年，钱志道任科大副校长，人们发现，他很少在办公室露面，老是在实验室、教研组和学生中间转。他凡事能自己动手，决不要别人代劳。得知秘书是本校无线电系毕业生，便说：“我这里没多少事，你到系里兼门课，不要把业务丢了！”用人单位反映学生动手能力较差，钱志道决定压缩课时，增加实验室，变教师“演示”式教学为学生“动手”式教学。他认为，大学生没有独立的科研能力，将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在他的倡议下，激光化学、材料工程、低温物理、天体物理等系科专业和科研机构相继在科大设立，后来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为筹建化学楼，他跑批文，要经费，建设中不时深入施工现场。

70年代初，科大从北京搬迁合肥，钱志道带头交出在北京的一套小楼。到了合肥新址，再挤也不会少了校长的住房，他却主动和钱临照教授合住一个单元。钱志道从不表白自己在战争年代的辉煌经历。钱临照院士在回忆文章中说：“70年代下迁合肥，科大住房紧张，我与志道两家蜗居于一单元内，朝夕相处，笑谈如在目前。他惟独不谈在延安为革命所作的贡献。毛主席题词，初尚藏于篋中，及后为人所知，乃以示人。”原来，是红卫兵抄家时在钱志道的箱底发现毛主席题词。当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眼中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原来是特等劳动英雄！

1978年，钱志道参与创办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大研究生院，任副院长。在研究生院工作期间，中科院让他在“部长楼”里挑一套五六间的住房，他却只要了一套三居室，住到逝世。住所离学校较远，每逢下班回家，他都请年迈体弱的老教师搭乘他的车。

钱志道退居二线后还经常关心着两件事：一是我国的国防工业建设；一是学校的教育工作。延安时代他的学生不少在国防工业部门，每逢去拜访他时，他都念叨说：“国防要现代化，光靠引进是不行的，一定要自力更生！”



顾德欢 电子学家。参与创办中国科大，出任无线电电子学系首任系主任。

武汝扬：主持起草汇报提纲

1958年，中国科大建校时，武汝扬先生兼任自动化系主任。1962年起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科大下迁时，武汝扬随学校来到合肥。1975年9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技大学办学方向和专业设置座谈会”。会后，武汝扬主持起草了中科院向国务院汇报提纲中的《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国科技大学的报告》。报告提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任务主要是为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及其它科研部门培养科学技术人员。这些人应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并掌握近代科学实验技术和至少一门外国语能力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文化考查，择优录取，学制四年。学生要学好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基础——数学、物理、化学、电子学及其测试技术，以及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学生要参加科学实验活动；学校要搞好科学研究；要重建基础课教研室，

大力加强基础课教学等等。这些办学思想现在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当年，提出这些思想是需要有胆识，是冒风险的。为此，安徽省多次对中国科大的运动作指示，要求大批“汇报提纲”、“追风源”，查“黑手”。

1977年9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会议。这是确定中国科大办学方向和办学方针的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要向国务院汇报的《关于办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几个问题》的内容并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充实。会议再次明确中科院继续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采取措施加强中国科大的教学、科研工作，把中国科大办成一个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此后，学校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1977年7月，武汝扬任中国科大党委书记，10月，中科院决定武汝扬等任中国科大副校长。



叶笃正 气象学家。1958年起任我校地球物理系大气物理专业主任，并讲授《大气动力学》等课程。

施汝为：培养磁学人才

近代中国磁学人才的培养和磁学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施汝为先生的亲身参与、积极支持和大力倡导分不开的。

1952至于1953年，全国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一些学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吉林大学等都拟在物理专业下设置磁学专门组。但是当时只有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设有国内唯一的磁学研究组。因此，这些筹办磁学专门组的大学都派青年教师到应用物理研究所磁学组进修。当时领导磁学研究组的施汝为为他们制定了进修计划，安排业务指导人，组织定期磁学报告讨论会，开设了磁学专业课。他亲自讲课和作专题报告。那时，所内人员一边翻译一边讲授的《现代磁

学》及后来在所内和全国讲习班讲授的《铁氧体物理学》都在他亲自参加或鼓励支持下正式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磁学译著和第一部铁氧体专著。

1958年，中国科大成立，施汝为先生出任技术物理系主任，对专业设置、教师来源、实验室建设、所里研究人员去学校讲课和高年级学生到所里做毕业论文等，都作了缜密的考虑和仔细的安排。他十分重视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对刚参加磁学研究工作的青年，在带领他们做过几次实验后，就放手让他们在科学实验中经受过锻炼，并严格认真地检查他们的实验数据，仔细审阅和修改他们的实验报告和论文，连用错的标点符号也代为改正。

侯德封：后半生的“三件事”

1951年，51岁的侯德封先生出任中科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他感到青春好像刚刚开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后半生“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组织全所科技人员全力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50年代初，湖南湘潭锰矿资源告罄，侯德封组队前往调查，发现濒临闭竭的只是地表的氧化锰矿，深部还会有原生的碳酸锰矿。钻探结果证实了他的预见，及时解决了国家钢铁工业的断锰危机。他和李四光等认为，西南部和东北部中新代凹陷也很有生油前景。这种认识成为后来把我国石油勘探基地从西部东移的战略决策的依据之一，导致大庆油田和东部其他油田的发现。

第二件事是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处提。侯德封带领科研人员开创了一系列边缘和新兴学科专业研究，其中陆相生油理论和同位素测年技术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件事是大力培养年轻人才。创建中国科大时，侯德封出任建校筹委会委员，担任地球化学系主任，亲自登台授课。他主张宁可压缩学生的地质基础课程，也要练好新兴实验技术的基本功。为招收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他亲自撰拟系科专业介绍和招生说明。他常对学生说：“地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又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任何心存侥幸都是徒劳的。”他要求学生努力做到“厚实、善思、耐劳、标新、敢为、谦虚”。而这些优秀品质正是侯德封一生为人、治学的真实写照。

侯德封先生晚年曾说：“虽然十年动乱期间对这三件事有不少冲击，但我坚持认为，只有把这三件事做好了，我们的地质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林玉）

吴文俊：教学有意外的收获

早在半个世纪前，吴文俊先生就把世界范围内基本上陷入困境的拓扑学研究继续推进。1956年，37岁的吴文俊因其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当时的“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年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2001年，他获得了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文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他上课，板书极美观，边写边讲，极少看讲稿。两块黑板从左上角写到右下角，满了擦掉，再来一遍，就到下课了，时间掌握极准。流畅熟练的表述和工整清晰的板书，加上他每节课之前都对前一节课的内容进行简明复讲，使枯燥的数学课变成同学们最为喜爱的课程之一。

2001年，吴文俊先生回科大讲学，在接受校刊记者采访时，谈到在科大从事的教学工作，他说：“我认为教学对我本人大有益处。以前我对代数几何不太懂，在科大任教时就主动要求教这门课，通过教学来学习，这些知识在我以后的数学机械化研究中成为一个生根的工具。这是我开始没想到的，是意外的收获。”



华寿俊 化学家。建校时任高分子化学与高分子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钱临照： “故于科大校园”

钱临照先生从学校一创办就给物理系的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学。1970年，他随学校南迁合肥，是终生与科大相伴相守不离不弃的少数几位老科学家之一。甚至曾经一度，在科大最为艰难的时期，他是学校唯一的院士。

钱老的可敬，不仅在于他在光学、晶体缺陷、物理学史等领域做出了杰出成就，也不仅在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科大副校长，更在于他对科大的一往情深，在于他对科大视如家园，从不萦萦于个人得失，而把所有的才智和爱倾注在这片土地上。

1958年，科大创办时，钱老已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可他上课来依然兢兢业业，没有一点“耍大牌”的派头。最初一个月，大部分同学反映他的课听不懂，原来当年很多同学没有学过高等数学，而钱老的普通物理学课堂上的物理运算需要运用高等数学的知识才能理解。于是，钱老干脆在课堂上连数学一块讲，还根据同学们的具体情况认真备课，每天面壁试讲，有时候还把备好的课先讲给大学毕业不久的女儿听。在课堂上讲授转动惯量时，他曾亲自坐上旋转凳作演示，大教室里顿时活跃起来，给听课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2年学校复课时，钱老已是66岁高龄，可他仍然精神矍铄，再登讲台，热情为学生传授物理知识。

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恢复重建与快速发展，1990年代的平稳发展，科大的许多工作无不倾注了钱老的汗水和关切的眼神。许多科大人都不会忘记，当自己在海外苦苦求学的时候，是钱老和他们始终保持着书信联系，那信纸上由钱老特意盖上的“月是故乡明”的印章，时刻呼唤着海外游子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钱老在世时，每从外地出差返回校园，总是十分高兴地对身边人说：“到家了。”他生前的一个心愿就是“故于科大校园”。1999年，他93岁时，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当时，他在省立医院，得知病情不可逆转后，便毅然提出“回家”的请求。当得知自己的病情已不适合在家里护理治疗的时候，又坚决表示，就算回到科大医院也是“回家”。7月26日上午9:40分，在科大医院三楼东南角的一间特护病房里，钱老的心脏平缓地停止了跳动。

据麦汝奇老师回忆，在校医院的100天左右时间里，钱老病房中使用的冰箱、彩电、微波炉、轮椅、充气床垫，包括生活护理人员的酬金，甚至病房门口的拖鞋，都是钱老自己出钱购买或支付的。他还交待，冰箱、轮椅、充气垫要无偿留给校医院，供其他患者使用。钱老的93岁生日是在校医院病房中度过的，他一再叮嘱家属要给校医院职工每人送上一个小蛋糕，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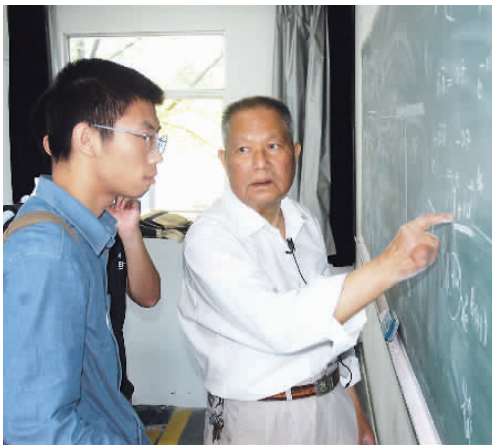
为了实现钱老永远在“家里”的心愿，2000年春天，学校在东区郭沫若广场东侧的绿树林中，为钱老安放了半身塑像，钱老的骨灰就安放在塑像的旁边。（卢荻秋）



陈希孺：不满意的工作决不拿出去

在我的求学生涯中，我有幸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要数陈希孺教授。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那段岁月，正是陈老师研究工作十分活跃的时期，他的很多工作，对我们从来都是公开的，刚刚做出来，我们就能读到了，这为我们步入研究领域无疑是极为有利的条件。我最初写的几篇论文，有些题目是他给的，有些是在他主持的讨论班上自己找的，有些则是他的有关工作的推广或改进。当时我的不少文章，都是经他仔细修改的，其中第一篇文章他就帮我修改多次，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他指导论文一向很严格，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没有做出来，他就要我举出反例；如果他认为我做的结果不够理想，就一定要我继续去想，决不轻易拿出去；如果我们做了好的工作，他就像是自己做出来一样高兴。这不仅使我对搞研究充满了兴趣，而且养成了锲而不舍的习惯。



龚昇 数学家，教授，曾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1958年，协助华罗庚教授等筹建中国科大数学系，为该系创建人之一。长期从事多复变数函数论，抽象调和分析与复分析等领域研究，在几何函数论、群上的调和分析、多复变数的奇异积分与多复变数的几何函数论等方面作出突出研究成果，开创了多复变数奇异积分新的研究路线。2002年获第五届华罗庚数学奖。图为龚昇教授在华罗庚先生塑像前。

陈老师对自己要求严格，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他自己首先要做到。他不满意的工作决不拿出去，有些甚至压半年以上。写书时他常常给自己规定一个进度，当天不完成决不休息，以致一本700页的研究生教材《数理统计引论》，他只用三个月就完成了。他在学术上从不保密，不少问题都是在讨论班上公开提出的。1982年前后，他瞄准了非参数回归和判别分析当时统计界关心的热点，经过半个月的准备，就到中国科大和安徽大学分别举办了一个讨论班和一个讲座，每周四个半天，他都参加并亲自讲课。每读一篇文章，他都要提出好多问题，让大家去做。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大家共完成学术论文十多篇，称得上是硕果累累的一个讨论班。他的研究工作对我国统计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我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博士中，经他指导的就有白志东、苏淳和我三个人。（赵林诚）

阮图南 理论物理学家，教授，曾任近代物理系主任。从事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论研究。1965年参加朱洪元教授指导的支子模型工作，提出了V-A强作用。1977年与周光召等共同提出陪集空间纯规范场理论和路径积分量子化的有效拉氏函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杨-米尔基场论和费曼-李杨理论。1980年与何祚麻等共同提出相对论等时方程，重新建立复合粒子量子场论，并较早提出原子核的私正对称理论和高能集团散射理论。先后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童秉纲：直面两个挑战

提及教学生涯，童秉纲认为有两件“特别有挑战性”的事情。这两件事，促成了他独特的教学方法论的形成，使他所教授的课程一直深受学生欢迎。

第一个挑战，是童秉纲1961年调到中国科大不久，便接到了系主任钱学森布置的任务，为首届（58级）近代力学系学生补课。

钱学森认为这届学生的数学力学基础不够扎实，于是找到童秉纲，希望他担负起为他们强化力学基础的教学任务。这是一项很棘手的任务，好像煮夹生饭一样。当时该年级有8个班、200多人，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程度不一，讲起课来众口难调。

经过认真思考后，童秉纲认为，补课的关键是要引导学生学会力学研究的方法论。他决定讲授最基本的但有深度的内容，既帮助尖子学生加深理解，也能为一般的学生所接受，然后通过大量

习题的训练，来着重解决如何从实际中来又到实际中去的理解、分析和锻炼，帮助大家真正理解并建立起力学的思维方式，真正掌握力学的方法论。实践证明，这个方法是成功的。应该说，在讲课中既传授知识，又启示其方法论，是他一贯的教学特色。

第二个挑战，是1986年童秉纲调到中科院研究生院后，开始为研究生讲授旋涡运动原理课程。

童秉纲认为，在研究生阶段，课堂上仅传授知识是不够的，必须让学生学会独立学习和研究的能力。所以他将授课时间定为36个小时，而不是学校原定的60个小时，他讲课的时间只占其中2/3。课上主要讲一些基本概念，细节问题都不讲，剩下的时间让学生做大量习题，让他们自己学习钻研，最后还要写成学习总结。旋涡运动原理这门课程，童秉纲讲了10年。

吴杭生： 自己先要有一桶水

吴杭生教授课讲得好是有名的，语言简洁，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概念交待非常清楚。他的腿脚有点不便，走路靠自行车，站着比较吃力。大家劝他坐在椅子上讲课，他不肯，一则要写黑板，不站不行，再则，他觉得坐着讲课总不对劲。身体本来并不强壮，两节课讲下来确实很累。他站着讲课，在讲台上来回走动，声音很宏亮，还不时地写黑板。累时就在黑板前靠一靠，或用胳膊肘在讲台上撑一会，非常感人。每次上课前他总是穿得干干净净，一节课下来，满身粉笔灰。在两节课中休息10分钟时，他抽根香烟，以缓解一下疲劳。但有时认真听课的学生不过这个提问的机会，吴老师不顾疲劳，热情解答学生的问题，然后继续打足精神讲下一节课。

当时教授讲课，助教答疑和批改作业，这好像是个行规。可吴老师并不遵守这个行规，他自己讲课时，亲自参加辅导。他规定跟他辅导的老师除了在规定时间内坐在指定教室等学生来问问题外，还必须到学生宿舍去上门辅导。我们去学生宿舍时常常看到吴老师也在那里辅导，了解学生学习情况，若有比较普遍的问题，吴老师会在下次上新课内容前补讲一下。

1981年我从英国Sussex大学低温物理实验室进修回国，系领导让我和曹烈兆准备接吴杭生教授的“热力学、统计物理”课。这门课虽然学过，但要想教好并不容易。吴老师便象师父带徒弟那样练我们，他对我们说：“你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

吴老师是我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统计物理学大师王竹溪先生的得意门生，他的“水”何止一桶，少说也有一大缸。我1963年大学毕业，经过下乡搞“四清”和十年“文革”，大学学过的课也忘得差不多了。我负责统计物理部分，不要说“一桶水”，连“一杯水”也不满。于是先跟着吴老师辅导两次，听课、答疑、讲习题课，把这杯水装满。吴老师给我们指定了几本参考书，后来我又把国内外新出版的热统书和相关的习题集都买了，目的是在“桶里”尽量多装点水。

在吴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经过多次讲课、答疑，自己对这门课的理解逐渐加深，讲课效果也逐年见好。（陈兆甲）



项志遴 物理学家，曾任近代物理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核学会理事。曾从事核裂变原子能研究、放射性探测器研制、中子能谱核参数测量、反应堆用中子探测器研制等工作。后又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及受控核聚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研制成功数种高温等离子体诊断仪器。著有《高温等离子体诊断技术》、《计数管》等。



50 年来，中国科大已培养近 5 万名德才兼备的优秀毕业生，有 42 名毕业生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同期毕业生中当选院士数最多的高校。本科毕业生中平均每 1000 人中就产生 1 名院士，和 700 多名硕士、博士，比例高居全国高校第一。有数千名优秀毕业生踏上国防科技战线，为科技强军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 20 多名科技将军和一大批国防科技中坚。在历年评选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中，作为科技界、科技创新型企业界青年俊才代表，科大毕业生已连续多年榜上有名，获奖总人数居全国高校之首。在同期毕业生中，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 IEEE（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协会）会士、获得何梁何利奖、全美“大学发明家竞赛”大奖等荣誉，也是全国高校最多的。

限于篇幅，我们挑选出部分杰出校友作为代表，来展示我校毕业生的风采。



王志珍 上海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副主席。1964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生物物理系。在蛋白质折叠，折叠酶和分子伴侣；胰岛素 A、B 链相互作用及重组等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提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说，为该酶固有的分子伴侣活性提供了最早的实验证据，并证实和区分了该酶的二种活性在帮助含二硫键蛋白折叠中的作用，打破两大类帮助蛋白的界限，总结出折叠酶新的作用模式；最早成功地用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催化同一基因编码的两条肽链的正确重组，提出“胰岛素 A、B 链已经含有足够的结构信息而能相互识别和相互作用，并形成结构最稳定的天然胰岛素分子”。

龚惠兴： 载人飞船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

龚惠兴，上海市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航天遥感、光电技术专家，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研究员、国家 863 计划航天航空领域专家委员会主任。1963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自动化系。

对经常收听收看气象预报的人来说，风云一号卫星就像“老朋友”一样亲切。它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气象卫星，就像人类安插在太空的“神眼”，每天恪尽职守地发来它拍摄的清晰的卫星云图，为人们预测“风云变幻”提供第一手资料。龚惠兴就是“神眼”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 1977 年至 1990 年的 13 年时间里，他带领同事们，完成了风云一号气象卫星遥感系统的研制，并为我国航天红外遥感系统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1990 年代初，我国正式实施被命名为“921 工程”的载人飞船工程。1992 年 11 月至 1994 年 2 月，龚惠兴被任命为该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他主持了该项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内容最多、技术最复杂的空间应用系统的前期研制工作（包括对地观测、空间天文、空间环境探测、空间材料、生物试验以及地面应用系统），确定了研究目标，组织了设计师队伍，划分了各任务间的分工界面，争取了上船实验的条件，为后续研制工作打下了基础。在前几次的“神舟号”飞船上，都有龚惠兴院士亲手设计的仪器设备。他说：作为一位科研工作者，能有机会亲身参与“神舟号”系列飞船的研制、设计等工作，是莫大的荣幸，“这是十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杨秀敏 河北青县人，防护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第四研究设计所高级工程师。1965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在触地爆炸效应的研究过程中，最先完成了爆炸成坑和地冲击波传播的数值模拟。将系统工程的分析方法应用到防护工程的论证实践中，对防护工程的防护原则、防护标准、防护效益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若干提高指挥工程战时生存能力的重要建议；建立了预测城市灾害的分析模型，并编制了相应的软件，在几十个城市的人防工程建设中得到了应用。

赵忠贤：“超导人生”

赵忠贤，辽宁新民人，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陶瓷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1964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技术物理系。

1911 年，荷兰科学家翁涅斯发现，在一定的低温状态下，某些固体的电阻会突然间降到一个很小的数值，几近于零。这种状态就是超导。此后数十年，一个探索超导并开拓其应用前景的攻关战在全世界范围里展开。

在中国，著名超导专家赵忠贤从 1976 年开始从事高温超导体的研究工作，并取得重要成果。1986 年，赵忠贤得知瑞士物理学家柏诺兹和缪勒的

在 La-Ba-Cu-O 材料中发现了 35K 的超导电性的可能性，他立即带领他的研究小组开始了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为了揭开这类超导体的谜底，他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实验室中，反复推敲实验方案。饿了，啃口面包或泡一袋方便面；累了，轮流在椅子上眯一会。遇到困难，赵忠贤鼓励大家：“别看现在生产的材料不超导，但是新的超导材料很可能就诞生在下一个样品中。”几个月后，就像某些金属到达临界温度后突然间电阻消失一样，他们的艰苦努力换来了柳岸花明的时刻——他们发现了 La-Ba-Cu-O 系列材料中有 70K 的超

导现象。随即，在 1987 年初，他们又获得了起始转变温度在 100K 以上的超导体。1988 年春，他们首先在 Ti 系氧化物超导体上，获得转变温度在 120K 的超导体。

多年从事超导研究的赵忠贤，也在不懈的追求中逐渐体验着人生的超导状态。对于他来说，超导不仅仅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领域，也是人生旅程中的一种超然境界。因为工作出色，赵忠贤等先后获得国内外多项殊荣。然而，当荣誉到来的时候，赵忠贤却谦虚地说：“荣誉归于国家，成绩属于集体，我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分子。”

李崇银： 从科学家到将军

李崇银，四川达州人。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军事气象系教授，中科院院士，少将。1963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地球物理系。

1963 年，李崇银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科大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工作。“文革”开始后，他被迫停止了研究工作。

1977 年以后，国家迎来科学的春天。李崇银开始了他的气象学研究，夜以继日地学习钻研，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1980 年他被派往美国深造并进行合作研究 1 年，1981 年按期返回国内。1984 年担任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环流和地球流体力学研究室主任、后又兼任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随后，他在热带气象学、动力气象学和气候动力学等学科领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级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八五”期间任国家攀登项目“气候动力学和气候预测理论”专家组成员和课题组长，“九五”期间任国家攀登项目“南海季风试验研究”首席科学家、“973”项目“我国重大气候灾害形成机理和预测理论”专家副组长和课题组长。

几十年来，李崇银院士在热带气象学、大气低频振荡及其动力学和 ENSO 循环动力学等大气科学前沿领域内取得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为推动热带气象学及气候动力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004 年 10 月，经总参和总政批准，李崇银被特招入伍，被任命为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军事气象系动力气象与数值预报教研室教授，并被授予文职将军，成为近年来国内第一位特招入伍的中科院院士。

（杨晓萍）



刘嘉麒 辽宁省北宁市人，火山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6 年获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理学博士。长期从事火山地质学及第四纪地质学研究，完成多项国家级和国际合作项目，对中国东北、西北、青藏高原和南、北极等地区进行过广泛地质环境调查，新发现多处火山，揭示了中国新生代火山活动规律与地质特征，推动了中国的火山研究；开拓了中国玛珥湖高分辨率古气候研究的新领域；发现黄土中游温室气体高异常，建立了渭南黄土剖面高分辨率时间标尺；参与了新疆的资源探测和生态环境研究以及南、北极的科学考察，探讨了南极火山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在火山地质与第四纪环境地质等方面做了大量系统创新性工作。



杜善义 辽宁大连人，飞行器结构力学和复合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复合材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64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长期致力于力学和复合材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解决了特种环境材料的模拟、表征与设计中的若干关键理论与技术；在先进复合材料的研究与应用中作了较系统工作，提出材料结构一体化、结构功能材料一体化理论；将细观力学理论应用到材料性能预报和设计中，发展了随机夹杂理论；在智能材料的结构健康监测与变形控制以及断裂力学方面获得重要成果。

饶子和：做科研要有点野心

饶子和，江苏南京人，生物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特聘教授。1977年毕业于中国科大物理系。

1989年，饶子和在牛津大学做博士后时，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个重大科研课题——关于流感病毒的核蛋白研究。可做了一年半，却毫无突破。那时候，他嘴里常常念叨“我爱科学，可科学不爱我”。后来，他将目光转向艾滋病病毒研究，到1995年，突然井喷一般做出两项成果，分别发表在《自然》和《细胞》上。《自然》杂志称他的“艾滋病病毒及其病毒家族分子的装配模型”研究，“为抗AIDS病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从此，饶子和结束了对科学研究的“单恋悲剧”，并在结构生物学界拥有了一席之地。不过，幸运并非时刻伴随着他。1999年，饶子和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组建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开展的第一个课题是“头孢菌素酰化酶晶体结构研究”。研究成功了，按饶子和的话说，得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全新结构”。可就在他们刚刚完成的时候，别人的研究成果发表了。课题组的所有成员象被打了一闷棍，气氛异常沉闷。饶子和最终打破沉默：“好了，现在归零，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新课题的饶子和吸取教训，常常跟“催命鬼”似的，课题一有新的进展，他就在一旁催促：“越是到最后越不能松气，等你吃完饭、睡一觉起来，没准人家就做出来了。”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席卷了中国大地，在极度的恐惧感中，人们十分希望抗SARS病毒的药物能够尽快研制成功。那时，饶子和刚刚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担任了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他紧急命令研究组停下手中的其他活计，转向SARS的基础研究。经过研究组同仁的共同努力，我国首次成功地解析了SARS病毒的主要蛋白酶3CLPRO及该酶与抑制剂形成的复合物的三维空间结构，揭示了该酶与底物结合的精确模式，并发现该酶与同一种抑制剂有着不同的结合模式，为抗SARS药物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结构基础。

如今，荣任南开大学校长的饶子和，又将目光投注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在本科生课堂上，饶子和这样对他的学生们说：“好多东西做起来感觉蛮好，可做的时候不可想象，也不敢想。但是，我还是主张，做科研要有点野心！”



严加安

江苏邳江人，数学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大应用数学系。在概率论、鞅论、随机分析和白噪声分析领域取得多项重要成果。给出了一类L1-凸集的刻画，该结果成为金融数学中研究“资产定价基本定理”的一个重要工具；推广了无穷维分析中著名的Gross定理和Minlos定理。提出了在鞅论中基本的局部鞅分解引理；给出了半鞅随机积分的“初等”定义，为研究随机积分的性质提供了简单途径；用统一简单方法获得了指数鞅一致可积性准则，改进了Novikov和Kazamaki准则及某些其它结果。给出了白噪声分析中的Fourier变换的严格定义，引进了重正化算子；与P.A.Meyer教授合作，首次对广义泛函定义了Wick乘积并对白噪声分析的框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Meyer教授引进的框架被称为“Meyer-Yan空间”，并被《数学百科全书》引述。



魏奉思

四川绵阳人，空间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大地球物理系。从理论上得到了行星际激波在非均匀的运动介质中传播的解析解，预言太阳耀斑产生的激波可以传播到10-20AU以远而衰减不大，此结论为后来飞船观测所证实；提出耀斑激波传播的三维非对称物理模型，其结果可以解释相应地球物理效应的非对称性；发现行星际扰动在传播过程中将向赤道低纬电流片方向偏转、会聚，电流片阻碍行星际扰动的跨越传播，导致行星际扰动和地磁扰动的同侧效应。



林尊琪

北京市人，高功率激光技术专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高功率激光物理国家实验室总师。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大无线电系。长期从事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高功率激光驱动器和X光激光研究等。在神光II激光装置研制中创新解决了同轴双程主激光放大器的新型空间滤波技术、全激光系像传递技术、新型三倍频模拟光技术、三倍频稳定高效转换系列技术、神光II高效全光路系统自动准直技术等难题，推动了激光驱动器研究能力的质的跨越。



宋湛谦

上海市人，林业工程与林产化学加工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大高分子化学系。长期从事林产化学加工研究和工程化开发工作，是我国松脂化学利用及其工程化开发的开拓者之一。率先进行松脂化学深加工及系列化的研制和工程化开发，先后制成聚合松香和氢化松香等30多种产品。提出松脂深加工与精细化工相结合的新思路，创制10种精细化学品以代替石油原料不足。应用性成果转化率90%，产生显著经济社会效益，并实现技术出口。首次系统研究松属松脂化学特性，从中国松脂分离、鉴定Lambertianicacid等组分，研究松香化学反应机理，为松树化学分类和松脂资源利用提出重要依据。

许祖彦：追逐美丽的光谱

许祖彦，四川省邛崃县人。激光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大物理系。

作为一个著名的激光专家、院士，40多年的科研生涯，许祖彦始终与媒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公开接受采访的只有两次：一次是为了配合单位的工作，另一次是为了让大家更多地了解863。而在其余时间，许祖彦总是拒媒体于千里之外。他说：“我是做科研的，要拿成果说事。夸夸其谈有时候会误导大众。”

许祖彦上大学三年级时，美国人T·梅曼发明了激光。美丽的光谱吸引了他。从那时起，他便和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人员一起开始研究激光。1990年代初期，许祖彦开始做全固态激光研究，接着，开始

研究红、绿、蓝三基色全固态激光器，希望用于激光电视，很多人批评他胡闹。但在863计划的支持下，2002年9月，用激光投射的电视终于显示出了色彩鲜艳、内容真切的画面——中国激光电视研制获得突破。

可贵的是，激光电视的研制使得中国拥有了48项激光显示方面的专利，主要集中在光学材料、半导体封装技术、激光技术、匀场消相干以及投影物镜等方面。可以说，全世界任何公司，如果想把大色域的激光显示产品打入中国，都必须要向中国交纳专利使用费。因此，可以成为我国与外国企业专利交换、分享全球市场的条件。

一旦激光显示技术推向产业化，电视台传输带宽、标准等方面也需要重新制

陈颢：两件事，一辈子

陈颢，江苏宿迁人，地球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地震局研究员。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大地球物理系。

陈颢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傅承义老师亲自指导的。有一次，傅老师推荐他读一篇经典德文文献，陈颢说自己不懂德文。傅老师看了他一眼，一言未发，走了。陈颢以为此事到此为止了，没想到一星期后，傅老师拿出了一本硬皮笔记本，上面整整齐齐地写满了英文。原来，傅老师已将这厚厚的72页德文文献完整地译成了英文。

陈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不用说翻译，就是简单照抄一遍，怕也要用上三四天时间。他不知道怎样表达心情，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走出了傅老师的办公室。这一瞬间一辈子留在了陈颢的心里，不时地触动着他，让他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的学生。

“文革”期间，傅承义先生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在“学习班”接受改造。1975年海城大地震后，陈颢在研究所里做一个题为“海城地震前震的特征”报告。会议室的旁边就是傅老师等人的“学习班”。当时，他对是否能将时间密集、空间集中的小地震作为大地震的前震这个问题有所思考，但论据尚不充分，论述也不顺畅。

报告结束后，陈颢最后一个走出来，见到了在“学习班”门口等候的傅老师。原来尽管他被勒令不准走进报告厅再去搞“反动”的学术研究和宣传，但耳朵还是自由的，他就这样躲在角落里听完了陈颢的报告。“你谈的不一定是所有前震的特征，但这种现象可以用来作为一个信号，表示一串地震中最大的地震是否已经过去。”他小声地对陈颢说。

短短的一句话，不仅将陈颢一段时间以来研究地震时积压的许多困惑一扫而光，而且傅老师即便身陷逆境，却仍然乐观、执著地关注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舞、激励后辈的精神力量，也带给陈颢极大的震撼。

发生在陈颢和他的导师之间的这两件事，给陈颢以一辈子的深刻影响。陈颢在他的自传里这样说：“我逐渐认识到地震领域是科学上的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它的进展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在地震这种毁灭性灾害的面前，人类显得太渺小。慌乱与无助似乎不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即便微小，也可以聚液成河。我决定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在这片荒地的开垦上。到现在已经30余载了，我仍在不知疲倦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



汪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55年3月生，安徽宿州人。中国科大管理科学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工学硕士。

刘济生： 载人飞船副总指挥

1964年，刘济生从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毕业时，两个超级大国都已成功发射卫星，中国整个科技界正沉浸在“卫星热”中。1966年3月底，国防科委主持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研制宇宙飞船的规划被摆上日程，刘济生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从事对航天事业的研究、探索。

中国载人飞船的雏形最早出现在1970年，中国第一代航天员的选拔早已展开。从全国14个歼击机部队及院校选拔出来的20名航天员每天在模拟舱里训练，但是到1972年，飞船计划陷入时断时续的状态。

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再次立项实施是在1992年9月。此时，中国的火箭已能发射到离地36000公里的黄金轨道，运载能力从原先的3.3吨提高到了7吨。刘济生成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负责载人飞船系统经济可行论证组的成员之一。他坚信，这一次载人飞船工程的论证必然成功无疑，因为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因素，都为载人飞船工程上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对于他这样年纪的人来说，这是和飞船论证第二次握手；作为主角，恐怕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为了形象地展示我国未来载人飞船结构和工作状态，刘济生组织了几位计算机高手，设计了飞船飞行程序三维动画片。载人飞船在太空翱翔的生动画面，在载人飞船论证汇报会上收到了超出想像的结果。

刘济生的艰辛和付出，在无际的太空也一步一步地得到了回报。航天员终于飞上了太空，他心中的蓝图终于变成了事实，他完成了一生的梦想和追求。

从参加工作至今，40多年过去了，中国载人飞船副总指挥刘济生教授也参加了我国多种型号航天器的研制、发射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获得多项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特等奖、神舟号试验飞船一等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次飞行试验特殊贡献奖、在神舟飞船研制和首次载人航天中荣获“载人航天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等。



陈昊苏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1942年5月生，四川内江人。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大电子学系。

王永民:当代毕昇

1978年至1983年，王永民以5年之功研究并发明“五笔字型”，以多学科之集成和创造，提出“形码设计三原理”，首创“汉字字根周期表”，发明25键4码高效汉字输入法和字词兼容技术，破解了电脑汉字输入这一难题，为中国跨过信息技术这道鸿沟作出了贡献。

1984年，五笔字型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演示，当汉字在电脑屏幕上以每分钟120个字的速度跳出的时候，在场官员目瞪口呆。一位联合国官员下意识地吧键盘翻过来看看，检查一下其中有没有“猫腻”。

五笔字型获中、美、英三国专利，王永民被国内外媒体誉为“当代毕昇”和“将中国带入信息时代的人”。五笔字型还被中国科学院列入20世纪全世界100项最伟大的发明，与开创人类科技新世纪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和引发生物科技大震动的克隆技术相提并论。

1991年，王永民又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1月4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为了让“五笔字型”尽快地造福于社会，王码电脑公司将本来可以产生百万元效益的最新成果——王码5.0版汉字操作系统软件向国内不加密开放，也就是说，中国人可以不付任何代价使用这种系统软件。亲临会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在讲话中说：“作为一个科学家，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作为一家公司，损失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在国内外电脑界也是没有先例的。我们的社会应当提倡这种精神，应当表扬这个创举！”

1993年，王永民在新加坡海关接受安全检查，工作人员看了他的签证后，立刻从座位上弹跳起来立正敬礼，说：“王老师，我们正在学习您的五笔字型。”还有一次，王永民打出租车。司机问去哪儿？“到王码公司。”出租车司机说王码公司老板可有钱了，王永民：“你怎么知道他有钱？”司机：“王码公司老板坐卡迪拉克。”王永民：“你见他坐过吗？”司机：“想都想得到。”王永民：“你认识王永民吗？”司机：“我一个司机怎么会认识他那样的大老板？”王永民：“小伙子，你可别这样说，你是干活的，王永民也是干活的。我就是王永民。”司机急刹车，从车上跳了下来，两手握住王永民的手，泪都出来了：“我没想到像你这样的大人物还坐‘面的’，我的‘面的’让你坐一次真是太荣幸了。”

曹保榆:面对 SARS 全力以赴

1970年，曹保榆从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毕业，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某研究院工作。1997年被评为总装“优秀中青年专家”，1999年众望所归地成为了该院院长，并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项多项。

2003年3月，北京地区发现非典疫情，研究院立刻成立了抗击非典指挥部，曹保榆带领一批科研顶尖人才投入了抗击非典的战场。4月底，北京市场病毒防护口罩短缺，他组织科研人员一起投入科技攻关研究，依据过滤吸附原理，采用高效过滤材料和活性炭纤毡，仅用两天时间就研制出了安全性更好的特种防护口罩，并立即组织批量生产。紧接着，一线医护人员相继被感染的消息传到了研究院，曹保榆立即要求相关研究所以最快的时间制定出医用非典防护用品的检测标准和相应的检测技术手段。很快这些标准和检测手段就得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可，从过滤效率、物理强度、断裂强度、抗水性、透湿量、穿透性能和阻然性能等七个方面对医用防护服进行严格检测，确保了被检测的用品能够有效地阻挡非典病毒。“北京市地坛医院SARS尸体解剖室”是国家在非典期间紧急启动的“863”项目——“SARS的病理解剖、标本采集和病理机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SARS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所以该解剖室必须建立完善的防护系统。接到这个任务后，曹保榆组织研究院科研人员仅用了十几天，就完成了解剖室防护系统的研制和安装工作，为国家紧急启动这个课题作出了可贵贡献。

就这样，在非典疫情爆发最严重和紧迫的那几个月，特种防护口罩、特种应急生物防护服、正压呼吸防护系统（面罩）等非典防护科研项目相继取得成功，并迅速投入到抗击非典的一线。而这一切都是曹保榆带领研究院的科研人员自筹经费开展的。曹保榆还带领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为首都军民研制并提供病毒防护口罩10多万件，新型防护面具、防护服等1万多件套；紧急研制生产高效杀菌消毒液50余吨……有人问：“你们投巨资研制市场需求不大的洗消产品，能收回投资吗？”曹保榆回答得十分肯定：“我们是面向战场，不是面向市场。为抗非典这样做，值得！”

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上将动情地称赞：“你们为首都军民防治非典立了大功！”曹保榆说：“身处非常之时，采取非常之策。在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全力以赴。”

（李雅清）



强卫 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十七届中央委员。1953年3月生，江苏无锡人。中国科大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工学硕士。

耿荣生： 科大令我终生难忘

“科大真是令我终生难忘”，谈及科大生活，耿荣生总会先说这句话。

耿荣生1961年入校，恰逢其时。马大猷、贝时璋、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柳大纲、赵九章、赵忠尧等一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亲自登台为学生授课。在他的印象里，这些泰斗级的名家无一例外地强调整理，不主张死记硬背和生搬硬套，他们更多的是教给学生们一些学习方法。

“大学时期是一个人人生态、世界观逐渐奠定的时期。”耿荣生对科大的教育满怀感激，“科大的校风——‘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影响了我后来几十年的人生。”他说，他这一辈子就是希望能踏踏实实为我们国家做点事儿，“这与科大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科大学习了很多歌曲，但今天唯一记住的，只有校歌。”而今已身为将军的他，走过了科研求索、从戎报国的半生，再回味起那令他热血沸腾的校歌，仍能哼唱出校歌的全部——因为，在他的心中，校歌《永恒的东风》是个无价之宝，从第一次学唱校歌时起，他的人生就已经和中国科大这所学校融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我后来的许多选择，就是按照校歌的号召来做的。”说这句话的时候，耿荣生肩上的金星熠熠生辉。

声学专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显示度与前沿学科远不在一个量级上，耿荣生一生从事超声无损检测研究和实践，数十年磨一剑。在空军装备研究院，耿荣生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依旧属于后续、辅助性研究范畴，他集中精力研究飞机疲劳损伤和裂纹等的无损检测和监测，“终于做出了一点成绩”——这里的“一点成绩”，指的是带起了空军系统无损检测学科的发展，是成为了国际无损检测委员会的中国委员（该委员会在每个国家仅有一名委员），是历经四年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项受到空军首长表彰的特别重大项目，为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效益……年逾花甲的耿荣生一如既往地奋战在无损检测学科的前沿领域，作为第十七届世界无损检测会议（首次由中国承办，于2008年8月在上海举办）主席，他希望能够无损检测领域的最高端会议上，见到更多科大毕业生的身影。

“人最怕的就是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耿荣生用实践阐述着自己总结出的这个道理，“急功近利最要不得，无论在哪个领域——科研也好，从政也好，经商也好，演艺也好，最重要的首先是做人。”耿荣生说，科大是学做人的好地方，科大学生要用心去感受科大，接受她润物细无声的人生观教育，做一个务实守信的人最重要。

（徐雁龙）



孟学农 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山西省省长。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1949年8月生，山东蓬莱人。中国科大管理科学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工商管理硕士。

邓中翰：我的中国“芯”



邓中翰，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1992年毕业于地球和空间科学系。第九届“五四青年奖章”得主。2005年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1999年，邓中翰应邀回国与国家信息产业部共同在北京中关村创建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2001年3月11日，中星微“星光一号”研发成功。

这是中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的数字多媒体芯片，它的研制成功结束了“中国硅谷”中关村无硅的历史。2001年5月，“星光一号”实现产业化。随后，“星光系列”芯片陆续问世，被三星、索尼、飞利浦、惠普、富士通、联想等国际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并成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主流市场的“中国芯”，从而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芯片的历史。

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在纳斯达克上市。在多媒体芯片领域突破7大核心技术类，申请超过500多项专利，中星微不仅是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芯片设计企业，更是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拥有完整自有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企业。邓中翰在纳斯达克闭市式上的签名，成为留在这个高技术公司云集的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个中文签名。

杨元庆：联想“少帅”



杨元庆，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1989年硕士毕业于计算机科学技术系。第三届“五四青年奖章”得主。

从中国科大校门走出来，到出任联想集团总裁兼CEO，这一步杨元庆走了12年。此后又用了3年时间，他出任联想集团董事长。

杨元庆1988年硕士毕业后，恰逢联想第一次大规模面向社会招收高层次人才，他被顺利录取。年轻的他与同样年轻的联想一同成长，1991年3月，联想把他推上了CAD部总经理的位子；1994年初，联想对内部组织结构做了重新调整，将原来很多部门分管的事集中到电脑事业部旗下，由杨元庆负责。

2001年4月，时年37岁的杨元庆正式出任联想集团总裁兼CEO，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帅”。2004年12月8日，出任联想集团董事长。

接手联想后，“时时刻刻都有危机感”的杨元庆很快决定专注于PC业务，并大手笔地收购了IBM PC业务，自此THINKPAD便被 he 收归囊中。“联想是地道的跨国公司！”杨元庆在很多场合都表示过联想走国际化路线的意图，从“Leg-*end*”到“Lenovo”，变的不仅是几个字母。不动声色地从竞争对手戴尔挖来多位高管，印度、美洲等新兴市场的需求，带动销量一路飘红，联想，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正在朝国际化路上一步步走去。

2004年，杨元庆评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词是：“杨元庆用迅驰的速度追逐奥林匹克，他高举全球品牌旗帜；用撑杆跳的高度携手蓝色巨人，他构建庞大电脑王国；国际领先的雄心让他与众不同；不仅仅善于联想，更善于积极行动。”

胡伟武：赤子情怀



胡伟武，龙芯CPU项目首席科学家。1991年毕业于计算机科学技术系。第七届“五四青年奖章”得主。

2001年，胡伟武出任龙芯CPU首席科学家，在中科院计算所李国杰所长和唐志敏研究员的领导下，率领几十名年轻骨干日夜奋战，2002年9月28日，中国第一枚通用CPU龙芯一号成功发布，终结了中国计算机产业“无芯”的尴尬历史。

在不到40人的“龙芯1号”研制群

体中，科大毕业生有近20人，在“龙芯1号”研制成功后，他们把第一台样机送到母校——中国科大，在学校网络中心运行测试。

对于导师夏培肃院士，胡伟武怀着深深的敬意，他用“恩重如山”来形容导师对他的培养之情。为纪念夏先生从事计算机事业50周年，他把“夏50”写在芯片的每一层铝里面。他说，以后年产100万片，就有100万个“夏50”。

在胡伟武那个空间不大、布置稍嫌简陋的办公室里，迎面墙上有一行用塑胶板做底的白底红字标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龙芯课题组”。他说，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习他不畏惧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学习他善于抓主要矛盾、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学习他永远为人民服务的立场。龙芯的根本出路是信息化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谋取利益，这是我们取胜的根本，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不学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刘庆峰：让计算机开口说话



刘庆峰，科大讯飞公司总裁。1995年毕业于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第十届“五四青年奖章”得主。

刘庆峰曾被《中国青年》杂志誉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IT青年”。他17岁考入中国科大，次年就被王仁华教授选入“人机语音通信实验室”，开始了中文语音合成技术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1995年他考取研究生并被导师王仁华教授推荐开始担任国家863项目“KD系列汉语文语转换系统”的主要负责人。1998年12月，在新加坡首届国际汉语口语处理研讨会上，刘庆峰等人研究成功的科大语音

合成系统，被一致认为代表了当今汉语语音合成技术的最高水平，刘庆峰获得了大会惟一的一篇最佳论文奖。1999年11月18日，国家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专家组对“KD系列汉语文语转换系统”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该系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在实用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1999年6月，刘庆峰带领一批科大优秀毕业生，充满激情地创办了安徽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讯飞语音技术不仅在中国大陆的近30个省份得到了推广应用，还成功地进入到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北美等市场，在电信、证券、银行、电力、教育等20多个行业获得了成功应用，并被奥运会组委会和863专家组共同确定为“面向奥运的多语言信息服务系统”中的语音技术提供单位。讯飞语音产品已占领了语音合成主流应用市场80%的份额，2003年被中国通信业第一大刊《通信世界》评为“中国通信业十大最具增长潜力企业”，彻底改变了1999年以前中文语音市场几乎全由国外IT巨头垄断的局面。

相里斌：做自己喜欢的事



相里斌，中科院西安分院院长。1990年毕业于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系。第十一届“五四青年奖章”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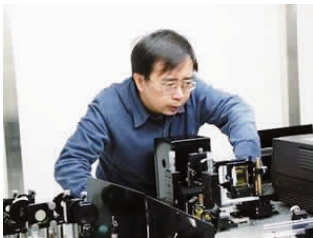
相里斌毕业之后就而潜心投入一个少有人关注的新领域，在他之前，国内对干涉型光谱成像技术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十余年来，他以自己不懈的坚持和投入，走在一条相对孤寂甚至是落寞的科研之路上。

经过长期默默无闻的钻研，相里斌的科研意义逐渐被领导和专家认可，也陆续得到了中科院院长基金、院重点项目和国家“863计划”等方面的支持，一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从他手中相继诞

生：独立提出了大孔径静态干涉光谱成像仪创新原理，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成为21世纪初光谱成像技术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在国内最早对“空间调制干涉光谱成像仪”开展研究，在理论和关键技术等环节取得多项突破，牵头研制的仪器成为“嫦娥一号”、“环境与灾害监测”卫星的有效载荷。他还率领团队对高稳定度的转镜式干涉光谱成像仪、计算层析光谱成像仪、偏振光谱成像仪等新型光谱成像技术进行研究。相里斌先后承担了国防科工委重点工程、国家“863”计划、“九五”国防科研、中科院创新性项目等各类国家重大、重点项目20余项，迅速成长为国家高技术863航天领域首席科学家，还担任“嫦娥一号”探月卫星有效载荷光学成像探测系统指挥，863可变焦遥感相机项目总指挥。

对于自己的成功，相里斌认为，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自己慎重选择好的事情就要坚持做到底，决不能轻易放弃。

潘建伟：六个世界首次



潘建伟，中国科大教授、博导。1995年近代物理系本硕毕业。2004年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2006年10月，潘建伟教授领导的小组成了首次在《自然·物理》杂志发表封面文章的中国科学家。在这项最新成果中，潘建伟和杨涛、张强等人首次实现两粒子复合系统量子态隐形传输，并在实验中实现了对六光子纠缠态的操纵。

这是潘建伟小组在量子通信领域内取得的第六个“世界首次”。在这之前，他于1997年至1998年，首次成功地实现了量子态隐形传送以及纠缠态交换；1999年至2000年，首次成功实现三光子、四光子纠缠态，并利用多粒子纠缠态首次成功地实现了G HZ定理的实验验证；2003年，首次成功地实现了自由量子态的隐形传送；2003年，首次实现纠缠态纯化以及量子中继器的成功实验；2004年，首次取得五粒子纠缠态的制备与操纵；2006年，首次实现两粒子复合系统量子态隐形传输，并在实验中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对六光子纠缠态的操纵。

近几年来，潘建伟和他的研究小组的多个“世界首次”让世界同行感到惊奇。2004年，当潘建伟、杨涛等人关于“五光子纠缠和终端开放的量子态隐形传输”的论文发表后，研究成果同时入选欧洲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的年度十大进展。

数一数潘建伟发表的论文，就可以从侧面证明他在该领域具有的核心竞争力：《自然》杂志8篇，《自然·物理》杂志（封面）1篇，《物理评论快报》27篇，均属于顶级的学术刊物。在短短几年里，一个人数不多的研究小组竟然能够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发表36篇论文，对于高水平论文稀缺的中国科学界来说，是极为罕见的。

郭为：“哭着喊着要学习”



郭为，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1988年硕士毕业于研究生院（北京），2002年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1988年，在联想集团近乎寒酸的办公室里，总裁柳传志质朴的话语打动了一个怀揣中国科大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年轻人，从此他开始了与联想血脉交融的人生，他就是郭为。自从联想一开创，郭为就作为第一批大学生，应聘进了联想。当时，联想也不过几十号人马，郭为就跟着“IT教父”柳传志开始闯江湖、跑码头了。

12年过去了，联想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变成了领导一个大公司的总裁。这12年正是联想迅速壮大的12年，而在这12年中，25岁到37岁的郭为像一个游击将军最后成为军团主帅。

即使在联想集团内部，郭为的成长史也是独一无二的：11年中他换了13个岗位，年仅28岁就进入最高管理层。柳传志把郭为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哭着喊着要学习”：只要有任何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他都会积极把握。比如担任财务部总经理时，郭为在对财务知识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通过组织课题组对财务体系与业务体系不匹配状况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联想沿用至今的“责任会计”概念。而后来成为联想最著名的宣传语“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亦是他在公关部经理任内的组织策划。



舒其望： 获 SIAM/ACM 计算科学与工程奖

舒其望 1982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数学系，同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1987 年在美国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任教，1996 年晋升为教授，1999 年至 2005 年任系主任，1999 年任中国科大长江学者讲座教授。1992 年，因在计算流体力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获美国宇航局贡献奖。1995 年获中科院冯康科学计算奖。他是计算数学领域国际著名期刊《计算数学》执行主编，《科学计算》主编，并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他的研究工作被国内外同行引用达 3000 多次。

舒其望教授开创了适用于对流占优偏微分方程的非线性稳定、高精度 TVD（有界变差不增）时间离散方法的研究。他也是非线性稳定 ENO（本质无振荡）和 WENO（加权本质无振荡）有限差分 and 有限体积方法的创立者之一，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求解激波问题，并能保持一致高阶。他同时还是间断伽辽金有限元方法的创立者之一，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对流占优偏微分方程。他与其布朗大学同事 David Gottlieb 合作，对于分段连续间断函数采用基于盖根保尔多项式的后处理进行谱逼近，这种谱方法在克服了吉布斯现象的同时获得一致谱精度。

2007 年，在美国加州哥斯达黎加举行的 SIAM 科学计算与工程大会上，舒其望教授因其在科学计算领域的杰出贡献，荣获 SIAM/ACM 计算科学与工程奖。该奖项是 2002 年由美国工业与数学应用协会和计算机学会共同创立，用于表彰在计算科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舒其望教授是第三位获得该项奖励的学者。

庄小威： 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

庄小威，13 岁进入苏州中学科大预备班，高考以 600 多分的成绩考入科大少年班。1991 年赴美留学，1997 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在斯坦福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先生进行博士后研究。

庄小威的研究是要探明生物体系中单个分子或单个粒子的运动表现。她创造性地将荧光光谱和显微分析技术应用于单个分子，这种崭新的物理手段，使得实时揭示复杂生物过程中的分子个体及其运动步骤成为可能。2001 年，庄小威被聘为哈佛大学助理教授。她的物理根底启发她将带荧光的分子标记物附在病毒上，当用激光照射时，标记物发射出特殊的彩色光。用这种方法，借助显微镜，她详实跟踪了单个病毒的行为，也跟踪了诸如蛋白质和核糖核酸片断这样的单个分子行为。她拍摄到单个流感病毒的连续影像，这是世界上首次记录到病毒的各阶段过程。凭借研究单个分子特性的杰出才能，她获得 2003 年度全美“麦克阿瑟天才奖”，是第一位获得这一荣誉的华人女科学家。

2004 年，美国著名的《科技评论》杂志从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中国、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 600 多位提名者中，评选出在纳米技术、电脑与通信及生物技术领域从事前沿技术研究的、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 100 名青年创新者，庄小威名列其中。

2005 年 3 月，为全美科学家提供资助的最负声望的非盈利研究机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会，从全美 300 多位提名人中选出了 43 位生命科学家，在未来 7 年中向每位提供 700 万元的研究资助。庄小威和另一位同样毕业于中国科大的旅美科学家骆利群榜上有名。

2006 年，庄小威获聘哈佛大学教授。在哈佛大学她的实验室团队的网页上，庄小威着无袖红色 T 恤衫，戴着墨镜眺望远方，极其舒展。朋友们这样说她：“在课题研究之外，庄小威其实是一个活泼的女性。”



张亚勤：微软全球副总裁

37 岁时，张亚勤由原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升任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至此，他成为继李开复之后进入微软核心层的又一位华人。

1978 年，张亚勤凭着天资和勤奋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科大少年班，是年他 12 岁，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少年大学生之一。本科毕业后，张亚勤考取了电子工程系的研究生。两年之后，也就是 1986 年，羽翼丰满的张亚勤硕士以 20 岁的年龄赴美深造，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电子工程博士。1997 年，年仅 31 岁的张亚勤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会士称号，成为该协会 100 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的最年轻的科学家。

郭元林：清华紫光总裁

1978 年，郭元林考入中国科大少年班。1983 年大学毕业后，他报考了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研究生，在清华硕士毕业后，留校当了两年的“教书匠”。在这期间，他参加了国家“八五”重点建设工程——清华 CIMS 工程中心的筹建，从事软件教学和 CIMS 工程中心的创建和科研。

1988 年，学电子出身的郭元林加入了初建的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担任分公司经理。他自嘲这个举动为“放弃专业，遁入商界”。郭元林当时主要投入《汽车自动检测系

邵中 15 岁考入少年班，1994 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应聘为美国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助教授，2000 年被提为副教授。2003 年 7 月取得耶鲁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正教授职位并出任系本科教学部主任，是计算机程序语言设计和实现领域国际权威，曾任 ACM SIGPLAN 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程序设计语言领域多种一流国际会议和期刊的评审委员会委员和编委。2005 年兼任中国科大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姚期智小组讲席教授及中华全国青联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陈长汶 1983 年毕业于中国科大，1992 年 10 月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电机及计算机工程系博士学位，现任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 Allen Henry 讲座教授、无线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计算机视觉及医学图像分析、图像视频信号编码与通讯、无线通信与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出版专著两部，发表 SCI 论文 50 篇，申请美国等国家专利 6 项。2007 年 12 月受聘为我校大师讲席教授。

张树新 1983 年考入中国科大化学系，是校史上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女学生会主席。被称为“中国信息行业的开拓者”，她于 1995 年 5 月创建了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总裁。瀛海威是国内最早提出应在国际互联网络上提供中文信息的网络服务公司；也是最先提供 ISP 业务的网络商之一。1998 年，创办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1999 年底，创办联和运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1999 年，张亚勤回到中国，加盟当时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出任副院长兼首席科学家，致力于数据压缩、视频、多媒体及 Internet 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微软中国研究院于 2001 年 11 月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基础科研机构。该机构目前汇集了国内外 170 位优秀的科研人员，在世界权威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论文 700 余篇，有 70 多项技术转移到微软的核心产品中。

目前，亚洲研究院已发展成为微软全球四大研究院之一，在数字影像和视频技术、多媒体通讯等方面成果显著。“创建世界一流的研究院”是他当初的愿望和今天的成果。

统》的研发、产品化和营销。该产品最高曾占据全国 40% 的市场，直到现在仍是紫光利润的最大来源之一。1993 年，他被调入总公司任副总经理，主管了两年证券和期货投资。1994 年总公司改制为清华紫光集团，郭元林任副总裁、总工程师，主管产业投资规划和资产重组业务。2004 年，出任清华紫光集团总裁。

郭元林是中国科大校友新创基金执行委员会委员、财务总监，中国科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2008 年 1 月起，郭元林担任中国科大北京校友会法定代表人。

卢征天： 骄傲始于少年

2000 年，美国青年科学家工程师总统奖和美国能源部青年科学家与工程师奖获得者一公布，美国华裔人士格外兴奋，获得双重殊荣者，是在阿贡国家实验室从事研究的华裔学者卢征天博士！

而 2000 年 2 月 2 日，中国《科技日报》报道的“美开发出探测单个原子新技术—可用于太阳中微子、地球环境及医学等领域的研究”正是卢征天带领小组攻研的“原子陷阱追踪分析法”（ATTA）。

1999 年至 2000 年间，位于芝加哥西郊的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的这项科技新成就“原子陷阱追踪分析法”，正式公布于世，这项成果正是卢征天和他的研究小组获得的。最早披露这条消息的是 1999 年 11 月 5 日的《科学》。其后，2000 年 1 月 24 日出版的“Argonne News”（阿贡新闻）发出了头条新闻。该文较为详细介绍了阿贡实验室从事此项研究的研究组及其试验发现过程，还披露了攻克此项研究项目的小组成员，卢征天名字也显现出来。2000 年 2 月出版的《今日物理学》，刊登了卢征天博士等人有关此项研究论著。全美化学学会主办的《化学分析》2000 年 2 月 1 日以专文介绍卢征天和他的研究小组此项成就。《光学光谱技术世界》2000 年 3 月一期，图文并茂地介绍此项科技新成就。2001 年 2 月 4 日，卢征天住地的英文报 The Naperville Sun 头版刊登卢征天的大幅工作照片，并以“Superman”（超人）为题发表专题报导。

卢征天少年早慧。1982 年，14 岁的他考进了中国科大少年班，1987 年通过考试去美国留学。除了获得上述荣誉外，他到美国后还摘了许多“金苹果”，包括科罗拉多大学博士后、2000 年美国能源部青年科学家与工程师奖、美国物理学会会员、美国科学学会会员等等。

江平： 华尔街投资大王

在 2007 年美国专业杂志《交易员》月刊评选中以 1 亿—1.5 亿美元之间的年收入跻身“百位顶尖交易者”的行列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位华裔的名字，他就是年仅 43 岁的美国赛克资本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江平。

1981 年，江平以扬州地区高考状元身份进入中国科大化学系读书。1989 年，他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以后改学金融，由此踏上金融行业。

2005 年 3 月，江平加盟赛克公司，投资七国集团的外汇、指数、拉美外汇、债券和欧洲信贷。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留美基金经理，江平一直关注祖国的经济发展。2001 年，他对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公司股票被严重低估。江平投资中国石油的时间，比巴菲特都要早。当时，中国股市持续熊市，投资者怨声连连。江平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已经来临”。当时，许多优质股票市盈率不到 10 倍，而盈利每年都增长两到三成。银行利率不到 2%，巨额存款有可能转入股市，大量外资为炒作人民币升值也通过种种渠道流入中国。结果，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

最近，江平正在打算跟赛克公司主席科亨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投资者，成立一支新型基金，在最具投资价值的国家，挑选具有长期高回报的股票、债券、货币及期货，既做多，也做空，适度利用杠杆作用，也利用金融衍生品进行对冲。



东区老北门



科大有更气派亮丽的大门，可这座老北门，永远有最特殊的意义。

对这座校门产生感情一定不仅是一代人的故事。逆境图存的日子里，校门就是一种图腾，一种希望，给人以坚强的意志，和同舟共济的力量，还有能抚平创伤的亲切。

就像门旁这株已经和校门融为一体的紫藤。偶尔，你在旁边徜徉的时候，一串串紫色的花会触到你的脸颊，微风起来，翠绿的叶子卷动紫色的花儿，撒来薄薄的清香……

年轮在一圈一圈增长，现在已很少能见到她开满紫色的小花了。她已过了释放烂漫的年少时代，变得更加深沉。她的根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地上，枝叶更加繁茂，藤儿虬劲有力，生命力越发顽强……



首任校长郭秉钧先生

穿行于科大幽静的校园，你会发现东、西校区散落安放许多尊人物塑像。无论是在匆匆奔向图书馆、教室、实验室的路上抑或是在悠然漫步的途中，总会在不经意间与某位大师邂逅，他们深邃的眼睛无一例外地闪烁着睿智的目光，透着长者的宽厚与慈爱。

正因为那些眼神，这一座座冰冷的铜像蓦然变得温暖了，这是属于科大的气质，不在这里生活几年，你无法知道，那些眼神和表情如何地融化了整个学校和每个人。

大师雕像



第二任校长严济慈先生



钱学森先生



华罗庚先生



郭永怀先生



赵忠尧先生



钱临照先生



杨振宁先生



一鉴亭



初识一鉴亭,大约很难有人为之动容。印象中,许多校园都有那么一个小亭子,用作静静的点缀。一鉴亭,怕也如此普通吧。

后来知道《中国科大报》的“一鉴亭副刊”便是由此而来。在这个最优美、最有艺术亲和力的栏目中,很多人会经常提到这个小亭子。从其“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名字由来,到她娟秀飘逸和亭亭玉立的外形,再到亭下清水出芙蓉,一切都变得那么雅致和有灵性,让人感知着畅快、清澈和活泼,甚至催生一种渴望——细细地向她询问不曾了解的科大往事。

你于是想,一鉴亭,一定是有智慧的。

“孺子牛”雕塑



78级学生毕业那年,集体捐款,给学校送了件礼物——孺子牛雕塑。宽厚的基座上,两头初生牛犊肩峰突出、背向奋蹄,仿佛要扭转背负的偌大地球。

据说,它原来的名字叫“扭转乾坤”,后来有人觉得名字取得过于张扬,和科大的风格不太契合,于是改作默默耕耘的“孺子牛”。名字改了,雕塑透出的那股精气神却没变。她因而成为80年代科大人的精神图腾——科大人将骨子里的追求卓越、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通过一个昂扬的雕塑进行了一次含蓄的抒发。

校风纪念碑



精神的东西,是铭刻在心,流淌在血液里的,并非一两块碑石可以铸就。采访过很多校友,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或者记得这块石碑,可每个人都能脱口而出这碑上的字——“勤奋学习,红专并进”。

“那是郭老的亲笔题词!”老校友们都很自豪地说:“背面的校歌《永恒的东风》也是郭老填词的,周总理都亲自修改过歌词!”

大家都以此为荣。听说校风碑上的字要在校庆的时候重新描金,那个时候该会更加焕发光彩了吧!

天使路



最初叫她“天使路”的是谁?已经无从查考。不过,他(她)一定很年轻、很风趣,就像阳光透过浓密的梧桐,碎金般跳跃在脸上。

不胫而走。连外地的中小學生都慕名而来,叽叽喳喳地穿行在天使路上。

夏秋之交,枝叶交蔽的法国梧桐上,成群的鸟儿鸟压压地飞过,那种阵势让人惊讶,你想象不出它们是怎样地热爱这片树林。

于是,“晨昏喧鸟雀”成为校园一景;于是,人们习惯了在褚黄的喧嚣中蒸腾出紫色的静谧。

如此别样可爱的景致,你甚至对她有些畏惧——从鸟雀嬉闹的天使路上走过,猜想一定会有“天使”轻轻滑落在你的肩头。

艺术中心



校园最浪漫的地方怕就是这儿了。

沉睡了整整一个银白色的冬天,腊梅花抖撒着精神,把初春的温润鲜艳地绽开。花坛里,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小花,也如梦初醒,次第开放。

干枯的紫藤吐出了热情的叶子。无需几日,大串的藤萝花就会挂满屋顶,大片的紫就会从屋顶泻到地面……

这几间白色的小房子从不寂寞。“同样的位置上,有大师的杰作亦有学生的涂鸦,有精美的相片亦有简单的漫画,而如今竟也能挂上我粗陋的作品。”一个女孩这样说:它的浪漫,还因为“宽容”。



师生同乐

1961年5月1日，学校召开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校长郭沫若与党委书记郁文以及副校长华罗庚席地而坐，与同学们一起观看学生文艺演出（右图）。副校长严济慈与同学翩翩起舞，让大家倍感亲切（左图）。



郭老和同学们一起用餐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在大操场迎面见到郭老，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后，就和我们一起席地而坐，交谈起来。到了吃饭时间，又和我们一起去食堂同桌用餐。当时，食堂条件较差，没有凳子坐。郭老已是近70岁的老人，我们到厨房找了一张凳子请他坐下，却遭到了他的拒绝。此前，郭老在学生食堂常常和大家一样，站着用餐。

(1958级 卞祖和)



1960年，学校的教学大楼盖得差不多了，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并供学生实习的机械厂也已成立，但没有翻砂车间。正好在机械厂附近、学校西门卫生所的北边有一块空地，学校决定在这里建造一个翻砂车间。

当时，同学们每学期都要参加十天劳动，大部分人到农村，少部分留在学校。机械厂厂长张立秉就组织同学利用劳动时间盖翻砂车间。只有一两个泥瓦师傅作指导，从平整土地到建造车间，几乎所有的活全是同学们自己干的。

这个翻砂车间起了很大作用，有很多设备的基座就是在这里做出来的，不少同学就是在这里进行车、铣、刨、磨、焊、翻砂、热处理等实习的。我一直保留着当年在这里亲手做的一把榔头，最近将它赠给校史馆。

(1958级 黄吉虎)

一枚纪念章



我在整理旧物时，总不忘将中国科大留下的东西小心存放。几十年来，搬家时丢失了不少，然而有几样科大的东西一直保存至今。除了科大民乐队乐谱、同学的照片以及一枚纪念封外，还有两样“古董”值得一提。

我是1958级学生，是科大首届毕业生，学校特地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枚“中国科大毕业纪念”章。

纪念章是谁设计的，我不知道，但整个图案简洁明了——翻开的书本，是读书的标志，任何时候，科大始终坚持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在那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并非所有高校都能做到这点；三面红旗，表明了科大诞生的时代；火箭，说明了科大要培养的是尖端科技人才。

这枚纪念章至少应该有一千多枚，但1988年科大建校30周年之际，当我佩戴它在合肥的科大校园参加庆祝活动时，还是引来了许多人的好奇——怎么有人戴了这么个粗里粗气的徽章，还颇显得意状，直到有同届校友感叹：“我也有的，但不知在哪里了。”大家才知道这是“科大的古董”。我把纪念章翻过来给大家看，背面“58-63”的字样清晰可见，这可是科大第一个五年哪。

(1958级 薛啸宙)



自动化系同学在作自寻优调节器的练习



学生在搬运沙土和砌墙

六姐妹小组

看到寄来的校刊《中国科大报》第582期上“寻找老同学”栏目的照片时，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那是我和我同学的合影，当年我们被称为六姐妹小组，照片从左至右依次是：赵绍荣、郑敏华、来芒、宋美珍、林璇、侯书英。

看到这张照片后，我、宋美珍、郑敏华、侯书英互通了电话，个个兴奋得很，回想起我们的大学时光。当年我们是先进小组，校领导还和我们一起座谈过，但却想不起来我们为什么先进了，只记得当时入校不久，大家来自不同省市，相互照顾，团结好，还利用休息时间做好事，在大姐赵绍荣的带领下，我们严格要求自己，追求进步，在学习上刻苦努力，相互帮助，成绩都很好。很不幸的是赵绍

荣大姐已过世十余年了，更遗憾的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我调回北京后才知道的。

现在我们都已退休，但我们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和训练的思维方法，兢兢业业为国家工作了一辈子，应该说都干得不错，我们没有给科大丢脸。

(1958级 来芒)





在天安门前接受检阅



1961年9月，中国科大成立了一个由885名学生民兵组成的无后座力炮方队，准备训练后参加国庆节的检阅。在指挥员的训练下，我们每天下午下课之后开始队列行进和抬炮演练：无后座力炮前面有二个支架，站两个人；后面一个支架，站一个人。从起炮，行进、整步走、行进、落炮顺序一一练习。训练虽然辛苦，但同学们依然是热情洋溢、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10月1日凌晨三四点钟，科大民兵方阵的学生就起身了，大家上着白衬衫、下穿蓝色裤，肩上披个蓝色肩垫，人人都为能参加国庆节检阅而欢欣鼓舞。

上午十点，在“歌唱祖国”雄壮的乐曲声中，游

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在工人、农民、学生的队伍过后，步伐整齐、威武雄壮的一个个民兵方阵队伍在鲜红底色衬托下金黄色“首都民兵师”亮丽大旗引导下，进入天安门前的大道上。我们科大无后座力炮民兵方阵到达检阅视野，只见油黑锃亮的一个个炮管高昂着炮口；科大学生民兵到达天安门右侧，过了华表不远处，随着领队一声令下：向右看！大家齐刷刷地将头向右转，对天安门城楼上注目礼，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检阅。

(1959级 钱士鹤)



1960年夏天，力学系学生火箭研制小组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山地，做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恢复高考后的1977级学生入学时受到了科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学习之余，同学们拉起手风琴，享受青春的快乐。



1978年，同学们在上实验课

1977年，中断了12年的全国高考制度恢复，考上大学的同学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图为1980年我校眼镜湖边苦读的学子们。



1980年，师生看外语电影，收听外语广播



1980年，同学们在学习交流



我们班

50年前，18岁的我，离别了父母，带着对大学生活的无限憧憬，踏进了中国科大的校园。5年的科大岁月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在我们这个集体中发生的事，也许在如今的大学中难以找到了。军事化的集体：刚进校门，到处是身着黄色军装的工作人员，那是部队退伍转业到学校的干部。学校以军事化的方式要求我们，每天

科大数学系最突出的就是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三条龙，他们自成体系，各具特色，正可谓三条巨龙飞舞，一派兴旺景象——58、61、64级是“华龙”，59、62、65级是“关龙”，60、63级是“吴龙”。

我们的老师是关肇直先生。关先生早年留法，当时是数学所的负责人之一，还兼任科大数学系的高等数学教研室主任。关先生工作十分繁忙，但仍把他最主要的精力放在了59级的教学上。整整三年半的基础课，他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课，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当然，在“一条龙”的教学法中，很难由一个人全部承担，幸好当时是“所系结合”，因而有可能在统一筹划之下，分头来教。很多院士当年都为我们讲过课，例如，丁夏畦院士第一学期是我们的习题课主讲，林群院士是我们的广义函数主讲等。关先生还请来张宗遂先生（当时的数学所一级教授）给我们讲四大力学，其中量子力学后来由他的学生戴元本院士讲完。我们59级的物理课一直上到量子力学，有的专业还上了量子场论。这是关先生的一个想法，他想培养数学、物理功底都很

听越民义先生讲课

科大功课以重、紧、深著名。我们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属于理工结合、物理与化学交叉的学科，除数理化外，还有化工原理、化工自动化、原子物理、核物理、辐射计量学、机械制图、电工电子学、和仪器仪表等基础课程。同学们都加倍努力读书，即使在大炼钢铁的年代，科大仍坚持不懈用较多的时间上课，其它高校则多数停课几个月

深的人才。

关先生上课，思路清晰，板书工整且速度快。当时上课时都没有教材，教材大多是在讲完课以后才发的油印讲义。但这样也有好处，练就了我们记笔记的本领。常常是记下来再说，课后再慢慢地啃，把它搞懂。关先生的博学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上面已提到，三年半的基础课，从微积分到亚纯函数，从线性代数到群表示论，从黎曼几何到泛函分析，大部分由关先生一人主讲，可以说在国内外也是少见的。而且，关先生十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上课从不迟到，也不拖堂，有时还带病上课，从来没听到过他训斥学生。相反，在课堂上，经常鼓励学生树立信心，不要怕一时学不好，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果。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他那么辛苦，课间休息时，都不忍去打搅，但有时他会主动找学生了解学习情况。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亲眼看见他只啃一点面包干当饭吃，在生活方面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

现在看来，关先生的一套基础课教学模式，应该说是成功的。我们数学系59级出了一位院士和大批的博导、教授……这些同学，不管以后分到什么专业，

都要晨操，排队并唱着歌走进临时食堂、站着吃饭。各班组比赛出操速度，我们女同学都用皮筋把头发扎好了，以便早上起床后不用梳头就跑向操场。宿舍里简洁、整齐，从未见过有同学把臭袜子、脏衣服乱塞乱丢，谁的被子脏了就会被女同学抢去洗了。周末的生活会大多是批评，检查自己的不是，哪怕一点点也不放过。周日晚的排长点名，是人人必到的。我们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从早到晚都干劲十足，精神面貌确实不一样，带着这样的劲头，哪有学不好的理由呢？

团结互助的集体：我们虽然是从全国各地招来的高分生，但进入大学后也有一段时间适应不了。当时还有一批工农速成中专来的同学，年龄比我们大，底子薄，要他们和大家一起学习，难度很大。我们便分成好几个互助组，甚至一帮一，一起复习、做习题，理解力强的做小老师，课后走上讲台给互助组的同学讲课。韩哲文就是从那时起，经常上台讲课而有了“教授”这个外号的。现在他成了真正的教授了，那时的基本功或许为他日后的教学工作发挥过作用。

1959年春，我在一次跳马训练中扭伤了右膝，不能行走，无法上课。全组同学便分工帮我抄笔记，到宿舍帮我补习，考试时背我去教室。一次考制图，佟振合同学（现为中科院院士）把我从四楼宿舍背下来，又背到五楼制图教室。在这样的集体中，我的学习动力很大，记得腿伤以后的各门课我都是5分，哪怕是回上海家中休养后回校补考也是如此。至今想起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艰苦而有活力的集体：大学期间正值国家的“困难时期”，从59年底到62年，供应十分紧张，我们以班为单位分到了学校的空地，种了茄子、萝卜、花生，还有蓖麻籽。我们轮流施肥浇水，工具就是我们的脸盆和脚盆。那时为了肚子，一点儿都不怕脏，等到收获了，有的男同学摘了茄子就咬，我和晓淮一看，说我们也吃吧，但咬一口，怎么跟棉花团似的，实在不好吃。后来送到食堂求师傅在蒸窝头时帮我们蒸一下，加点盐，这就是大家的美味佳肴了。萝卜吃了后，叶子也舍不得丢，晒干后让北京同学从家中带点盐来腌起来，放在宿舍中解馋。我还记得当时吃萝卜叶子的滋味，一点不比现在的蜜饯差。我们这一代人吃了很多苦，不怕苦的精神伴随了我们一生，这也许是现代青年最缺乏的吧。

(1958级 吴平平)

三龙飞舞

但三年半的基础课底子是关键先生打下的。我们一位同窗，在校庆40周年返校，在系里讲话时曾说，我们59级的教学质量可与任何一所大学相比！

数学系三条龙各成体系，其中也有交流。比如，我们领到过华先生的一些讲义，如矩阵论等。华龙的特色十分鲜明，居高临下，少而精。吴龙的特色是创新意识很强。当时，三条巨龙共舞，何等热闹，何等气魄。再加上“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从数学所调来学校任教的龚昇教授、石钟慈院士、陈希儒院士以及曾肯成、殷涌泉等一批精英的倾力合作，还有从全国各名牌大学来的一批青年教师的无私奉献，全校的数学教学，真可谓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用一句现代时髦的话来说，那就是“创新”。

(1959级 朱国城 冯玉瑜)

加上浓厚的贵州口音，我们都听不大懂，那些从速成中学来的调干生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可忙坏了辅导的史济怀老师，每天晚上都在自修教室内陪我们复习功课。期末考试原定两小时，但直到吃中午饭，仍无一人交卷，老师只好宣布先吃饭再继续考。大家到了食堂，都静悄悄地闷头吃饭，谁也不交头接耳，饭后原路返回教室继续答卷子。记得我是第二或第三个完成交卷的，但也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在老师的催促下，晚上7点多才把所有的卷子收齐。事后听说，北大教授看过试卷都一致说太难了。

(1958级 刘清亮)

学校发我“浮肿豆”

当我们满怀激情参加“跑到莫斯科、跳过珠穆朗玛峰”的累计长跑、跳高活动时，困难时期已悄悄到来了，而我们却还全然不知。我感到体力不支，多次告诉体育委员跑不动了，得到的回答总是“胜利就在前头！”于是，我反复告诫自己，要向工农子弟兵学习，克服自己身上的“骄、娇”二气，强打起精神继续参加这项体育活动。

这时，学校举行运动会，我参加了女子4×100米接力赛跑。我从平平手中接过接力棒时，我们队排在第二，我一心想猛追过去，撒腿就跑，大约跑了一半，忽然晕倒在跑道上，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才知道，在同学们为我采取急救措施时，阿菊机智地捡起被我摔在跑道上的接力棒，使比赛继续进行下去。结果我们队的成绩倒数第一，可运动会的领导却为这种“前赴后继”的精神，给了我们不少鼓励。50年过去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励我不断向前。

困难时期，学校为了使生度过难关，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减轻学业负担、减少体育活动等等。而我们心里想的是国家遇到了困难，要为国家排忧解难，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绝对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击倒。尽管我们走出食堂时比走进食堂更感到饥饿，但在减少粮食定量时，没有一个不自愿的。

由于我出生时环境恶劣，先天不足，经受困难的能力可能比同学们差些，体重从100多斤下降到82斤，停经两年多，感冒不断，还常常发低烧。一次，学校给同学们检查浮肿，我是较重的一个，学校于是发给我“浮肿豆”，我将它分给同宿舍的同学一起吃，但她们都不肯要。其实，同学们的健康状况也差不多，她们对我格外照顾，都舍不得吃。一天，在大家都外出上课时，“浮肿豆”被盗了，大家为此惋惜了很久。但我们没有兴师动众地去“破案”。大家说，就算这些“浮肿豆”给我们更需要的人吃了。

有一次，我感冒了很久，浑身没力气，躺在床上不想动，连食堂也懒得去，这把映华和锦琛等同学急坏了，锦琛从家里拿来了酱油和醋，她们把从食堂买来的窝窝头捣碎，用酱油和醋拌了给我吃，这味道我终生难忘，比现在吃鲍鱼、鱼翅还香。

这些往事，虽然很小，但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当时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当时，新中国正承受着天灾、人祸的磨难，而我们这些天真烂漫、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却在困难和磨难中迅速成长。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为国家排忧解难的精神风貌，以及同学之间的手足情谊，这一切为我们后来漫长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年过花甲的我们，只要提起“科大”，总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科大”这个亲切的名字代表了属于我们的、难忘的年代和无悔的青春。

(1958级 後晓淮)



雨过天晴的科大文化

我差不多是与 77 级同学一起迈入科大的。

那个年月的学生有点像二战后哈佛、剑桥的新生，各个年龄层的都有。以地化班为例，有近 25 岁的“老学生”，有非少年班的“小学生”；有应届高中毕业的，有老三届的，有当过高中物理教员的，有开拖拉机的，有只敢考安师大却喜从天降落入科大的；有的老成如夫子，如赵俊琳、唐明，有的天真可爱如金童玉女，如周天群和小苗子。

77-79 级的才华是不是比今天的科大学生强呢？其实未必，但那实在是经过“德才”的筛子一层层筛选出来的。试想，在十年史无前例的“文革”中，能够坚持读书，并在高考中名列前茅，那需要怎样的信念和意志？因此，这批人特别顽强，特别自信，特别努力。吃饭排队时，总是一手拿着碗筷，一手拿着英语单词本，目中无人，口中念念有词。打好饭菜便走上现在的“天使路”，一边吃饭，一边听广播里的英语九百句。幸好当时天使路上没有鸟，否则“天使”下凡就要大煞风景了。

说起自信，那年月各省的高考状元可没有今天风光，在科大一抓就是一把。“我们科大”是大伙儿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北大、清华也不在话下，底气很足。原因不仅是高考分数高，而且大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科大人也”的豪迈。为此，自修室里日光灯夜夜长明，每天只睡 4、5 个小时的大有人在。

不过，他们自信却不轻狂。记得带那几届同学野外实习时，每次乘车，大客车的前排座位总是空的，等老师上来坐。上课很少有人旷课、迟到。当然并不绝对，老师的课讲得不好，学生也会“罢课”的。他们自学的本事很大，不上课，照样考高分。那时候“怪人”也不少，有的不挪窝，除了上课就在宿舍里，盘腿坐在椅子上读书，谁进来都搭上一句，成绩照样名列前茅，令人叹服。

那年月的学生饱尝“文革”十年无书读的痛苦，因此对改革开放有着深厚的情感，对振兴中华有着强烈的“舍我其谁”的责任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环境，学术报告会几乎场场爆满。在学术报告厅，平等的学术讨论显示出十分自由的

空气，本科生向权威提问甚至挑战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位天体物理的权威在做“灵魂不死与信息革命”的报告时，便遭遇了连珠炮式的发问，尽管报告中掌声不断。还有一次，世界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来做报告，一位本科二年级学生用结结巴巴的英语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个大胆的学生叫宋晓东，后来做出了当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之一的成果。

敢于提问，不怕提幼稚可笑的问题，是今天我对学生的要求，这源于我对当年“提问”认识的长进。77 级地化班有位学生上课时最爱提问题，当时我对他的评价是：总爱提不是问题的问题。因此，我请同学们不仅要敢于提问，还要善于提问。后来事实证明我错了，这个同学毕业后事业很成功，他成功的秘诀也许就是“爱问”，不惜问低级可笑的问题。

琐忆当年，一句话评论：那是雨过天晴的科大文化，虽然各方面的条件比现在差多了，但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科大精神却呼之欲出。

(孙立广 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曾为科大人 我心中充满自豪

对学习非常严格，谁要是不尽全力，肯定会被毫不留情地批评。

科大还总是让最好的老师上基础课，先后曾在科大直接承担教学工作的两院院士就有 130 多位。所以，当一个科大人真的很幸运，本科生起就能接触到名师名家，既学知识又学做人。而且，学校总是给学生提供最好的实验条件。本科生大二、大三就到实验室参加研究工作，因此，科大本科生的实验能力比起许多学校的研究生来都不遑多让。

校领导很有人情味。记得当年安装暖气时，先给学生宿舍装，教工宿舍却没有安装。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意见，学生对学校有任何不满，都可以直接向校领导提，不必担心“枪打出头鸟”，更不用怕“秋后算帐”。这种宽松、自由激发了科大人的创造力，也培养了科大人崇尚自由、

超然物外的气质。

科大人在学术上求新求尖，对生活细节却不甚注重，校园里很少见到时髦的红男绿女，所以外人有时会笑话“科大人真土气”，可是我们都不在乎。大家生活上不攀比，把时间精力用到学习上，对于各自的家庭来说经济压力也比较小。

科大是 1970 年从北京迁到合肥的，从此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少了许多热闹和关注。合肥是一个安静朴实的小城，科大也是一所安静朴实的学校，不浮躁不跟风，脚踏实地，奋发向上。在这个纷繁扰攘的世界上，质朴是一种越来越越罕有的气质。而科大的质朴又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那种。这是一所传奇的独特大学，她还在继续演绎着传奇。

曾为科大人，我心中充满自豪。

(1984 级 蒋继宁)

戏说科大“杀手”

如果一个学校没几个“杀手”，断然没有资格叫名校。既然叫杀手，可想而知学生有多痛恨这些“变态”教授，然而毕业之后却发现，我们很感激那些“冷血残酷”的杀手。

科大建校第一天就无愧于名校之称，因为那一批名震江湖的杀手！头号杀手当然是钱学森。据黄吉虎回忆，当年钱先生亲授《星际航行概论》，期末考试考了一天，全班两人及格，四人被担架抬出场外。50 年过去了，当年惨烈仍不难想象。

当然，大师中的杀手非唯钱学森一人而已，以黄吉虎之冰雪聪明，回忆从前还是叫苦连天，抱怨这些人都是一个样。黄吉虎当年中箭倒在黄茂光的《高等数学》下，混了个 59 分。小黄至今还抱怨老黄：“一分都不肯多给我啊！”

据说华罗庚也不是好缠的主儿。范植华回忆华老，学生问问题，华老常疾言厉色，训道：“这种问题，不要拿来问我！”显然，“大牛”个个很拽，学生听不懂只

能找块豆腐撞死。

余生也晚，学校“四大名捕”，一个都没有碰到。印象中，“郭一刀”是电教教电子电路的郭立；李百浩好像教计算数学，江湖人称“李十刀”。李十刀名震东西两区，腰斩无数武林豪杰。新生一进校，老生口口相传中，李百浩是必谈内容，大概意思是你碰到李百浩，就可以找根面条自己了断了。《十年夜雨》记录了李百浩家传绝学，所谓“迎风一刀斩”，说的是考试完了，老李先数 18 份最差的卷子，说，你们不及格了。因此，李百浩又称“李十八”。

数学系那些教授，看家本领是期中关一堆人，期末通通放行。我的数学分析、线性代数、抽象代数、常微分方程期中都是 60 或者 65。仇家当然记得，是徐森林、宋光天、林秀鼎和蒋继发。

老宋是个球迷，上课每以足球为例。时甲 A 联赛刚开始，有一次期中之后，老宋高声曰：期中考试，意味着一个赛季

的结束。你们考不及格的同学，如果踢不了甲 A，可以踢甲 B，去学简明线性代数。照此看来，我即使不用转会，也不过是留在甲 A 的板凳球员而已。老宋还有一招是虚张声势。记得那年期末我们五天要考五门，老宋坚持期中考试之前有两道题，大家一定要复习，事实上一道也没有，我琢磨期中之内容，好生辛苦。最可恨的是老兄讲课的时候过于陶醉那些前面的纯理论，结果很多人以为后面的计算没讲过就会不考。考试卷子下来，全傻了眼，真亏。

林秀鼎是华罗庚的学生，但听他讲授数学系的《近似代数》，简直是“灾难”。老林有很多名言，可惜年代久远都忘了。比如他对 94 级说“对待考试，要像过节一样。”我想过节也分旧社会和新社会，旧社会过节，还分地主和农民呢。给学生考试，老林肯定就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快活；反正他的考试，我始终抱着杨白劳过年的心情。

(1995 级 刘志峰)

为西区挖塘的日子



1986 年 9 月 20 日，学校举行新校区（西区）奠基仪式

或许是学校有意栽培，我们 87 级赶上了很多事，这一年又安排我们劳动 10 余天，任务就是清除现在西区中心水塘的淤泥。我们得到了一张施工图，水塘被各系瓜分，大致与各班人数成比例。那是一片油黑的淤泥地，散发着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

出乎所有老师和工人們的意料，我们这些被称为天之骄子、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毫不犹豫地踏进了那片淤泥地。滑腻的淤泥沿着球鞋的边沿向两边分开，黑色的泥浆逐渐漫过脚背浸入鞋中。走一步，呱呱一下，弄不好球鞋就被淤泥吸住。没有思想准备的，或是穿着不适宜劳动的，就主动担负起运输。两个人，一根竹杠，一个筐或是麻袋，抬起来就走。

女生被安排在宣传小组，她们领男生的情，却并不袖手旁观，也尽力用细腻的小手攥住粗大的铁锹，一点一点地帮助挖泥。没有人对分工表示意见，大家都充满激情，生怕被别人剥夺了劳动权力。没人对淤泥皱一下眉，无论是教授子弟还是农家孩子。

那几天，整个西区都弥漫着淤泥的味道。回到宿舍便把鞋袜脱在门外，每个门前都有一排粘满了淤泥的鞋子，那真是一道很有趣的风景。在这种味道中，我们睡得照样很香甜。睡梦中，我们想象着清澈的塘水，曲折的小桥和童话般的小亭子，也许还会有一块石碑，记载着某年某月某日 87 级全体同学清淤纪念吧。

几天过去了，当每个同学都倾全力投入这场劳动，系与系之间的竞赛达到白热化的关键时刻，负责监工的班主任首先发难了。他们向领导们反应这种工作实在太为难学子们了。于是我们奉命撤出了池心阵地，来到重新划分的岸边相对干燥的地方。

离开了富有表现力的舞台，同学们的积极性低落了一阵。不久积极性就被另一种竞赛调动起来。由于运输距离短，刚铲进箩筐没走几步就要倾倒，我们班便率先采用“空运”的方法。那可不是件轻松的活，是英雄是狗熊，转眼立判。其操作方法是：背对目的地，铲一锹半干不湿的泥土，不多不少，弯腰弓步扭身，突然发力，全力将锹向背后抡去。由于惯性，泥土就会划着美丽的弧线向后面飞去。

铁锹翻飞，泥土带着呼啸飞驰，落地铿锵有声，再加上小伙子们憋足气发出的“哎嘿！”声，你会明白什么叫阳刚之美，会感到一种豪迈之情！很多老师看到我们班的工作，都由衷地感慨：“年轻啊，真好！”毫不谦虚地告诉大家，俺那时的空运水平最高，出锹角度拿捏恰当，速度快，运输距离最远，一般在 20 米以外，除非泥块散了。

水塘里有泥鳅、黄鳝、虾子和螃蟹等小动物。前两者淤泥里多，后两者岸边多。来到岸边后，腰腹力量不足的就将注意力转到小动物身上。一会是黄鳝，一会是虾子，不时在工地上引起骚动。有一位毛头小子，看见一锹出来个长家伙，以为是黄鳝，伸手便捉。哪知那家伙不乐意，奋起抗暴，狠狠咬了他一口。原来是条蛇！大家把这个倒霉蛋送到了医院，医院说是水蛇，没关系，为慎重起见，观察几天。那条蛇被送到生物系脱脂后制成标本，留给那人作纪念了，据说他经常拿出那张蛇皮向大家哭诉苦难的岁月。

(1987 级 亭芬)



占座与打通宵

1980年代,以科大新生的高考成绩,可以随便挑选国内任何一所高校,因此每一年级的学生都是强手如林。

从大一开始,大家的学习就非常紧张。除了课堂学习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上自习。由于自习的地方很有限,总有很多同学不得不在宿舍看书做作业。当时最佳的自习场所,当属图书馆自习室。原因大概是馆里有社科、自然科学和期刊杂志阅览室,便于做课时查参考书,学习累了也可以看会儿小说、报纸放

松一下。

一般上午大家都有课,因而为下午和晚上的自习占一个自习室的座位,就是许多同学的最爱。图书馆中午闭馆,下午一点半才开。从十二点半开始,就陆陆续续有同学站在大门前等候。一边等,一边还在看书背单词。随着时间推移,聚集等待的同学越来越多,有几百人之众,声音也越来越嘈杂。直到一点半大门准时打开,大家蜂拥而入,小跑进自习室,抢到一席

之地。几分钟后,座次排定,声浪不再,大家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不过在自习过程中,也会发生座位被“抢”的事。如果哪位自习中间离开座位稍长一点,座椅可能会被后来的同学搬走。不过也没关系,你也可以如此这般地“抢”一把交椅回来。当然无奈之下站着上一会儿自习也不新鲜。可以说,这种自然形成的行为规则,使自习室的利用率达到了最高。

图书馆虽好,但每晚十点要闭馆。这时候同学们的去处就是所谓的“通宵教室”。当时一教大楼的几个教室,晚上都不锁门。“夜猫子”们可以在那里用功。后来图书馆东头的一间自习室,学校也专门腾出来作通宵教室。当“夜猫子”半夜一两点上完自习要回宿舍时,早起的“百灵鸟”们又来学习了。这样一来,这些教室的灯火是夜夜不灭,象火炬般激励着一届又一届渴求知识的科大人。

(1981级 陈春华)

牛棚四“牛”

——2001级 221楼 434室友小记

林一瀚,来自福建漳浦一中,本科期间曾多次获优秀学生奖学金,曾获“张宗植”科技专项奖学金,赴芝加哥大学深造。

石磊,来自江苏南通如东中学,本科期间多次获优秀学生奖学金,喜欢踢足球,开朗幽默,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深造。

赵瑞,来自浙江瑞安中学,本科期间获优秀学生奖学金,喜欢音乐、篮球,赴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深造。

郭嘉,来自沈阳27中,本科期间多次获优秀学生奖学金,发表学术论文一篇,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寝室

我找你找了好久 / 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 / 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 / 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

刚刚进入科大的时候,由于来自不同的地方,生活习惯有所不同,生活中难免会有摩擦。赵瑞睡觉爱打呼噜,而石磊又偏偏对此敏感,于是在声声呼噜的“摧残”之下,石磊几乎患上了神经衰弱症。石磊说刚住在一起的时候,只要赵瑞的鼾声一起,他就再也无法和周公见面了。即使是现在,他还是无法“释怀”。说到这一段时石磊脸上满是无奈,而其他三位却笑成一团。

他们四位有着不同的爱好:林一瀚酷爱电脑,石磊喜欢足球,赵瑞和郭嘉爱打篮球。四个心直口快的男生在一起,难免有口角。当我们问起他们发生矛盾怎样处理时,他们却不觉得有过所谓的矛盾。心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出来,不要憋着,话说开了就不

存在矛盾了。他们寝室总是充溢着轻松和谐的气氛。即使在学习紧张的时候,他们也不忘互开玩笑、吹吹牛放松一下,永远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或许正是这种轻松的氛围才使他们可以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能够笑对挑战吧!

转系

转系,在科大不算新鲜事,可像他们这样一股脑儿集体转系的还真少见。他们四个在一大一结束时一起从化学系转到了现在的化学物理系。问其缘由,他们笑言当时年纪小,仅仅因为宣传老师极富激情的演讲,听得一时兴奋就决定转过去了。事实上,他们在化学系的时候很迷茫,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学习压力很大,加之对环境还不太适应,大家都学得很郁闷。转系之后,课程多了,他们反而学得踏实了,觉得多学一点东西很好。当然,转系是要承受压力的。能否适应新环境,并继续自己的“辉煌”……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都是巨大的。可是每每问到这种问题他们都会轻描淡写地回答:“做任何事情都会面临压力,我们总是要学会承受的。学习是很辛苦,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失望,但是既然做出了决定,就要义无反顾地坚持。”

勇于承担风险,敢于迎接挑战,或许是他们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出国

做一个探险的风筝 / 飞越过重重的山颠 / 闯一闯天涯与海角 / 因为我们有

年轻的岁月

郭嘉的父母都是北航毕业的高材生,而赵瑞有个表哥在美国,他们俩从进校起便有着出国的梦想。人总是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在他俩带动下,林一瀚和石磊也开始筹备出国了。他们一起背单词、考试,后来向学校递申请时也经常互相交流经验,互通有无,充分发挥了“集团作战”的优势。

他们的出国之路没有特别之处,考G、考托、寄申请,波澜不惊。可是再顺利的出国之路都是艰辛的。和大部分准备出国的人一样,他们从大二时就开始背单词,练习英文写作,这给原本就紧张的学习再添压力。那是一段黑暗而繁忙的日子。到如今,四人已经陆续拿到了offer,即将飞到大洋彼岸继续自己的梦想。出国是件很令人羡慕的事,而他们却显得很平静,仿佛一切都只是水到渠成。在他们看来,出国仅仅是一种选择而已,留在国内也未必不好,出国更多的是为了去领略另一种不同的生活罢了。

“黑店”

我们一进寝室就看见了角落里的打印机,他们得意地说,那曾是他们赚钱的宝贝呢。细细打听才知道,他们曾“无照”经营过一家小小的“打印公司”,主要业务是帮楼内的同学打印资料,赚点小钱。由于价格低廉,服务态度热情,“生意”一直不错。他们赚来的钱一般都用于集体撮饭。钱没剩多少,受益的就数那四个胃了。“生意”好的时候,他们每个周末都会光顾学校附近的小饭馆,一顿海吃后,肚子是填满了,可辛

辛辛苦苦赚的钱就又把饭馆老板赚去了。

后来他们的学习愈发忙了,再加上某些“顾客”实在令人无奈(据说曾经有人在他们的电脑上忙活了半天最后只打印了一张资料),他们只好让小店无疾而终了。“公司”虽然倒闭了,但这段经历为他们在科大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爱情

这份爱 / 已经远去 / 记忆却不肯停

四位都曾有过的难忘的情感经历。虽然有些已成为过去,但提起时还是有着淡淡的忧伤。

大一时的时候,林一瀚在放风筝时偶遇了一个女生,后来就成了他的GF,虽然现在两人已经分手,但那个风筝他还留着。提到那段经历,林一瀚只是浅笑,但我们仍能感觉到那笑中的遗憾与留恋。

“你会弹吉他吗?”当我们看到赵瑞桌上的吉他时这样问,其他三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他只会弹一句!”不过我想这一句应该足以吸引他女朋友了吧。赵瑞在他们寝室算是比较幸福的了,不仅拿到了offer,还有一个女友,真让人羡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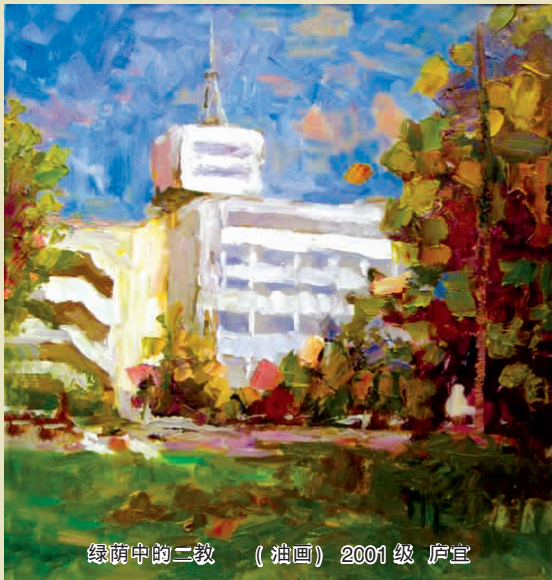
关于爱情,其他两位似乎不愿透露太多,我们只知道石磊一直喜欢一个女生,遗憾的是还没有机会结识。我想,多年之后回忆起来应该会有种幽幽的美好吧。而郭嘉的爱情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个谜。

关于爱情,我们没有权利说太多,但我相信在科大的情感体验一定会伴随着他们,成为他们科大四年记忆的一部分。

(杨茜 杨渭蔚)



科大格言



绿荫中的二教 (油画) 2001级 庐宜

- 郭沫若: 我们的学校如果说像一张白纸, 就请把她办成为最新最美的学校吧!
(1958年9月20日开学典礼)
- 郭沫若: 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创造, 在大胆创造的风格中实事求是。
(1958年新年祝词)
- 郭沫若: 我们必须又红又专, 红透专深, 两条腿走路, 走到底。
(1959年9月8日开学典礼)
- 郭沫若: 我们不仅要掌握尖端, 还要创造尖端; 我们不仅要攀登上科学的高峰, 还要不断创造科学的高峰。
(1958年开学典礼致词)
- 杨承宗: 化学工作的特点本来是在于探究索奥, 废物利用。但我们还要无中生有, 巧夺天工。
(1959年9月杨承宗先生的迎新致辞)
- 郁文: 为什么办这个学校, 就是因为要赶国际科学水平, 补空白, 壮大科学队伍。
(1959年9月8日开学典礼)
- 郭沫若: 勤奋学习, 红专并进!
(1959年9月25日《中大校刊》题词)
- 郭沫若: 我们的校风是好的, 就是勤俭办学, 艰苦朴素, 红专并进, 团结互助。
(1959年开学典礼讲话)
- 陈毅: 你们搞科学的要做我们的后盾, 你们好好搞, 我的外交部长就好当了。
(1964年毕业典礼)
- 郭沫若: 研究生导师就像牧羊人一样, 把羊带到青草地, 然后羊自己吃草, 而不强迫羊吃哪块草和怎么吃。
- 黄有莘: 去闻闻科学的味也好。
(物理系原副主任黄有莘动员学生去研究所的实验室“拜师”时说的话。)
- 张劲夫: 我们想问题, 办事情, 不能靠偶然吃饭, 要靠必然吃饭, 要相信科学, 不能靠碰运气, 要找出必然规律, 按科学办事才靠得住。
- 严济慈: 敢于好高骛远, 善于实事求是。
- 华罗庚: 居高才能临下, 深入才能浅出。
- 严济慈: 教学是一个提炼蒸馏的过程, 教师不仅要给同学知识, 更主要的是教会同学做学问的方法。
- 杨承宗: 科学就是前沿, 科学就是尖端, 科学就是创新。
- 邓小平: 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
(1975年9月)
- 严济慈: “所系结合”不能丢, 不执行“所系结合”的方针, 科大可以不办了。
(1981年9月)
- 华罗庚: 培养青年应该浇冷水, 我从来就是对青年泼冷水的。
(1981年4月)
- 方毅: 当了裤子也要把科大加速器搞上去。
(1980年6月, 听取同步辐射加速器预制研究情况汇报)
- 严济慈: 教书要深入浅出, 学习要浅入深出。
(1981年10月29日应《科大校刊》之邀题词)
- 严济慈: 承前启后不甘后, 青出于蓝胜于蓝。
(1981年12月研究生毕业典礼贺词)
- 华罗庚: 聪明在于学习, 天才在于积累。
(1981年4月26日应《科大校刊》之邀题词)
- 严济慈: 读书主要靠自己。有好的老师固然好, 没有好的老师, 一个人也能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 把书读好。
(1981年4月谈读书、教书、写书、做研究)
- 郁文: 年轻人的生活就要多种多样, 不要培养小

- 书呆子。
(1981年8月接受学生记者采访)
- 26、丁肇中: 办好一个大学不一定都在首都、大城市。也许由于科大远离北京, 各方面干扰少, 老师和学生都能专心学习和工作。
(1982年2月访问科大观感)
- 27、严济慈: 校园里花确实种得好, 但我心目中的花朵, 却是你们在座的同学。
(1982年5月10日在稻香楼宾馆南园接见学生代表)
- 28、李政道: 人才代出, 创作当少年; 桃李天下, 教育数科大。
(1983年为少年班5周年题词)
- 29、丁肇中: 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力, 并不在于把书本知识都背下来。要不怕困难, 这是学者成功的主要品质。
(1983年与少年班学生座谈)
- 30、龚升: 同学们要谦虚谨慎, 谦虚的办法就是永远与第一水平平比。
(1983年6月数学系欢送毕业生大会讲话)
- 31、马西林: 你们不仅是科大的学生, 也是科大的主人。
(1983年7月9日78级学生毕业典礼发言)
- 32、钱志道: 没有框框, 思想解放。
(1983年谈科大的特点)
- 33、邓小平: 据我了解, 科技大学办得较好, 年轻人才较多, 应予扶持。
(1983年12月14日关于科大工作的批示)
- 34、李政道: 和国外相比, 不是第一, 就是落后。一定要设法赶上去。
(1984年5月勉励少年班同学)
- 35、华罗庚: 登高自卑, 行远自迩,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勉励1984级新生)
- 36、严济慈: 心向母校, 志在四方; 振兴中华, 气贯环宇。
(为1979级毕业生题词)
- 37、管惟炎: 科大应办成安徽的又一座黄山, 成为我们国家的骄傲, 在国际上也要有相当的影响。
(1984年11月20日奖学金颁奖大会)
- 38、严济慈: 创寰宇学府, 育天下英才。
(1988年30周年校庆题词)
- 39、陈省身: 不要考第一!
(1985年6月15日为少年班同学题词)
- 40、赵忠贤: 你们现在觉得未来很遥远, 但是我们觉得已走过的时光太快了。
(1989年11月12日与物理系同学座谈)
- 41、苏步青: 当好第一流大学的学生。
(1990年10月书赠科大学子)
- 42、严济慈: 中国科大是我的掌上明珠, 我每次来都看到她放出新的光彩。
(1991年12月26日加速器通过国家验收大会讲话)
- 43、周光召: 我希望, 在中国土地上, 第一批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是从科大培养出来的学生。
(1993年8月28日干部教师大会讲话)
- 44、江泽民: 里面向21世纪, 建设一流大学, 培育一流人才。
(1998年6月26日为建校40周年题词)
- 45、钱临照: 对出国的学生和老师, 我们不能放风筝, 学校要在大气候中创造自己的小气候, 吸引他们回国。
(1990年5月14日教授座谈会)
- 46、赵忠贤: 我们需要年轻人来跟上变化和形势, 不然的话, 你就会穿着19世纪的衬衫, 外面套着20世纪的燕尾服。
- 47、陈至立: 科大层次较高, 充满生机活力, 是高校中的“精品”。
(1999年3月12日院省部三方共建座谈会)
- 48、杨承宗: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工作, 一是对原子弹的完成做了一点小小的工作, 一是在科大办了放射化学专业。
- 49、路甬祥: 我创新, 故我在, 科教报国五十年。
(2006年为50周年校庆题词)
- 50、不要命的上科大。
(建校之初流传至今的坊间名言)



图书馆门前的蓝树 (油画) 2001级 庐宜

科大镜头

一些过往, 一些沧桑, 被曾经的岁月雕饰成经典镜头; 一些感动, 一些温馨, 被经典镜头定格成永久的激励。

镜头①

1958年9月20日, 首任校长郭沫若先生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 “我们的学校是新建立起来的, 前无所承, 缺乏经验, 这是我们的缺点, 但也正是我们的优点。毛主席说过: ‘一张白纸, 没有负担, 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 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我们的学校如果说像一张白纸, 就请把她办成为最新最美的学校吧!”

镜头②

科大招收的头几届学生中, 南方来的同学, 几乎都是赤着脚, 从火车站自己挑着行李走到玉泉路的。入冬了, 许多同学也没有棉衣棉鞋, 郭沫若校长等从稿费里拨了几万元, 给同学们置办冬装。后来, 老校友回忆文章中多有“赤脚走出大巴山”、“一根扁担上科大”这样的标题。

镜头③

科大在北京的时候, 每年都有大学生去天安门游行, 游行时要认科大的队伍很容易, 那个队伍穿得最土、一停下来就看书, 肯定是科大的。游行后集合的时候, 别的学校要喊半天, 科大人一唱歌就把人找齐了。

镜头④

1964年,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应邀在科大毕业典礼上讲话: 你们是搞科学的, 我是搞外交的, 你们是我的后台。可我现在后台不硬呀, 跟外国人打交道, 他才不买账呢。你们搞科学的要做我们的后盾, 你们好好搞, 我的外交部长就好当了。

镜头⑤

1969年底, 科大下迁安徽, 先是到安庆市, 数百人住在马山党校的三层小楼里。由于人多房少, 负责后勤的同志便找来一段竹竿, 量出每个铺位60公分宽。十几个人睡在一间屋子里, 人挨着人, 动一下都难。据说想要翻身, 必须大家一起喊一二三, 同时翻身。

镜头⑥

合肥地处江淮之间, 冬天气候十分寒冷。上世纪80年代, 科大筹资为学生宿舍安装暖气, 有的教师不理解, 认为应该先给教师宿舍装暖气。学校说服他们的理由就是: “家里穷, 有钱可以买点好东西的时候, 你是自己吃还是先给孩子吃? 当然是先给孩子吃。在学校, 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

镜头⑦

80年代, 图书馆自习室每晚十点闭馆。这时候同学们的去处就是“通宵教室”。当时一教大楼的几个教室, 晚上都不锁门, 后来图书馆东头的一间自习室也专门腾出来作通宵教室。学生通宵自习被称为“打通宵”, 因此常有“昨晚‘通’到几点几刻”、“某某是科大‘第一通’”之说。

镜头⑧

1983年6月, 新中国首次颁发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的共18人, 时人称其为“十八棵青松”。其中, 中国科大共有7名博士。他们是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墀、苏淳、冯玉琳。李尚志博士的学位证序号为“1”。

镜头⑨

1993年科大35年校庆, 93岁高龄的严济慈老校长亲临科大, 在校庆大会上发表讲话, 浓重的东阳口音, 娓娓道来: “建校35年了, 我一直看着她成长,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一天一天长大, 一点一点成熟起来, 越来越有出息, 成为我的掌上明珠,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镜头⑩

校园里的餐饮广告很多, 1992年, 一则餐饮广告新颖别致, 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名称: 托福餐馆
宗旨: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服务: 冬天里的一把火
希望: 再回首

RoboCup 和 Robo-Game 活动周



表演千手观音的机器人

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是目前国际机器人研究与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活动之一,是用机器人作为队员,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则进行的竞技活动,堪称一项通过科技竞赛推动信息、自动化等领域前沿研究、人才培养和实际应用的全球事业。目前已发展到每届 400 多支队伍,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泛的机器人科技大赛。目前大赛设有仿真组、类人组、救援组、青少年组(足球、舞蹈、搜救)等项目。

第一届机器人世界杯赛于 1997 年在日本举行,此后每年举办一次。2008 年第 12 届机器人世界杯赛由苏州市与中国科大联手承办。

我校“蓝鹰队”自 1999 年参加 RoboCup 世界杯以来,不断取得优异成绩。2007 年 7 月,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第 11 届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大赛上,获得两项冠军、一项亚军、一个第 4 名,综合成绩排名世界第一,并首次实现了优势项目在同一届世界杯上全部进入世界四强的目标。这是我国高校首次在综合成绩上排位世界第一。

中国科大 Robo-Game(机器人竞赛)活动周从 2000 年开始举办,每年 10 月举办一届竞赛活动周,包括机器人舞蹈比赛、仿真机器人足球比赛、机器人对抗比赛等项目,是具有很强观赏性和趣味性的高技术对抗赛,涉及人工智能、机器人学、光学、电子、机械、无线通讯、传感等多个学科领域。目前,Robo-Game 活动周已经成为学校规模大、水平高、影响广的最具特色的校园科技文化活动之一。中央电视台多次对活动全程现场录像,向全国播出。



精彩的校园辩论赛

“五月风”

培养全面素质的舞台

“五月风”科技文化节是我校团委组织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龙头品牌项目,自 1990 年以来已经持续举办了 18 届,内容包括系列科技、文艺和体育活动。每年 4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举行。内容有:

热血篇:由“五四”纪念表彰大会、18 岁成人仪式等理论实践类活动组成。

青春篇:由“校园之星”歌手大赛、文艺晚会、“冠军杯”男足比赛等各项球类比赛、科大校园吉尼斯等文体类活动组成。

求知篇:由好书推荐、实验室开放日、学术科技报告会系列、科技创新竞赛、创意设计竞赛等学术科技类活动组成。

七彩篇:由各系“系周”、各院“院周”、社团巡礼等活动组成。

“五月风”科技文化节集中展示极具特色的科大校园文化和各级团学组织的风采,为满足师生文化需求、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为广大同学培养全面素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作为一所年轻的大学,中国科大的朝气与活力不仅体现在教育与科技创新之中,而且渗透在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中。科大学子浸润着“理实交融”的文化传统,以科大学特有的认真与执著,在科技活动、社会实践、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打造了独具特色的活动品牌,形成了以科技创新活动为主导的独特的校园文化氛围。

“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成果的交流盛会

2007 年 11 月,第十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天津市南开大学举行,中国科大 6 件参赛作品,获得 2 个一等奖、2 个二等奖、2 个三等奖,连续第九次获得竞赛“优胜杯”,并获得校级优秀组织奖。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主办,国内著名大学和新闻单位联合发起,在国家教育部支持下组织开展的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权威性的全国性大型赛事,被誉为中国大学生学术科技的“奥林匹克”。此项活动旨在全面展示我国高校教育成果,激发广大在校大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为国家培养跨世纪的创新人才。自 1989 年开始举办以来,竞赛已成功举办了十届。从第二届开始,我校参加了“挑



战杯”历次比赛,它已成为我校学生课余科技文化活动中的一项主导性活动。

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回顾自己本科 3 年级时参加“挑战杯”并获奖的经历时动情地说:“这次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让我感觉做事情就需要一种挑战的勇气。这种奖励像一盏指路灯,说明你所走的方向、你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正是这种认可让我有信心走向创业。”



“华为杯”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展示现场



纪念“一二·九”运动 72 周年文艺汇演

研究生支教团:西出阳关洒豪情

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是由团中央、教育部从 1998 年联合组织实施的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全国示范项目。它采取公开招募的方式,每年在全国部分重点高校中招募一定数量具备保送研究生资格、有奉献精神、身心健康、能够胜任支教扶贫工作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经过培训后,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到国家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学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同时开展力所能及的扶贫志愿服务。服务期满后,由下一批志愿者接替其工作,形成“志愿加接力”的长效工作机制。出发前,学校还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为队员们开展思想政治、教学方法、医护常识、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训练。全体队员还在校团委挂职,参与科技、文艺、体育等团学活动的具体组织实施。

我校自第一届起积极参加此项活动,迄今已有 55 人先后赴甘肃榆中、青



第九届支教队开展“一帮一”家访工作

海循环、宁夏海原县开展支教服务工作。研究生支教团不仅给贫困地区群众带去了知识,传播了现代科技,宣传了中国科大,支教同学也通过实践经受了教育,活动产生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其中,2006 学年度,研究生支教团第八届研究生支教队的 3 名志愿者——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刘福丽、管理学院李飞龙以及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孔德明获得“支教先进工作者”称号,受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支援基层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表彰。



奔跑在首届模拟越野赛中



在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奖

“三下乡”风雨程



走在乡间小路上

“原来不是每个人的 17 岁都有蓝天的恬淡宁静……”

汪臻真同学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留下了这样的感叹,金寨县油坊店乡短短一周的“三下乡”经历在她的心灵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她说:“这几天经历过的一些事,见过的一些人,特别是乡村孩子们经受的苦难、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还有那份纯朴的情感,让我对人生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1995 年,在学校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校团委组织选拔了第一支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赴金寨县油坊店乡开展服务活动,从而开启了我校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崭新的一页。第一届服务团队员的签名单页一直悬挂在油店中学的会议室里,经过十年的风雨,如今,那张纸已经泛黄,当年的小伙子们已到了而立之年,当年的人和事在记忆中或许已渐渐模糊,但那种激情、震撼、感动却永远不会忘记。

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联合共同组织发起的,坚持以“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为原则,引导广大同学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更加深入地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在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和团队合作等方面拓展全面素质。

13 年来,我校“三下乡”社会实践队伍不断壮大,“三下乡”社会实践基地不断拓展。2008 年,经校团委统一协调,校学生会、校学生社团管理指导委员会、芳草社青年志愿者协会、学生记者团、学生国旗护卫队、学生自强社等学生社团和各学院分团委、团总支等组织了 18 支实践服务团,分赴各地开展科技普及、文化宣传、支教扫盲、环境保护、“一帮一”助学等实践服务活动。我校还组建了博士生实践服务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赴江西省南昌市开展科技普及、企业帮扶、文化宣传等实践服务活动,为中西部地区农业综合开发、乡镇企业技术改造升级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校团委还启动了“2008 年暑期挂职锻炼计划”,联系合肥及周边地区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挂职岗位,组织、选拔并培训了我校 30 余名同学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挂职锻炼。通过这些努力,我校各级团学组织共同为广大同学打造了社会实践的广阔舞台,让同学们在实践中真正“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中国科大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连续十余年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联合会评为暑期社会实践全国先进单位。



学生社团是实现成员的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群众团体。2001年4月,学校成立学生社团管理指导委员会以来,校内学生社团呈现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由2001年的20余个,发展到2008年的60余个。学生社团的质量不断提高,通过每年4月和11月举办的“优秀学生社团评比”和“学生社团文化节”,促进学生社团积极、健康地发展。

社团文化节自2000年开始举办,迄今已举办9届,为全校学生社团提供了一个展示风采的舞台,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校园科技文化活动的总汇。



学生动漫之夜



学生树之话剧社表演

芳草社： 绿色追求

中国科大芳草社青年志愿者协会于1994年发展成为安徽省第一个正式在团中央注册的青年志愿者协会。14年来,先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志愿活动,成为科大志愿服务的一面旗帜。

芳草社青年志愿者协会以爱心奉献作为动力,以社会需要作为自己的责任,积极投身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志愿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围绕社会需求不断拓展服务空间,不断创新服务品牌。他们从校园走进社区,从城市走向农村,走进西部,开展了校园文明活动、一帮一资助活动、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特教爱心行、义务家教、研究生西部支教、图书银行、忘年交等一系列志愿者服务活动,用爱心和责任演奏出一曲动人的奉献之歌,让青青芳草撑起一片绿色的天空。

芳草社“一帮一”活动自1997年启动以来,共资助200多名失学儿童,帮助他们圆了读书梦。“一帮一”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援助,更是心灵上的关爱,精神上的抚慰,他们通过书信交流,探索学习、生活、情感等各种问题。

芳草社特教爱心行动开展已经3年了,志愿者们和这些特殊儿童聊天、交朋友,做游戏、互动联欢,他们还学习手语等特殊语言对孩子进行学业和课外知识的辅导,经常邀请这些孩子参观科大校园,让美丽心灵无声地交流。

芳草社的同学在特别繁重的学习任务之余,还挤出时间为认真备课,热心为社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义务家教服务,用赤诚的爱心和年复一年的坚持,深深地感染着社区的居民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我们都把这项活动能否坚持下去,当成对自己的一个考验。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奉献爱心,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现任义务家小组负责人表示要把这份爱心接力传递下去。

芳草社曾获安徽省高校“优秀学生社团标兵”荣誉称号、安徽省青年志愿者行动优秀组织奖,“一帮一”启明星助学导航行动项目曾获安徽省青年志愿者行动项目奖,芳草社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团曾获“安徽省2004年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05年,芳草社青年志愿者协会被评为首届安徽省“十佳学生社团”。

国旗护卫队：守护庄严

中国科大学生国旗护卫队成立于1997年10月,以护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的尊严为己任。协会承担了校内日常的升旗和重要节日、纪念日的集体升旗工作,同时,还举办一系列如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国主义教育活动。

国旗护卫队在1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认真做好按时升降国旗的基本任务,也积极参与到学校社团各方面的工作中,融入到科大这个大家庭,为共建美好科大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科考协会：挺进大自然

中国科大学生科考协会是在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高登义研究员的倡议和支持下于1996年12月21日成立的,并于1997年成为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团体会员。

科考协会自成立以来,坚持“科考·探险·环保”的活动宗旨,成功组织了多次大型野外科学考察探险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被多家新闻媒体跟踪报道,已发展成为中国科大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社团之一。

科考协会大事记:

1997年5月——挺进大别山;

1998年8月——湖北神农架科考;

2000年5月——安徽牯牛降自然保护区科考;

2000年10月——南京环保宣传;

2001年5月——安徽清凉峰自然保护区

科考;

2002年8月——横穿陕西秦岭科考;

2003年7月——安徽肖坑考察;

2004年8月——陕西佛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考察;

区考察;

2005年8月——陕西秦岭周至自然保护区考察;

考察;

2006年7月——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科考;

荣誉:

荣誉:

科考协会曾获得首届安徽省“十佳大学生社团”、首届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社团”、第二届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社团标兵”等荣誉称号。2006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授予科考协会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社团标兵”称号;2007年,荣获中国科学探险协会颁发的“科考项目奖”等。



科考协会队员在秦岭探险

诗社： 荒原旅程

1986年的中国科大文坛,在经历了种种迷惑、否定、躁动和跨越后,一批初生勇士选择托马斯·艾略特的代表作长诗《荒原》的篇名为他们缔造的诗社命名,从此,喧嚣的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在心灵视野中苍凉的荒原上默默跋涉的灵魂。

从出生的第一天起,荒原的道路就命中注定似的坎坷。直至1993年,在岫云等不甘寂寞的“诗”姐“诗”兄的倡议下,荒原诗社才凤凰涅槃式地复活。此后的荒原,以一种敏感而冷峻的风格领导科大文坛,其载体《荒原》也成为《中国诗人报》评选出的400家中国民间诗刊之一。

1996年,诗社改组为文学社,小说、散文、杂文开始踏上这片荒原。科大文坛的春天似乎已经来临了。但不幸的是,1996年12月,荒原竟又一次“猝死”。很有些“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的凄清。

1997年,又是一批不甘屈服的勇士,在一片残垣断壁中,奇迹般地重建起昔日的亚特兰地斯。“有我在,就有荒原在”的誓言,振聋发聩的回荡在渐趋冷却的天空。1999年第6期《中国大学生》杂志在介绍荒原文学社时写到“在愈来愈精确实实在的现实世界中保持对纯文学的执着”。

作为中国科大校园文化的旗帜,荒原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和力量的象征,它是每个荒原人心中神圣的十字架。没有人怀疑它的未来,因为,文学永不沉沦。



50 周年校庆首次新闻发布会

2006 年 6 月 2 日，学校举行 50 周年校庆首次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 50 周年校庆主题和安排。

学校将本着“庆典为体、文化为魂、学术为根、发展为本”的原则，按照“庄重喜庆、崇尚尚朴、凝心聚力、以庆促建”的方针，以“学术·亲情·文化”为主题，举办系列庆典活动，以继承优良传统，展示辉煌成就，弘扬科大精神，创建一流学府。



校党委书记郭传杰、校长朱清时共同为校庆主题揭幕。

50 周年校庆发布第一号公告



2006 年 6 月 日，中国科大 50 周年校庆第一号公告正式发布，当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中国教育报均刊登此公告。



学校举行科大精神系列报告会



2006 年 4 月 8 日，校党委宣传部启动以“科教报国 50 年”为主题的“科大精神”系列报告会。两年来，共举办报告会 22 场，郭传杰、朱清时、许武、侯建国、李定、施蕴渝、吴奇、李曙光、朱近康、辛厚文、俞书勤、彭子成、韩荣典、舒其望、张树新、蒋华、胡成行、穆荣平、孙显元、栾玉广等领导、院士、教授、杰出校友，为青年学生作文化传统与精神的精彩报告。（图为报告会文集封面。）



2006 年 11 月 5 日，学校举行 50 周年校庆志愿者动员大会，启动“校友问候行动”。第一阶段共收集到 2 万多名校友信息。图为校庆志愿者在宣誓。



2007 年 6 月 5 日，学校举行 50 周年校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宣布校庆顾问委员会首批委员名单。周光召任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路甬祥任顾问委员会主任，吴文俊等 12 名专家、领导和校友担任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原我校教师、中科院资深院士王元等 80 人为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7 年 6 月 5 日 50 周年校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发布了 50 周年校庆标识。



中国科大校徽正式启用



2007年9月20日晚，学校举行建校49周年文艺晚会。会上，正式启用经过加工设计的校徽。图为校党委书记郭传杰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多慧共同为校徽启用揭幕。



2008年1月1日上午8点，伴随着国歌的激昂旋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中国科大东校区郭沫若铜像广场上冉冉升起。随后，在雄壮的校歌声中，中国科学院院旗和中国科大校旗徐徐升起，标志着50周年校庆年正式启动。

学校举行中国科大论坛·青春报国系列报告会

为迎接50周年校庆，弘扬科大学子青春报国的精神和传统，学校自2008年4月29日起，启动“中国科大论坛·青春报国系列”报告会，邀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获得者、“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标兵”获得者等杰出校友回母校作报告，相里斌、刘庆峰、胡伟武、郭为等先后来校作报告，与广大师生共同分享成功经验、成长感悟和报国情怀。

学校举行“科学文化论坛”

为庆祝中国科大50华诞，丰富我校人文素质教育，校庆办公室、外事办公室和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共同举办校庆系列活动之“科学文化论坛”。台湾学者江才健博士、人文学院院长刘钝、台湾大学化学系教授刘广定、纽约城市大学的著名科学史家Joseph W. Dauben教授先后作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出版系列校庆专刊

为庆祝中国科大建校50周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出版系列校庆专刊，目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校庆专刊》、《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天文望远镜（LAMOST）》、《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校庆专刊》、《近代力学系校庆专刊》、《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校庆专刊》、《信息科学与技术校庆专刊》、《生命科学学院校庆专刊》等已相继出版。系列校庆专刊将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这个学术传播平台藏入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等国际重要图书馆和进入多家国际重要数据库，以加强学术交流和彰显我校50周年校庆的学术性。



2007年9月28日下午，我校与合肥市举行座谈会，商谈50周年校庆合作有关事宜。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表示，科大50年校庆不仅是科大，也是合肥市的盛事，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把它作为2008年的重点工作来抓，做好协调服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钱学森向50周年校庆表示祝贺

2008年1月15日，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致信钱学森先生，汇报中国科大50年办学成就，并请钱老就科大的进一步发展给予指示。1月28日，钱老回函白春礼，对科大的50周年校庆表示祝贺，并就弘扬“理工结合”的人才培养传统，进一步发展走“理工文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之路，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

中国科学院

白春礼副院长：

您2008年1月15日就中国科技大学建校50周年一事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已退出科研工作多年，您要我为科大建校50周年说几句话我不敢当。我谨对科大5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热烈祝贺。

现在，全国都在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中国科技大学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完成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的重任。我想，过去科大所走的“理工结合”道路是正确的，今后还要进一步发展，走理工文相结合的道路，在理工科大学做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我相信在未来，科技大学一定能为我国培养出“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请转达我向中国科技大学全体师生的崇高敬意。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2008年1月28日

钱学森手稿首发式在北京举行

2008年6月22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中国科学院“坚持科教结合，培育创新人才”50周年报告会。报告会上，举行了《钱学森“火箭技术概论”手稿及讲义》、《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发式，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总装备部研究员、钱学森秘书涂元季少将共同为该书首发揭幕。

13

少年班成立 30 周年庆典活动

2008 年 3 月 22 日上午，学校隆重集会，庆祝少年班创办 30 周年。众多风华正茂、事业有成的少年班校友和部分超常教育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了庆典活动。会上举行了《少年班 30 年》一书首发式，李政道先生为该书撰写序言。少年班创办 30 年来的辉煌成就再次引起世人关注。

3 月 21 日，学校隆重举行创新人才培养和少年班教育实践研讨会，国内外长期从事超常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少年班教育学专家，相关高校和部分重点中学校长和少年班教师及校友共 8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少年班校友给老师献花

14

中国科学院举行“坚持科教结合 培养创新人才”50 周年报告会

2008 年 6 月 22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坚持科教结合，培育创新人才”50 周年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

院院长路甬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教育部部长周济，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等出席大会。路甬祥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以中国科大和中科院研究

生院为主体的中国科学院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突出成就和历史经验，提出了中科院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目标与任务。



路甬祥院长(左)参观中国科大办学成就展



大会主席台



2008 年 7 月 6 日上午，赵忠尧先生塑像揭幕仪式在近代物理系楼前隆重举行。赵忠尧先生青铜胸像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赵萌先生和周尚仪女士设计创作，李政道先生为塑像题词。

15

学校发布 50 周年校庆公告 (第三号)

16

2008 年 7 月 22 日，学校发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0 周年校庆公告 (第三号)。公告说：自 50 周年校庆筹备工作启动以来，在社会各界和海内外校友的热情参与和积极支持下，我校成功举办了少年班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中科院“坚持科教结合，培育创新人才”50 周年报告会、赵忠尧塑像揭幕仪式、第十二届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赛、中国科大论坛·诺贝尔奖获得者报告会、青春报国系列报告会等校庆活动。

当前，全国上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建设节约型社会，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重建家园。根据广大师生、校友的倡议，我校本着简朴、务实的原则，决定对 50 周年校庆方案进行调整，取消大规模庆典和招待活动。届时，将围绕“亲情·学术·文化”的主题，重点举办校庆纪念、校友聚会和学术交流活动以继承优良传统，总结办学经验，增进校友情谊，促进合作交流。为此，学校热忱欢迎广大海内外校友届时返校，共叙同窗情谊，追忆青春年华。

各地校友庆祝

母校建校 50 周年



2008 年 8 月 2 日下午，400 多名上海校友欢聚一堂，隆重举行庆祝科大成立 50 周年大会。



2008 年 5 月 31 日下午，由北京校友会举办、新创基金会承办的“庆祝中国科大创办五十周年大会”，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大原校址）大礼堂隆重举行，逾 800 名科大校友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参加了这次科大南迁合肥以来在北京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校友活动。

中国科大 50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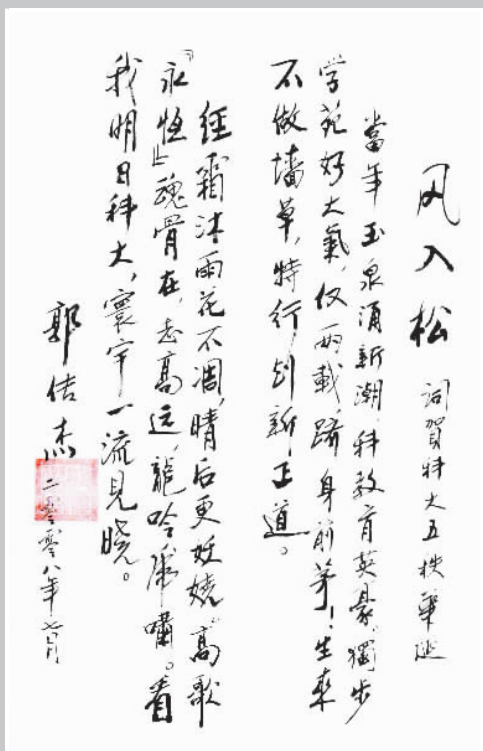
2008 年 6 月 21 日，湖北校友分会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湖北校友代表大会暨庆祝母校五十周年华诞大会”，100 多名校友在华中科技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参加了大会。



四川校友集会庆祝中国科大 50 周年校庆。

校庆日升旗暨"中国科大星"纪念碑揭幕仪式	9 月 20 日
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会（暨中国科大建校 50 周年纪念邮票首发仪式）	9 月 20 日
建校五十周年文艺演出	9 月 20 日
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第十四届年会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	9 月 19-21 日
校史馆开馆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编年史稿》首发仪式	9 月 18 日
老一辈科学家塑像揭幕仪式（钱学森、郭永怀、贝时璋）	9 月 13-19 日
纪念建校五十周年教职工表彰会	9 月 9 日
纪念建校五十周年·中外著名大学校长报告会	9 月 13-26 日
中国科大论坛·青春报国系列报告会（张亚勤、潘建伟）	9 月 17-19 日
联想集团捐赠（高性能计算机群系统）仪式	9 月 19 日
"大学时代 DV 重温"晚会	9 月 19 日
建校五十周年纪念邮开展展仪式	9 月 18 日
建校五十周年书画开展展仪式	9 月 18 日
2008 年并行算法、结构、编程国际学术研讨会	9 月 16 日-18 日
明瓷精粹-景德镇明初百年御窑出土瓷器展、明清主流画派作品开展展仪式	9 月 15 日
细胞动力学与化学生物学国际研讨会	9 月 12-16 日
第十五届全国凝聚态理论和统计物理会议	9 月 11-14 日
第三届全国公共管理院长论坛暨 MPA 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	9 月 11-12 日
微软-科大教学实验班揭牌暨多媒体计算与通信重点实验室第三期协议签字仪式	9 月 9 日
校庆系列丛书发行仪式	9 月
"困学守望"奖教金颁奖仪式（774 刘亚东校友设立）	9 月 17 日

为纪念
中国科大建
校 50 周年，
校工会发起
“迎校庆书画
展”征文活
动，师生员
工积极响应，
欣然泼墨，
踊跃投稿，
以丹青作品
的向母校祝
贺。这里选
刊数幅，以
飨读者。



书法 郭佑杰



俏不争春 国画 钱宝英



青山晨韵 国画 刘幸芝



繁花似锦 国画 康寿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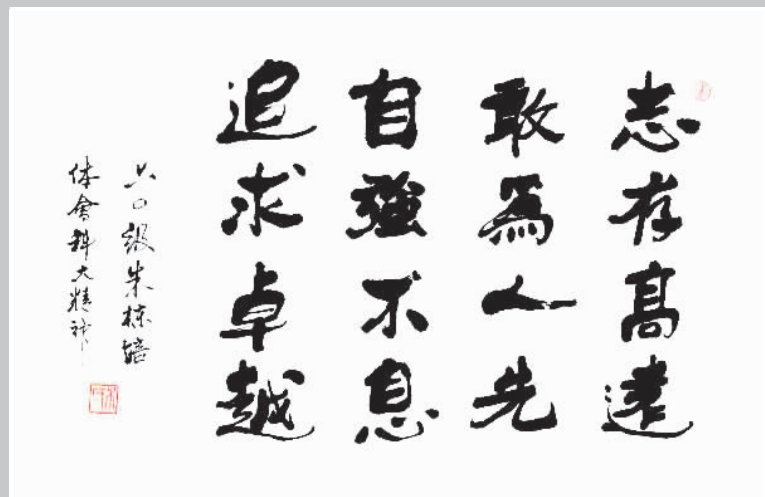
春 国画 宋振玉



书法 涂正康



墨竹 国画 王桂芝



书法 朱炼培



天使的家 油画 王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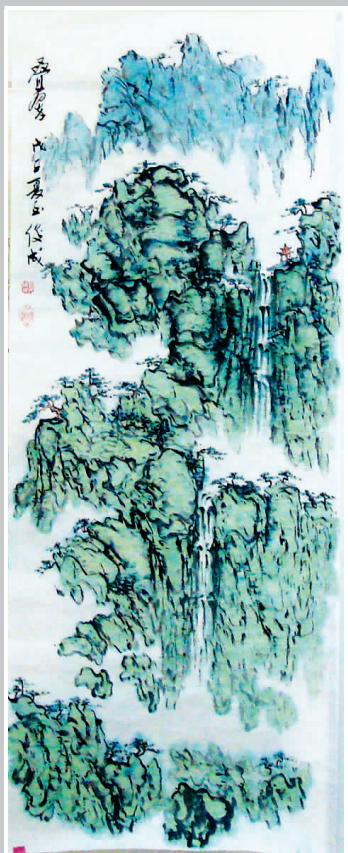
工笔画 葛香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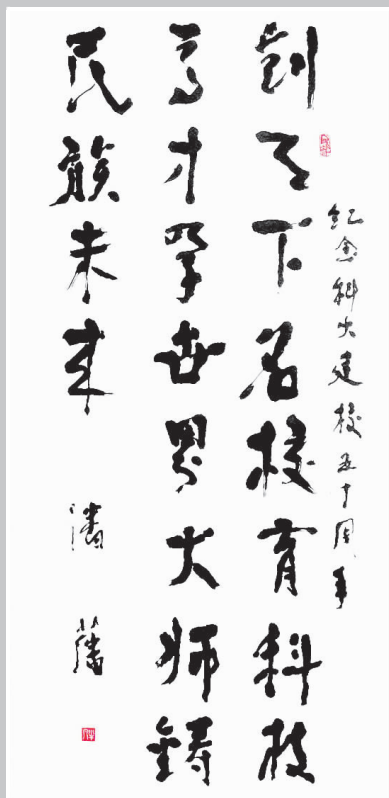
牡丹图 国画 倪淮光



起舞弄风影 国画 张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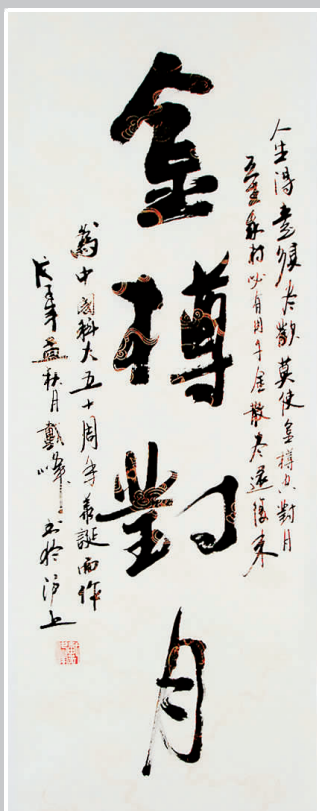
叠翠 国画 郭俊成



书法 潘藩



硕果累累 国画 方桂芝



书法 戴峰



枫林渔隐 国画 朱信龙



国色天香 国画 林枫凉



山河壮丽 国画 傅廷亮



编委会名单

顾 问：郭传杰 朱清时 许 武 侯建国
主 编：鹿 明
副 主 编：蒋家平 朱巧玲
审 校：朱灿平 张淑林 黄超群 刘 斌 朱长飞
张梦萍 董 雨 朱东杰 魏 英 张鹏飞
责任编辑：朱巧玲 杨晓萍
其他参与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 绚 马建平 方黑虎 刘婧婧 李 涛 李雅清 汪银生
杨 凡 杨 杰 杨保国 何淳宽 张志辉 张鹏飞 洪孟良
胡胜友 梁宏飞 郭胜利 傅 森 裴 旭 皇甫越
主 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宣传部
鸣 谢：党政办 校庆办 研究生院 教务处 科技处 人事师资处
外事办 学工部 团委 少年班 档案馆 校友总会 工会